

壹、導論

一、中國不是凱因斯主義的病人

(一)、一個問題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發表一篇文章，名為〈凱因斯的中國病人〉(Dr Keynes's Chinese patient)。這篇文章是對應當時中國政府的一個重要決策事件所做出的評論。那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為實現下一年度經濟成長率超過 8%的目標，提出高達人民幣四兆的「擴大內需政策」(曾仁傑，2009)。¹在該篇文章中，略述「擴大內需政策」的鉅資相當於中國年度 GDP 的 14%，大概是中國和平時期以來最龐大的刺激方案。

該文強調，中國年 GDP 增長率至少要達到 8%，是因為中國領導人認為應該避免國內痛苦的失業壓力，於是必須透過投資基礎設施和拉動內需的手段作為保持增長的最佳途徑。該文並指出，與二十世紀九〇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國仍是窮國，鐵路和公路網還有許多改進之處，所以可執行擴大投資的政策。的確，九〇年代的日本常常被視為凱因斯主義的負面教材，不僅其推行的貨幣寬量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 陷入凱因斯所強調的流動性陷阱 (liquidity trap) 之中，還在於日本當時的財政政策只是對既有基礎設施的修補，並沒有達成凱因斯主義的擴大內需成果，以至於陷入保羅·克魯曼 (Paul Robin Krugman, 1999: 123) 聲稱的「成長性蕭條」(growth depression) 的惡性循環之中。

該文提及中國擴大內需政策並未全然面對國內消費不彰的問題，亦即如何讓中國八億農村人口花錢消費的問題。但從該文標題及其敘述中，顯然對中國肯用

¹ 針對中國於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所提的擴大內需政策內容，請見表一。

凱因斯主義進行對症下藥的舉措，感到認同。就如同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所認為的，中國是凱因斯最好的學生，這對世界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經驗（顧晴，2010）。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說，中國不只是凱因斯的病人，還是凱因斯的好學生？這個問題認真的提問方式是：中國自改革開放時期所進行的現代化發展過程，是不是以凱因斯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上的發展策略而取得的結果？我認為這個問題有必要先進行回應。

第一個有必要回答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我們常常以所謂的自由主義與凱因斯主義作為一個對照，同時把「政府是否要進行市場干預」作為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認識起點。例如，曹長青（2009）便認為中國的發展必須走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自由經濟道路，他以「飲鴆止渴」的說法來解釋凱因斯主義的短視心理勢必造成不良的後果；他並認為美國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之後所執行的凱因斯主義政策，將使美國更為「社會主義化」。曹長青（2009）甚至強調：「共產國家的政府包攬一切，計畫經濟，結果一窮二白，就是凱因斯主義推到極端的惡果。近年中國經濟發展，恰恰是由於走向資本主義、實行市場經濟」。曹長青這樣的說法，於是關聯於第二個有必要回答這個問題的原因。

第二個有必要回答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我們或許容易把社會主義與凱因斯主義做出一定的銜接，甚至把二者混為一談。例如陶儀芬（2009）在「中國的期望與實力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座談會中，對於「現在世界對二〇〇八年金融風暴的看法和解決方法」提出意見時曾說明：「一般稱為結構凱因斯主義，是被認為和馬克思主義比較接近的看法：八〇年代時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反勞工的。意思是生產力雖然呈現大幅成長，但勞工的薪資並未跟著一起調升，這樣不對稱的結構帶來的結果就是生產過剩，消費不足（over-production and under-consumption）。面對這樣的問題，美國的處理辦法是鼓勵人民借錢消費來解決這樣的問題，而在中國因為人民太窮，無法消費，所以只有靠出口。因此在結構凱因斯主義者的看法，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政府就必須要實行重分配的政策，也就是全世界的政府政策

都得向左轉，這當然是可行性最不足的一個方案」。陶儀芬的說法，不僅籠統的強調凱因斯主義與社會主義更為親近，並且還透露社會主義（或是她聲稱的馬克思主義）的出路是較為不可行的。

不過基於前兩個原因，其實還有第三個有必要回答這個問題的原因。亦即，我們很可能因為凱因斯主義這種「聖經閱讀似」的大敘述、以及其相關的爭議，而過於籠統的解釋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動力、模式與邏輯，以至於無法看清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其現代化發展的特殊性與意義。

那麼，該如何回應上述的問題呢？首先來看現象。特別是在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風暴發生後的一段時間，恢復凱因斯主義的呼聲極高，因此能作為我們認識的出發點。

表 1 中國大陸 4 兆元投資的主要內容和資金估算（2008 年第 4 季至 2010 年底）

單位：億元人民幣

主要內容	資金估算	分配比重 (%)
廉租住房、棚戶區改造等保障性住房	4,000	10
農村水電路氣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	3,700	9
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 電網改造	15,000	38
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	1,500	4
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	2,100	5
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	3,700	9
災後恢復重建	10,000	25
總計	40,000	100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訊，2009/03/06；本文整理

（二）、一個現象

二〇〇九年，美國歐巴馬政府提出總金額 3.6 兆美元的財政預算大綱，以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向富人增稅等措施對抗經濟衰退。廖舜右（2010）便認為「歐巴馬主義」便是遵循小羅斯福總統時期的「凱因斯主義」路線、以及詹森總統所提倡的「大政府」時代的來臨；於是國家主導經濟的政策模式將修正過去自由化與全球化的金融、貿易政策。同一時期，中國政府也積極的推動諸如擴大內需政

策、「家電下鄉」計畫，「汽車下鄉」補貼政策等內容（廖舜右，2010）。如果光從現象而言，不論是美國、亦或社會主義國度的中國，都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發生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政府部門開始擴大投資。這樣的現象，是否就能稱爲是凱因斯主義的抬頭？或許我們可能要先瞭解凱因斯主義的歷史發展脈絡才行。

歷史學家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 2010: 172- 175)仔細鑽研與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關的歷史文獻，他提及在一九三〇年代（即全球經濟蕭條的年代），凱因斯曾出席麥克米倫委員會，針對當時英國的苦況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當時凱因斯提出七項可能的補救方案，其中第六項，就是指國內投資或是推動公共工程，這是當時凱因斯最愛的補救方案，但凱因斯同時也認爲這個選項「相當符合常識」，要簡單得多。彼得·克拉克認爲凱因斯從一九二四年直到一九三〇年以來的論證與思考路線，是把當時金本位制對英國所造成的問題視爲既成現實，而且在金本位制不可更改的前提下，才認爲公共工程的施行是合理的。克拉克並且指出，凱因斯當時提出的見解，於是成爲現在所謂的「凱因斯學派」；雖然以當時的凱因斯而言，他提出的論證也只能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才有效，而非在理論上固守一致。

不過若先撇開對「凱因斯」、或「凱因斯主義」的歷史考察，而以一種靜態的「凱因斯主義」原則而言，中國與美國似乎都在進行「凱因斯主義」式的改革。何況從失業率來看，中國似乎更需要凱因斯主義。曹長青（2009）指出，雖然美國在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失業率飆升到 8.1%，但是和中國、歐洲相比，還是有相當的不同。他強調，雖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二〇〇八年中國城鎮人口失業率是 4.2%，但中國的統計方式和西方不同，它只統計城市人口，而不是按全國人口計算，亦即失業率一定更高；即使就「城鎮」失業率而言，也被專家指出可能過於偏低，一個證據就是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所示，中國城鎮失業率在當時可能已升到 9.4%。曹長青（2009）最後還指出北大經濟學教授蕭灼基的說法：「中國的失業率是全世界最嚴重的」。

凱因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英國《國家報》上曾發表〈失業需要激烈的救濟措施嗎？〉(Does unemployment need a drastic remedy?)一文。當時英國的失業率是百分之十，它是一次大戰前人們可以接受的正常失業數字的兩倍。凱因斯在文中表示「我們必須尋求『繁榮是累積的』這項原則的支持。我們陷入既有的模式之中。我們需要一股推力、震動與加速。」(彼得·克拉克，2010：108)。或許正如歷史學家克拉克所言，凱因斯提出的見解可能不是一個完整的政策，而是一種心態。但即便就心態上而言，既然中國在二〇〇八年之後的失業率可能更為嚴重，那麼推動公共工程的勢在必行自然就更有理由了！也似乎更能說明中國正在往凱因斯主義的方向邁進！

其次，凱因斯主義極為強調政府作為一個行動者所具有的重要性。這源自於凱因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²對於「節儉的矛盾」的論述。這是一個有趣的論證過程。從個人層次而言，如果個人儲蓄能讓個人富有，那麼儲蓄應該也能讓社群富有才對；但凱因斯卻認為，過度的節儉會形成惡性循環，產生週而復始的價格下跌、利潤減少、就業減少、所得減少、與景氣蕭條。克拉克(2010：222)遂認為凱因斯的描述：「對個體為真的事物與對總體為真的事物做出了區別」。的確，一旦牽扯到管理眾人的事，不管是經濟亦或政治面向，都需要總體性的思維與行動，它需要的是一個能夠組織、管理、發展一個眾人事務的機構。所以凱因斯才告訴我們，當一個市場失靈的時候，必須依靠政府！

就政府干預而言，凱因斯主義與自由主義經濟論點的差異，相信一般人均耳熟能詳。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論點，是希望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越少干預越少；反之，凱因斯主義則希望政府採取積極主動的心態，劃定策略，加速與促進政治經濟的發展。那麼，凱因斯主義的運作執行者，必須是個強政府！

中國政府應是現今世界最值得關注的「強政府」。孫忠良(2010)指出，當

² 以下簡稱《一般理論》。

中國政府推出擴大內需政策的投資計畫時，中國中央政府各級部門與地方政府行動的速度、效率，實則高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想像。這不只表現在中國政府對於政治動員、力量整合的優越性，還在於表現出中國政府對於經濟層面的宏觀和微觀調控，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計畫手段等。中國政府的強勢作為，實則讓西方國家刮目相看。

既然如此，從二〇〇八年以來中國政府相應作為所產生的現象，似乎可以很輕易的相信，中國改革開放後所從事的市場經濟發展，正是所謂的凱因斯主義下的產物。但現象與本質或許都應兼顧。有時單純從現象的片面瞭解，往往會誤導我們對於事物本質的認識；特別是以事物本身的歷史角度來辨明自身本質時，現象的謊言很容易就被拆穿。

（三）、回歸歷史

首先，從政府作為一個行動者開始說起。中國政府有別於起自凱因斯理論所建立起的、西方兩黨政治範疇下的政府發展形式與運作邏輯。我們就以凱因斯本人的歷史來作為說明的出發點。

與其說凱因斯是單純的經濟理論家，不如說他是一個政治的動物。這才使他能注意政治經濟整體協調運作的重要性。凱因斯在一次大戰時期擔任過財政部官員，當時他已在英國財政部開始專注匯兌移轉的效果，並瞭解盟國間複雜的資金流動情況（彼得·克拉克，2010：69）。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凱因斯本人已開始從事更為活躍的政治活動。特別是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危機、英國在邱吉爾領導下努力求得民族生存時，凱因斯成為英國財政部最高階層的決策者。隨一九四五年大戰突然結束，凱因斯還必須與美國協商，希望以大量美元貸款來流通英國經濟，藉此過渡到和平時期（彼得·克拉克，2010：25-26）。如果再看看凱因斯曾經參與的重要會議，便可以發現他的重要影響力，諸如：一九四三年的貿易談

判；一九四四年參加布列頓森林國際貨幣會議、租借談判；一九四五年進行戰後貸款協商；一九四六年參加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開幕會議（彼得·克拉克，2010：130）。

凱因斯這樣一個人，或許能透過他先讓我們瞭解西方兩黨政治下的、特別是以英國為主要例子的政府運作模式。的確，透過克拉克（2010：68）的說明，凱因斯早在英國財政部工作時，就已經發現英國財政部所具有的主導性。克拉克（2010：133）認為：「英國的憲政模式（凱因斯是在這種模式下成長的）屬於單一行政模式，若能獲得穩定國會多數支持，便能擔保大臣所做的任何決策都能獲得通過；亦即實務上是由財政部協調整個體系」，同時英格蘭銀行也與英國財政部進行密切合作。

這樣的說明使我們能理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它獨特、歷史層次的發展邏輯與運作模式。克拉克對於英國政治經濟體制的說明，其實符合 Niall Ferguson（2001）所提出的權力四角概念：英國光榮革命後，權力的四角合併，亦即債務管理體制、中央集權科層徵稅體制、透明議會預算編制程式、新生中央銀行體制，成為一個整合的系統，使得英國體系不同於兩個主要歐洲大陸體系（荷蘭、法國體系）。這一個整合的系統之中，即作為資本主義與國家結合的日不落國——英國的政府體制中，其財政部扮演關鍵重要的角色，並且是兩黨政治體制下的產物。凱因斯所建立的理論思考，是為了解決英國體制下的問題而提出的建言。正如克拉克所認為（2010：40），歷史的凱因斯，其思想勢必受到當時時代的影響，我們不能妖魔化或神化凱因斯。當然，我們更不能擴大其後所形成的、靜態化的凱因主義的功效！

相對於西方兩黨政治結構所形成的政府體制，中國現今的強政府，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領導下的政府。如果依照孫忠良（2010）過於誇張的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強政府」，那就是：

「一個集合眾多社會精英和先進分子、組織嚴密、具有巨大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執政黨，一個能夠動員和調動所有國家政權力量和政治資源於同一個目標和任務的執政黨，這一巨大的組織和政治優勢是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如何所不能比擬的」。

亦即，中國政府，是一黨專政的政府、是黨政合一的政府。光是從政治體制而言，就與形成凱因斯主義的西方政體不同。這也使得孫忠良（2010）所定義的「強政府」，勢必要適合中國政府的發展脈絡：

「所謂“強政府”，指的就是在矛盾極為尖銳複雜的社會轉型時期，能夠有效地維持社會秩序、應對國內外的各種挑戰、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促進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的、有較高治理能力的政府」。

孫忠良對於強政府的定義，諸如使用矛盾、尖銳、社會轉型、組織、動員等字眼，關鍵就在於中國一黨專政背後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2001: 76）曾說明：

「社會主義特別有異於自由主義之處，是它相信「進步」需要一隻很大的手來協助才能獲致，無此大手協助，進步將會是個非常緩慢的過程。」

雖然社會主義者都耳熟能詳馬克思對於現代國家行政部門的批判，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列寧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造，使得無產階級一黨專政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主要政體，特別是中國。於是，靜態的凱因斯主義，怎能完全解釋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光是凱因斯主義的創始者本人，便極端排斥社會主義。凱因斯面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時，曾宣稱：

「我不相信階級戰爭或國有化能吸引或刺激現代人的心靈」；

「資本主義在明智管理下，或許比眼前任何其他體系更能有效率地達成經濟目的，但資本主義本身在許多方面極為可厭。」（彼得·克拉克，2010：110）。

克拉克進一步強調，凱因斯以經濟綱領攻擊當時的自由市場學說，但它並非來自社會主義。他只想減輕不公與解決資本主義本身的弊端，但凱因斯始終信奉市場的獨特價值——前提是市場必須適當運作。事實上，凱因斯認為當時社會主義教條有許多仍固著在馬克思時代的問題上，而馬克思時代早已結束於他出生的那一年（彼得·克拉克，2010：110）。

總之，凱因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反資本主義教條不會比自由放任的教條更好，雖然他個人是努力抨擊自由放任教條的先驅。是故，凱因斯本身不是社會主義者，他頂多是「改良式資本主義的救世主」。（彼得·克拉克，2010：234）。既然如此，又怎能強調凱因斯主義是中國的良藥呢？這顯然是一種去歷史化的強行移植。其實，由於「凱因斯主義」本身的複雜性、多樣性，這樣的大敘述本身就有自己的內在矛盾，一個特別模糊的概念，又如何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後發展的特殊性呢？比方就英美兩國而言，凱因斯主義便呈現不同意義。

雖然英美兩國都是以健全貨幣與平衡預算為基礎的自我調整體系，但是英美政治文化仍有重大差異（彼得·克拉克，2010：235）。美國在一九三〇年代晚期所進行的一項政策辯論結果，便顯示美國政府的政策除專注於投資外，也開始強調消費。一九三八年，當時美國的經濟學會會長韓森（Alvin Hansen）開始賦予凱因斯主義一種美國本土色彩的詮釋。韓森認為新政的支出使預算出現赤字，這樣的結果其實不需要感到恐懼，應該持續施行（彼得·克拉克，2010：239）。雖然直到一九三六年為止，羅斯福新政的確擴大赤字，但各年度的聯邦總開支從未超過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六，而且通常被國家或地方的經濟刺激效果所抵銷。然而，美國凱因斯主義逐漸導向「消費」增加，而不是「投資」增加，「美國凱

因斯主義逐漸等同於以預算來操縱消費水準的財政策略」(彼得·克拉克, 2010 : 242)。

其次就政府部門作為整體社會經濟的行動者而言,直到一九三五年的改革,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才獲得政府部門的領導地位,但聯準會仍缺乏與財政部的政策聯繫。相對於英國而言,英格蘭銀行與英國財政部的緊密聯繫卻是毋庸置疑的(彼得·克拉克, 2010 : 242)。如果美國凱因斯主義總是與政府財政赤字連結在一起,那麼凱因斯本人所撰寫的《一般理論》,卻只有兩處文字直接提到預算赤字(彼得·克拉克, 2010 : 244)。第一處提及的原因,是凱因斯強調政府若能容忍赤字以維持失業救濟金的支出,那麼經濟蕭條將獲得減緩。也就是說,在經濟大恐慌時,政府若能援助失業者,就會減少負面的衝擊。凱因斯反對的只是在不景氣期間自我毀滅地嘗試以削減開支來平衡預算,那麼將錯誤地延長不景氣。第二處提到赤字的原因,是指若要「舉債支出」又要避免浪費,政府就要比私人企業更有能力選擇正確地計畫。

是故,「凱因斯仍然傾向在基礎建設上進行公共投資,最好是能透過『資本預算』來挹注公共工程,而讓一般預算維持平衡。他曾提醒英國財政大臣不要把資本預算的基本觀念與特定鋌而走險的權宜赤字融通混為一談」(彼得·克拉克, 2010 : 246)。

當美國國會總是為了迎合特殊利益而通過支出法案時,當美國正不斷擴大財政赤字、使得至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三日美國的國家負債總額達到 11.516609170852 兆美元之時(朴宗世, 2009),英國的發展情況又是如何呢?克拉克(2010 : 254)提出較為仔細的說明。雖然一九四五年英國國內債務負擔占了國內生產毛額的 240%,但戰後,英國財政大臣的重要目標就是經濟成長;一九六五年,國債只占國內生產毛額的 96%;一九八〇年,降到 48%,直到世紀末都一直維持同樣地水準。只是彼得·克拉克這樣的說明並不是強調英國的債務正不斷減少,³而是

³ 英國一九四五年的未清償債務有兩百一十三億六千六百萬英鎊,但兩千年的國債是這個數字的二十倍以上(彼得·克拉克, 2010 : 254)。

指英國國內的生產毛額成長，其在相同期間內，實質成長了一百倍以上，如果去除通貨膨脹因素，債務實質負擔減少了 80%。

那麼，英國與美國的歷史發展，其實述說不同的「凱因斯主義」。美國不斷以預算赤字擴大消費的作為，甚至可以說不完全雷同於凱因斯本人的說法。但人們往往以靜態的思考來面對凱因斯主義，甚而忽略歷史的動態發展對於理論產生改變的意義。例如學者李義平（2009）便藉由「生產」與「消費」的對立概念，極為突出的陳述凱因斯強調消費的重要性，這就是對凱因斯的誤讀。

因此克拉克強調（2010：255）：「世上不存在單一、靜態與正典的凱因斯思想版本」。凱因斯自身建立起的理論，有其時代背景，正如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提醒：「凱因斯的忠告首先是對英國的忠告，即使是向其他國家提出呼籲，但總是屬於英國的問題」（克拉克，2010：236）。而且若依照克拉克對凱因斯個人的歷史與理論的探索，可知凱因斯的理論本身基本上是對於市場經濟出現失靈時的一種分析架構，它是奠立於市場經濟的分析層次，它頂多是針對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分析手段，但它卻不足以作為中國此一社會主義國家在針對改革開放過程所具有的一種總體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法論基礎。

首先，中國自身特殊的社會經濟結構所形成的特殊時空樣態，絕對不同於凱因斯當時所處的英國，因此自然無法用凱因斯主義來解決中國關鍵的結構性問題。一些中國內地學者已充分意識到靜態凱因斯主義是無法解決中國現存問題的。例如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他認為凱因斯主義只是一種經濟形式的分析架構，無法解決目前中國的關鍵問題（刑少文，2010）。雖然許小年在話語中，透露出他是較為以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來說明中國的特殊發展之處，但他畢竟點出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至於北大經濟學教授張維迎（2011）更明確的指出：

「今天如果你要理解中國經濟的轉型，首先必須放棄凱因斯理論」。

雖然張維迎（2011）強調「凱因斯理論」造成中國的 GDP 由消費、投資和出口等三者構成，因此必須拋開凱因斯理論，而著重私人企業家創造的論調；不過他卻著實點出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不能單純以凱因斯主義思維來進行行動的推進。那麼，針對中國長時段以來所形成的獨特社會經濟結構、及其轉變，也將是我在接下來的論文中，必須處理與面對的關鍵之處。

其次，凱因斯主義是一種針對經濟分析所形成的理論架構，它本身不能上升至方法論層次。由於中國自身社會經濟結構的特殊性，使得凱因斯主義不能作為中國未來持續改革開放的、實踐的主要理論依據；同時，凱因斯主義也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所從事的整體性發展脈絡，因為中國社會主義一黨專政很可能有其自身的方法論基礎、有其特殊的行動邏輯。凱因斯本人是針對他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建立起理論架構，這使得後來延伸的「凱因斯主義」根本不能完全解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發展情況。

如果單就執行的方法、而不是方法論層次而言，與其說凱因斯主義的操作模式雷同中國發展模式，倒不如說凱因斯本人在理論與實踐相互辯證的行動特色上，更為雷同鄧小平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發展模式。一九二〇年代的凱因斯，便認為當時英國的主流體系是「個人主義與自由放任」的產物。他表示這樣的信仰體系可能只意味著對市場的盲從與迷信，並使得原本做為手段的市場，卻反客為主成為目的本身。所以他強調現實的處境正需要一種實驗手段來促進經濟復甦（彼得·克拉克，2010：18）。因此凱因斯基本上是反教條的一位人物，雖然不清楚凱因斯所追求的價值目的是什麼，但凱因斯很清楚的強調，市場作為國家發展的一種手段，並非萬能，而且需要管理與干預。那麼在市場作為推進國家發展的一種方法、手段上，是需要不斷持續注意與修正的。

從歷史學家克拉克發現一份起自一九二九年秋天由工黨少數政府所成立的官方委員會、並進行長達十二個月逐字紀錄英國財政與產業現況討論的文件來看，凱因斯認真行動的面貌是一種：

「從純粹的經濟理論轉向立即實用的政策（而後又返回經濟理論）」的一種循環過程（彼得·克拉克，2010：148、151）。

這使得「凱因斯的思想不應被化約成簡單的公式（尤其是數學公式）以及被貼上『凱因斯主義』的標籤」（彼得·克拉克，2010：148）。因為凱因斯太常根據實際的情況需求，而改變自己的想法，所以精簡他的學說沒有任何意義。這樣一位著重實踐的政治人物，一位著重實踐與理論辯證的人物，其實在方法上正與中國共產黨的實踐與理論循環過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黃宗智（2005）曾提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階段，便把認識的集中點放於村莊和農民的實踐，而產生進一步變革，即從實踐認識出發，進而提高到理論，然後再驗之於實踐；中國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經歷就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參與式調查」；「甚至可以說，唯有在中國的現代史中才能看到西方人類學的認識方法被成功地當作革命戰略而運用於全社會」（黃宗智，2005）。黃宗智（2005）強調這種實踐認識論是「與西方現代主義的認識論截然不同，這樣的認識方法不同於形式主義從理論前提出發的演繹方法（它也不同於歸納方法，因為它不僅要求從經驗研究得出知識，更要求把知識提高到理論層面之後再返回到實踐中去檢驗）」。

亦即黃宗智所謂的實踐認識論——就是以實踐先行，進行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踐的不斷循環過程——同時也提供一個角度，讓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共產黨於改革開放時期的行動方法，應有其自身特殊的歷史背景，亦即實踐與理論相互辯證循環的過程應有中國共產黨自身歷史傳統作為所產生的影響。這樣的方法，是否與凱因斯本身的行動邏輯更為相像？是的，我認為其實比「凱因斯主義」還要更為相似，因為「凱因斯主義」已經是一種教條的陳述！

凱因斯雖然有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但他仍是反教條的！這成爲一種共同點，亦即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也在否定舊有的社會主義教條。同時如果說凱因斯的理論觀點與中國共產黨的執行面有類似之處，那就是指

他們同樣都是針對市場經濟機制進行調整與試驗，但發展方向的基礎則完全不同，一個是在既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進行對自由放任教條的批判，一個卻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底下開始試驗、開放市場經濟，但卻不是「放任」，並有著不斷試驗的發展。

即便在方法上，凱因斯的實踐可能更接近中國共產黨的心態與作為，卻不能表示中國共產黨在方法論層次是等同於凱因斯自身的哲學背景。雖然我們不清楚凱因斯的哲學背景，但應注意中國共產黨本身在方法論層次的特殊性，特別是所謂的辯證唯物論——此一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方法論基礎；這一個凱因斯本人根本不願深究、卻深具馬克思主義本質、與中國哲學背景的方法論基礎。由於方法論本質的不同，表示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修正者，而中國共產黨則是馬列主義思想下的執行者；亦即背後基於不同世界觀所具有的方法論認識，就在根本上展現不同。總之，「凱因斯主義」無法上拉至方法論層次，在中國一黨專政下，基於馬列思想的世界觀而產生的獨特理論與實踐辯證過程，也不能從「凱因斯主義」中獲得較好的詮釋。

本文至目前為止的陳述，並非先說明中國特殊性的方法論是什麼，而是首先必須強調凱因斯主義根本無法說明中國的特殊性，因為在方法論層次就站不住腳。如果站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現代化發展「不是什麼」的立場而言，中國首先就不是凱因斯主義的門徒，它在現代化發展過程所得的病，凱因斯主義也無法醫治，因為本質上就是不同的東西，即便現象上的方法作為有可能看似雷同。那麼，要說中國是「某一種凱因斯主義形式」的說法，則只是對凱因斯主義這種大敘述的擴容，實質上無法解釋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現代化發展的特殊性。

苑舉正（2007）在討論孔恩（T. Kuhn）之《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對現今各學科的應用時，他所提出的論證方向應可作為本文進一步探討的依據。苑舉正（2007：50）強調應該在方法論層次意識到：不應該以「相對主義」的簡化方式來看待科學的發展，反之更應強調科學是無法被

規則化的「實作活動」。這樣的申述，是來自苑舉正（2007：53）認為孔恩將科學從「實證主義」（positivism）或「客觀主義」（objectivism）的主流科學觀之中「解放」的時候，卻出現負面的觀點：「多元主義」（pluralism）或「相對主義」（relativism）的振興。

而所謂「多元」或「相對」主義的立場，就是指各個理論典範之間，都沒有客觀的標準足以對它們之間的優劣做出立即而且明確的判斷（苑舉正，2007：63）。如果造成這樣的「相對主義」立場，那麼只要一個科學社群有足夠的辯解能力說出自己的理論特殊性，便能成爲一個典範，似乎過於的輕而易舉。不過苑舉正（2007：64）認為，「相對主義」並不是孔恩所贊同的立場。因爲「相對主義」往往使典範成爲一個概念，並極有可能在脫離歷史事實的情況中，遭到誤解（苑舉正，2007：71）。反之，孔恩其實強調「價值」對理論選擇的作用性，科學家會對因不同理論賦予不同價值的緣故，而處於不固定的狀態中（苑舉正，2007：72）。這種對於「價值」的肯定，其實就是在方法論層次強調從歷史實境中出發時，行動者主觀立場的重要性，承認主觀因素是構成知識的必然部份（苑舉正，2007：78）；而且仍有其「客觀價值」的彰顯（苑舉正，2007：75）。亦即價值中所做的陳述，是一種判斷的表達，而不是品味的申訴，關鍵是可以被公論的（苑舉正，2007：80），而不是一種所謂放諸四海皆能使人遵循以獲得知識的、傳統的客觀原則（苑舉正，2007：76）。

那麼我可以這樣強調：一個理論典範的形成，是在一個具有前後歷史脈絡的方法論中形成的，是必須在方法論層次上考量其特殊歷史因素的。若是以單純靜態「相對主義」式的概念，亦即如本文前述的「凱因斯主義」模型概念與「社會主義」概念在執行手段上的雷同性進行靜態歸納比較，我們將無法認清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發展脈絡。除非，中國政府本身就宣稱自己已經徹底擺脫改革開放前的、基於社會主義的方法論脈絡，並採取所謂的西方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式的歷史發展脈絡，要不然我們不能立即的以任何一種西方的理論模型來對中

國的發展模式進行套用，因為這並不如同應用層次的、方法層次的微軟作業系統！

如果我們無法從起自中國共產黨這個主體因素所形成的社會主義世界觀，以及基於此世界觀所形成的那種主宰、控制著理論與實踐循環的方法論進行客觀的認識，我們仍將無法認識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現代化發展本質。

我想關鍵還是苑舉正（2007：55）的看法：

「如果「典範」本身當成一個知識的判準的話，將因為不具使其有意義的背景，而成為沒有意義的空洞概念」。

亦即，關鍵便是歷史脈絡，理論模型是無法從歷史脈絡中抽離的。要探討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特殊現代化發展動力或模式，關鍵就是必須從中國自身內部的歷史脈絡查找起。中國並不是凱因斯的病人，更不能把「凱因斯主義」拉高到方法論層次來詮釋中國的發展。基於中國是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目前最迫切的任務，便是要認清辯證唯物論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所具有的本質意義。

研究中國辯證法的田辰山學者（Chenshan Tian，2008：1）指出：

「或許，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思想中提供與中國哲學傳統相應部分之對話機會的最為重要的要素。在這一對話過程中，發展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版本，這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體系在毛澤東的思想中達到了成熟。在這其中具有突出特色的部分就是有關“dialectics”或辯證法的解讀。現在中國流行的哲學術語“辯證唯物主義”，不僅貫穿於哲學層次的對話之中，而且也已成為普通人生活言說和思維習慣中的日常用語了」。

倘若「辯證唯物論」作為一個方法論已經是中國起自社會主義革命後人們日

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那麼就不能否定「辯證唯物論」在方法論層次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現代化發展的影響。我認為，「辯證唯物論」將不只影響人們的思維習慣與生活言說，「辯證唯物論」更可能作為一個內在關聯的本質，在社會經濟的實踐層面引導中國社會經濟體系的發展與運作。不過本文到目前為止，首先是對那種以凱因斯主義來進行對中國詮釋的說法，做出否定與澄清。

二、動力學研究——對中國現代化發展內在動力邏輯的探討

中國自一九七八年進行「改革開放」的現代化發展過程，倘若依照吳介民（2009：1）的看法，則一般台灣學術界的主流論述，是指向中國大陸的「市場轉型」（market transition）議題。在這樣一個主流議題底下，一般在台灣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可能會提出兩個關鍵問題：

中國正在走一條不同於西方典型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嗎？

中國可以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新典範嗎？（吳介民，2009：2）

即便吳介民（2009：2）有說明一些學者的觀點：「中國模式縱使在中國行得通，它也無法推廣」；但他仍然承認，因為「世界政治強權之間權力關係的消長」以及「反應了世界學術強權對於中國快速成長及其後果的高度關切」，使得「中國模式作為發展典範」的提法，仍然備受關注。然而透過吾人於前文論述的觀點，會發現「典範」的使用必須極其小心，倘若流於靜態、去歷史化的論述觀，將只會出現許多沒有意義的空洞概念。

首先，如果以目前既有的典範模式來詮釋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將是一種誤解；如前文提及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霸權，以過於偏向經濟面詮釋來理解整個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戰略，進而提出中國是否「執行或者偏離凱因斯主義模型」

的虛假問題論述，就是一種典範的濫用。其次，若特別靜態的強調「中國模式」對未來世界發展的普遍性意義，亦即「中國模式」若只是因為世界強權間的權力消長、若只是因為誰掌控更多的話語權、誰的說話比較大聲，就因此決定「中國模式」的理論重量與強度，則「中國模式」也只是造成第二個「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後果，不只不一定能在世界其他地區使用，甚至會對世界造成不良的後果。亦即，研究者不能作為中國政策的辯護者。

相信吳介民以及其他研究中國問題的社會學者已經體認到對歷史過程探討的重要性。吳介民（2009：3）就提出對「中國模式」的探討必須謹慎且小心的原因：「市場轉型」並不是單一且統合的歷史過程，因為在中國各區域便發生了多樣化的面貌。所以吳介民（2009：2）認為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涉及「經驗層面的現象確定與分析詮釋」以及「倫理實踐層面的可欲性」。似乎，一些如同吳介民研究取向的學者，是以對中國每個區域、部門現象的詳細分析與詮釋，以及每個區域、部門的各種行動發展，進行對「中國模式」的理論拼湊。

但是，如果把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難道沒有一個核心的動力運作邏輯在引導中國發展？倘若中國各個地區多樣化面貌呈現出各自為政的局面，那麼一個統合的中國現代化發展又如何可能？這似乎呈現一種有趣的景象：一個人在擠公山羊的奶，另一個人拿篩子去接；也就是指稱：不僅可能問錯問題，也可能用錯方法。例如吳介民（2009：3）指出台灣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進行幾次研討會的主題，便是企圖運用新制度論以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從事地方層次以及跨區域的研究，使得從地方層次切入「當代中國資本主義進程及其性質」的大辯論成為可能。然而探討中國市場轉型、甚至強調中國資本主義進行發展的問題意識的強調，基本上很可能過於忽視中國社會主義一黨專政的持續性與強勢性，亦即是產生問錯問題的可能性。其次，運用制度論進行各種區域性的實地訪查結果，很可能造成對於各種現象的細緻描述，卻無法整合出這些現象所具有的、共通的、本質的動力邏輯，同時可能也無法說明中國是否能在某一核心思維

運作邏輯之下產生一個具整體性的發展動力系統。那麼，對於中國現代化發展進行理解與詮釋的關鍵問題，可能不在於「中國模式」的探討；反之，可能是一種動力學的探究。

一旦我們將探討中國的發展依附於各區域、部門在不同時空的聚合而在質量上展現出中國模式的諸多可能性之上，我們將因此過於忽略中國共產黨此一對象的主觀能動性，特別是中國一黨專政對中國發展所產生的一種力學性整體的發展態勢。既然中國被視為一個強政府，難道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一個核心動力邏輯在引導整個中國社會的多樣化發展嗎？這問題很重要，而且將更為突顯中國動態過程演變的動力邏輯本質究竟為何。

吳介民（2009：3）指出中國各區域多樣化面貌的展現，是將「地方制度分析扣連於全國性政策變化以及國際政經壓力的脈絡下」，才得以觀察的。亦即他明確的說明中國地方與中央以及與國際的連結，會導致制度的分歧與趨同。那麼關鍵或許不是在於靜態制度面的比較而已，而是必須理解中國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的整體，在一黨專政下具有一種特定的動力發展邏輯，而且發揮重要的槓桿作用力，流竄於這些連結的制度之中。雖然進行中國各區域內部制度的比較有其必要，但是，是否有一個核心的動力運作邏輯來引導制度的差異與趨同呢？是否此一核心動力邏輯能夠在改革開放之後繼續產生能量，進而促成中國共產黨能產生一套整合的、推動現代化的發展動力系統呢？這二個問題或許更為重要。那麼，我基本上就會把問題導向於中國一黨專政在推動現代化發展的內在關聯的探討層次上，而不是探討各個部門、區域從表象所取得的、可能的、靜態的「中國模式」的探討之上。面對必須從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內在關聯的探討作為起始點的研究立場，一些早期對中國現代化發展進行研究的學者，使用了「內捲化」的概念來加以探討，這使得我們必須對這些早期的研究做出一定的瞭解與認識，以有助於進一步建立起核心的問題意識。

三、「內捲化」概念的過時與不足

針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研究探討，特別是中國自改革開放後關於政治層面制度變遷的探討，已有台灣學者進行論述。趙建民、張執中（2004：299、301）對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的種種變化，特別是在組織與制度方面的調適，包括黨的包容性的擴大、資本家入黨問題、黨內民主倡議、以及黨在變遷過程中難以突破的困境等議題，便利用政治上動態持續過程的分析架構，進行細部討論。這種從政治層面切入的研究方式，基本上可以彌補在探討中國「市場轉型」議題時可能較為偏重經濟層面所帶來的偏頗認識。不過，趙建民、張執中（2004）在〈組織內捲與列寧式政黨的調適與變遷：中國共產黨個案分析〉一文中，雖然強調中國共產黨如何在既有傳統制度上制約著政治變遷，但比較沒有提到政治層面對於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亦即兩位學者並沒有注意在既有的傳統一黨專政制度中，中國共產黨是以怎樣地機制促成中國整體社會經濟的總體變遷。然而，吾人以爲有必要針對該篇文章進行回應，以彰顯本論文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中國如何在一黨專政下產生獨特的動力邏輯，並足以讓中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過程能持續發展。

趙建民、張執中（2004：300）所撰寫的該篇文章，基本上是結合所謂的「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與「組織內捲化」(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的概念，探討中共在組織與制度上的調適過程。他們在文章中聲明，以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可以藉由「權力不對稱」(asymmetries of Dower) 的概念，突顯中共黨國體制的制度變遷過程與分配效果；並申述中共此一分析主體在政治安排與政策反饋上，實際上有利於特定團體的組織與權力，並邊緣化其他團體。若這樣的權力不對稱所造成的歷史制度長期持續下來，可能逐漸「鎖死」(lock-in) 並限制未來中共的政策發展（趙建民、張執中，2004：305）。兩位學者強調，中共在歷史過程的制度變革中，已經形成如同歷史制度論的假設，一方面因爲前期制度

的遺產，導致黨組織內外的衝突、以及正式與非正式運作模式的衝突；一方面執政者又為變革設定不得逾越的前提與進行干預的權力。這使得中共雖然強調依賴法制（legal system）進行統治的力度增加，但法制又反過來削弱中共的支配權，形成制度困境（趙建民、張執中，2004：312）。

同時趙建民、張執中（2004：307）也以「內捲化」（involution）此一理論概念來詮釋中共的政治變遷過程。「內捲化」概念對於歷史現象的詮釋，在於強調一個組織與制度在歷史變遷中所存在的兩個特徵：一是沒有實際的發展和增長、一是舊模式會藉非正式規則獲得再生和持續。如果用更簡單的話語來形容，就是強調組織所建立的一些經常性的變革動力，會經常被轉化成某種因襲傳統的不確定制度，就如同水流中的漩渦，向前的推動力往往被轉化成原地打轉的型態，而且隨著運動圈幅縮小，向前推動力最終會陷於停滯、消失。

兩位學者便藉由「內捲化」概念，分析中國共產黨變遷與調適的動態過程，論證出中共「新傳統主義」的傾向，正是內捲化的結果。他們強調，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時期所具有的原始動力，是起自於革命時期的經驗、意識形態、以及相關特殊能力的認同，這些傳統元素形成凝聚共黨組織的關鍵要素。然而憑藉這些傳統要素，中共只是形成「新傳統主義」。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共產黨對於政治遺產的模糊態度，例如一方面否定文革與大躍進的暴力，但一方面又重申革命原則與毛思想，於是「使改革侷限於一種無力卻固執的新生狀態，在『內捲』與『進化』間形成一種『動態停滯』」（趙建民、張執中，2004：309、310、311）。這使得趙建民、張執中認為，中共在後革命時期，西方意義的現代官僚制度並未出現，而是朝向內捲化的方向發展，並只做出組織與結構的分殊化及理性化調整，卻「無涉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內涵」（趙建民、張執中，2004：301）。

雖然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綜合使用「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與「組織內捲化」（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的兩個方法概念來探討中共政治制度的變遷過程及其可能結果，但是從文章鋪陳來看，「組織內捲

化」概念其實扮演論述中共制度變遷的重要概念工具。不論是以「歷史制度論」還是以「組織內捲化」概念來陳述中共的政治制度變遷，基本上都已經開始將研究目的瞄準到制度發展背後的動力問題，但著重的可能是制度內部動力發展的力量對比、以及動力無法匯整而產生抵銷的態勢，而不是探討中國一黨專政底下的動力邏輯學如何成就中國的改革開放。兩位學者的探討，主要還是偏向因為制度面的傳統包袱，而使得發展動力因為掌握在主要組織集團手裡，而造成力量的不對稱，進而走向內捲化的內部停滯發展結果。因此，形成歷史制度力量不對稱的根本原因，仍在於一黨專政的共黨組織運作，正是共黨組織的內捲化結果，使得兩位學者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表示擔憂。

我們有必要回顧杜贊奇（Prasenjit Durara, 1988/ 2008）以內捲化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探討，因為他應該是以「國家政權內捲化」概念，來說明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在總體社會經濟發展上產生潰敗的第一位學者。杜贊奇（1988/ 2008：209）使用「國家政權內捲化」的概念，實則是對西達·斯科波爾（Theda Skocpol）的觀點提出了關鍵的補充說明。西達·斯科波爾認為國家政權的衰弱是發生革命的前提條件，但是杜贊奇（1988/ 2008：213）以為，「國家政權在某些方面的加強亦會導致自身的腐敗和革命的發生」。同時杜贊奇在使用「國家政權內捲化」概念時，基本上是要回應一個更為重要的議題，就是如何建立與完善國家體制，以促成國家在總體社會經濟層面的現代化發展。其實起自十九世紀七〇年代，當世界性民族國家體系開始逐步擴展國家干預範圍時，各國在面臨現代化過程都必須面對一個核心議題，就是如何摧毀舊的法統，並且建立新的法統邏輯（杜贊奇，1988/ 2008：215）。

對於杜贊奇而言，他認為歐洲國家的經歷是成功的，他們完成轉變並延續國家政權至二十世紀。杜贊奇（1988/ 2008：216）引用一些學者的觀點，認為歐洲國家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基本上經歷兩個階段：首先，是「通過在賦稅徵收中實行營利型經紀制與賣官鬻爵，從而加強專制王權對封建貴族的控制，儘管包稅

人和買官者可能吸收了部分國家稅收，但財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國家政權能夠建立起強大的軍隊和官僚體系，我們可以稱這一過程為『初步官僚化積累』；其次，新型國家政權在徹底擊毀封建結構之後，能夠摧毀阻礙國家政權進一步擴展的營利型經紀階層，進而取得現代化的成功。因此，對於杜贊奇而言，他認為「營利型經紀制」是一個必經階段，歐洲國家在十九世紀之後，開始成功逐步的轉型邁入到第二階段，但是杜贊奇卻以「國家政權內捲化」的概念，來形容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並未成功跨越第二階段，而且他同時以為，勢必有許多新興國家政權建設目標是受挫於「政權內捲化」或與之類似的東西。

當我們回歸到杜贊奇對於中國更早期政權發展的「國家政權內捲化」探討，便可以釐清「內捲化」這個概念基本上是面對一定歷史時空條件下的國家現代化議題而產生的。而在杜贊奇對中國歷史脈絡的探討中，解決國家現代化第一階段問題的，正是中國共產黨。杜贊奇（1988/ 2008：214）強調中國共產黨從基層開始建立與國家政權相聯結的各級組織，並且完成民國政權所未完成的「國家政權建設」任務。一個關鍵例證在於，中國共產黨根治自明朝以來歷屆政府無法解決的偷稅、漏稅難題。如果根據對「國家政權內捲化」概念的歷史脈絡釐清，那麼我以為，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引用所謂「組織內捲化」的概念來論述現今中國一黨專政的發展，是過時的。

其次，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比較偏向對中國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探討，而不是類似杜贊奇以更為總體的社會經濟角度來看待民國政權的發展。這使得該兩位學者容易侷限在下述的論述中：即，中國一黨專政因為其內捲化的動態發展，而無法追求西方意義下的自由、民主，進而導致動力發展的停滯。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承認關於自由民主的發展是複數的表現，而不是只有單一的西方形式時，那麼中國一黨專政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成果，是使人嘆為觀止的。

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發展呈現一個既存的事實：以西方為首的發達國家整體增長速度較慢，大約是 2%、2.2%、2.3%左右，但發展中國

家等新興經濟體，增長規模達到 6.5%，甚至是 7%、8%左右。所以全球層次的經濟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發達經濟和新型經濟處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週期，一個是在往下走，一個是在往上走」（朱民，2010）。接著，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組織編寫的〈2009 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新興市場、以及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表現差異，其實也很大。其中，以亞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二〇〇九年保持 6.5%的經濟增速，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中國實際 GDP 比上年增長 8.7%；印度實際 GDP 比上年增長 5.6%。但據 IMF 資料，非洲、中東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二〇〇九年實際 GDP 分別增長 1.9%和 2.2%；獨聯體、中東歐和西半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實際 GDP 分別下降 7.5%、4.3%和 2.3%；俄羅斯實際 GDP 比二〇〇八年大幅下滑 9%，巴西實際 GDP 略降 0.4%。二〇〇九年，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著短期資本流入和資產價格上漲過快的問題，另外一些中東歐和獨聯體國家，仍遭受外部融資困難的困擾（中國人民銀行，2010）。由整個世界在二〇〇八年至二〇〇九年的變化軌跡來看，可以顯現中國所具有的強大動能仍持續顯現。另外一個更根本的數據是，二〇一〇年日本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下滑至第三大經濟體，被快速增長的中國趕超。日本二〇一〇年的名義 GDP 為 5.474 萬億美元，中國同期的名義 GDP 為 5.879 萬億美元（華爾街日報網，2010）。因此，我們實在不能小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態勢。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只探討一黨專政政權動力發展的內捲傾向，卻沒有看到一黨專政是如何憑藉其動力邏輯，進行著市場轉型的宏大發展。

另外，趙建民、張執中在文章裡也申論中國共產黨因為政權的內捲化，所以無法形成如同西方意義底下的專業官僚體制。這樣的說法，值得商議。倘若依照杜贊奇（1988/ 2008：213）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他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獲得政權的原因不只是推翻地主所有制或是打擊帝國主義，「如果要將其歸納為一條，這就是共產黨能夠瞭解民間疾苦：從毆打妻子到隱瞞土地，無所不知，從而動員群眾的革命激情」。這樣的組織系統，即便沒有如同西方意義底下的官僚體制，

但是它的行政效率與為民服務的程度，也並沒有兩位學者說得這麼差。或許我們從近期中國在興建高鐵的過程，也可以看出中國政府本身專業的工作品質與效率。依照美國福克斯新聞網（Fox News）在二〇一〇年的說法，中國從五年前沒有高鐵的景象，頓時在不可思議、驚人的中央計畫執行效率下，在五年後使得中國高鐵建設成為世界第一。這使得美國新聞媒體開始正視與反思：中國鐵路系統在短短五年內驚人的發展，使得美國臃腫緩慢的系統顯得更加臃腫緩慢，並使得美國的發展相對而言有如第三世界國家。美國的官僚機構，就這層意義上，必需要跟中國學習（Brian Sullivan，2010）。

再來，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基本上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傳統遺產足以抑制中國政權的變革，使得內捲化過程發展直到變革動力停滯為止。但是，倘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傳統是一項珍貴的資產呢？

黃宗智（2005）在〈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一文中指出中國革命的認識論是可貴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敗迫使中國革命運動的重心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它的社會基礎也從工人轉移到農民。但當時的知識份子對農村的認識大多十分有限（來自農村的當然除外），甚至是一無所知。明清以來，中國大部分的知識份子早已遷入城鎮，脫離農村生活。到了近代，隨著城市現代化的進展，這種隔離更加顯著，城市中的知識份子和鄉村裡的農民幾乎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加上傳統儒家思維方式——一個脫離社會實際的、用道德理想替代社會實際的思維方式——的影響，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都缺乏實際的、準確的關於農村的認識。正是在這幾個歷史條件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了中國革命運動對其知識份子的特殊要求：深入農村學習，瞭解實際，從那裏找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

黃宗智突顯中國共產黨把認識的集中點放於村莊和農民的實踐，而產生革命

性的變革，即從實踐的認識出發，進而提高到理論，然後再驗之於實踐。那麼，我們是否能說如此良好的遺產是造成中國政權內捲化的一個傳統包袱呢？這也是值得商議的。

最後，杜贊奇對於中華民國政權在大陸內捲化的研究，提出一個總結性的結論，可以讓我們反思：對於影響現今中國整體現代化發展的一黨專政體制，是否能用內捲化的概念來做詮釋？杜贊奇（1988/ 2008：214）的結論是：

「在二十世紀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當國家政權的職能及人民對政權的期望迅速增長，即其增長速度超過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之時，對政權建設的要求便會產生與早期政權建設大不相同的一系列問題」。

趙建民、張執中（2004：331）兩位學者也關注到：「當執政者一味以政權的穩定為考量，忽略客觀的經社成長，違背人們的期望，因而造成當權者的主觀意願，與人民期待之間的嚴重落差，任令改革動力繼續囤積，其結果恐怕是強迫式的民主化的加速進行，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更可觀」。然而，現今中國最為關鍵的問題，不只是所謂的民主化議題，人均收入增長的問題其實更為重要。而人民對人均收入增長的速度，正如杜贊奇所言，若相對比於人民對政權職能與建設的期望來得高時，中國一黨專政政權所面對的問題就會相對不那麼棘手。

中國至二〇〇八年，改革開放就已整整三十年。中國社會雖然發生巨大變化，但中國人民的主體仍然是農民，十三億人口至少有八、九億農民。依照石仲泉（2008）的說法，當中國人口增長總量達到十五億最高值時，農民仍占三分之二以上；他推估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至少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作為農民大國的基本狀況不會有根本改變。這樣一個仍是以農業社會為主軸的國家，雖然其巨大經濟規模展現強勢性，但也顯現出它自身的脆弱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依照人均指標衡量，將七個國家列

為主要發達經濟體，分別是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但中國這個在二〇一一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則被 IMF 列為「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因為依照人均指標衡量，中國仍是一個貧困國家（Bob Davis, 2011）。

於是 Bob Davis（2011）做出一個有趣的計算：中國如果想要超越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只要「將人均 GDP 提升至略多於美國四分之一的水準就行了，因為美國的人口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目前，中國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十一分之一」。因此，中國在人均收入的追趕上，似乎還有一條長遠的道路要走，中國一黨專政勢必仍必須面對持續的「市場轉型」議題，以求得變革與發展。

因此，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確實以「組織內捲化」的概念來說明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個關鍵問題。但倘若以內捲化的概念來說明、預測中國一黨專政的未來，不只沒有深入點明中國內部的主要問題，也可能沒有進一步的解釋意義。更何況趙建民與張執中兩位學者基本上是把焦點放在中共政權是否民主化的探討上，卻並沒有對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以及農民議題多所關注，使得我們無法全然的確定是否能以「內捲化」概念來證成中國在總體社會經濟問題上政權發展的實際情況。

四、核心議題：中國一黨專政的方法論導引

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之所以使用歷史制度論以彰顯中國政權權力的不對稱，以及用內捲化概念以彰顯發展動力的可能停滯，其實在根本上是抨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中國一黨專政下的傳統元素，正阻礙政治體制的改革，並可能造成中國未來的危機。他們強調：「『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指的是基本政治制度，用以表述國家政權的基本政治屬性；至於具體的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的總和，就是政治體制。這也意味『政治體制』一詞不應該包括國體

部份，否則『體制改革』就含有改變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意思」（趙建民、張執中，2004：313）。正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本性質不能改變，所以兩位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只能在既有現存結構中進行「最適放權」與「修補」兩項動作（趙建民、張執中，2004：299、300）。所謂「最適放權」的說法，應是對應基於歷史制度論所看出的中國政權權力不對稱的關係，使得中國政權必須進行改革，因為中國「領導階層」，包括中央與地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閉性、黨內權力配置也有失衡的情況（趙建民、張執中，2004：318、319）。而進行「修補」的意思，就是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傳統結構優勢，使得中共只能不斷藉由非正式規則來融入各項發展動力，進行組織修補，強化對權力的監督機制（趙建民、張執中，2004：319）。在不斷放權與修補過程中，兩位學者認為中共呈現一種以「包容」作為主要政治改革的手段，例如黨員的甄補便是典型的調適策略，「不再過度強調階級鬥爭與階級敵人，而是對社會採取一種模糊但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調和，除了增加對民情的回應外，也表達了黨組織與成員對政治資源享有獨佔地位的政治生態」（趙建民、張執中，2004：299、323）。這樣的包容性，基本上容許更為多元的動力在共黨政權中活動，卻在必須維持中共政權的既定意識形態結構下，多元的動力反而導致無法挽回的內捲化結局，致使最終動力可能停滯。

我以為，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之所以運用內捲化這個概念來解釋中國政權的制度變遷，是因為他們看見中共為維持政權的合法性所做的持續合理化運作過程。由於要不斷確定政權的合法性以配合改革發展的實際情況，於是似乎產生一種不斷往中共自身回歸的現象，一種內捲的現象。

但關鍵是內捲的結果。亦即中共不斷確立自身合法性的持續合理化過程，是否真的造成動力發展的最終停滯？那麼，我們有必要關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以及如何看待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中國此一社會主義國家自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便開始逐步發展市場經濟，但卻仍舊持續堅持社會主義剛性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如果依照華

勒斯坦（2001：83）所認為，意識型態首先是一種政治戰略的話，那麼我們應該先詢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究竟是什麼？W. Brus 與 K. Laski 兩位學者曾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對世界人民的許諾，做出分析。或許我們可以從該兩位學者的分析為起點，去探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究竟是什麼？W. Brus 與 K. Laski（1989/2010：4）兩位學者首先強調：

「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在道德上的優越性和經濟上的優越性是比肩而立、相互補充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類解放，也就是使人類免除壓迫和不公正，已成為把生產力從資本主義過時的生產關係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一個條件和不可或缺的因素。與此同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也成為人類解放的一個條件和不可或缺的因素。兩個方面的結合從概念上說是植根於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social ownership) 概念。」

是故，可以先釐清的部份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包含一種超越既存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與先進性；並且強調人類解放、以及生產力大幅提高是社會主義發展的結果。在兩位學者的探討中有提及關於社會所有制的概念，則我們必須瞭解社會所有制是什麼。兩位學者認為，私有產權的根本，是排除非所有者對所有物的控制，則社會所有制的特徵，就必須是消除對社會成員的這種排除。也就是指：「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向社會的每一個成員提供了同等的權利，用以決定生產資料的使用方式和生產資料使用成果的分配方式」；他們同時認為「社會所有制的概念實超出公共所有制（public ownership）的概念」。（W. Brus and K. Laski, 1989/2010：4）因為如果根據公共所有制的概念，就表示必須有一個公共主體是合法所有者，而且這個公共主體必須處於社會的有效控制之下。那麼在公共所有制的環節下，就會產生一系列的難題，包括社會有效控制的形式和標準究竟為何的問題，一種政治性的問題。

於是 W. Brus 與 K. Laski 兩位學者的初步分析便已經為我們留下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想核心制度，是所謂的社會所有制，但就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例如我們所關注的中國而言，它其實是一種公共所有制，亦即國家成為主要的資源分配者，而且我認為具有兩個重要的政治性問題：

其一，中國共產黨憑甚麼一黨專政？亦即，合法性的問題。

其二、中國共產黨在一黨專政情況下，誰監督它？亦即有效控制此一公共政體的問題。

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針對中國制度變遷所看到的——中共為維持政權合法性所做的持續合理化運作過程——現象，基本上就是為了回應上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兩個關鍵核心問題。但是他們並未說明現象的本質，而只用內捲化概念來陳述了制度變遷的現象。同時兩位學者在沒有特別論述中共民主意義的本質情況下，顯然是以一種西方意義底下的民主觀來陳述中共政權的威權政體與民主發展的衝突。但我認為有一個趣味的回應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一黨專政並不同西方的兩黨政治可以相互競爭，因此中共必須自己從內部回應上述兩個關鍵問題。

於是我們必須瞭解社會事實，必須回歸中國的政治體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條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選舉是民主的表現；由人

民代表大會下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並且確定中央與地方職權的劃分，是集中的表現。」

於是若從靜態陳述中便能發現，中國政治體制是社會主義一黨專政，而其體制框架則受到民主集中制原則所制約。但這樣的體制與原則有怎樣的歷史軌跡？

一九一七年與一九四九年，俄國與中國分別建構蘇維埃工農社會主義國家，它們均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Marxism- Leninism）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做為基礎（陳振富，1999：3）。又根據北京清大教授汪暉的觀察，即便中國在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時期，仍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有著歷史關聯，就是烙印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亦即中國雖然對舊式社會主義進行改革，但並未徹底否定近代革命傳統，其中的許多因素仍是中國社會內部的活要素。像是列寧主義的先鋒政黨目的在中國仍是持續，但列寧理論的造反面向被毛澤東所稱的「群眾路線」（Mass Line）所代替，形成民主集中制（高力克，2005）。

所以，我們有必要發現中國一黨專政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所具有的歷史動力邏輯，而不是如同趙建民、張執中兩位學者只關注組織與制度的變遷，而忽視對中共主要制度背後關鍵發展動力的探討。華勒斯坦（2001：72）認為現代性的誕生，是由一種特定的社會現實與一種特定的世界觀結合而成，而一種特定的社會現實與世界觀，甚至會取代、埋葬了另一種社會現實與世界觀；亦即，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意識型態的建立，仍是由現實與理論的犬牙交錯所產生出來。那麼針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理論與實踐交織過程，特別是因應現實而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做的修正以建立的政治體制而言，對列寧的理論與實踐的關注，絕對是首要、且重要的。

回歸到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知識傳播影響的歷史過程上，田辰山（2008：58、80）明確指出西方思想東漸中國的新高潮、以及更為嚴肅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是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之後才開始。而這一波思想傳遞的高潮一直延續到三十年代。這其中包含瞿秋白的早期研究，以及許多中

國共產黨重要理論家所進行的辯證唯物論通俗化運動。突出者像是李達和艾思奇。當然，走向最後成熟階段的，是以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標誌。

列寧在一九〇八年撰寫《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之後，辯證唯物論成了蘇聯官方哲學，作為教條出現在所有蘇聯相關的文獻與著作中。而當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所接觸的馬克思主義都是來自俄文，也就是幾乎來自蘇聯的正統文獻之中（田辰山，2008：83）。因此，如果我們要探討中國一黨專政如何進行現代化發展，勢必要面對以列寧為首的辯證唯物論知識。

盧卡奇（Georg Lukacs，1991：27、29、34）便認為，重視社會主義革命現實性、重視日常問題也是革命基本問題，正是列寧思想的核心。這使得列寧能透徹地將理論洞察轉變為實踐，專注實踐的力量，使馬克思主義往具體方向邁進；正因為如此，從世界史意義來說，他是可以與馬克思並駕齊驅的理論家。是故，當我們要理解中國政治體制背後的動力邏輯時，首先必須回溯到列寧帶給社會主義體制的啓示與引導之上，同時正因為必須著重實踐與理論因果關係背後的動力發展引導，這使得前人盧卡奇對於列寧的論述，會成為我們認識的起點。

盧卡奇（1991：31）在探討十九世紀後半葉俄國的革命性質時，認為另一個問題是與革命性質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哪個階級應該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這樣的提法突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關注的根本焦點。自法國大革命引發的動盪傳遍歐洲及歐洲以外之後，「人民成為主權者」成為所有致力於改革者的新的心態，或許一直到今天，都不再有人試圖動搖這個心態（華勒斯坦，2001：95）。只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於改革與進步抱有更大的積極性作為，它認為如果沒有相當的人民壓力，不會帶來進步。但社會主義者拒絕以個人為歷史主體，偏愛大型群體，亦即是「整個人民」。正如華勒斯坦（2001：80、97）所強調的，社會主義面臨的難題就是，你很難知道哪些「群體」構成「人民」，而這又引向一個類似上述盧卡奇所提的問題：究竟要如何來界定整個人民的普遍意志？

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上，勢必會面對人民選擇的難

題；而這個難題，社會主義者往往是以階級劃分作為一種分析的主要工具。華勒斯坦（2001：105）指稱列寧主義基本上還是將社會主義導向運用人民的壓力來促成無可避免的社會改變。那麼列寧身處當時的俄國，革命群眾到底在哪？

盧卡奇（1991：32-33）認為列寧承認農村公社是未來俄國革命的出發點和經濟基礎，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也就必然使農民變成社會變革的領導階級；並且盧卡奇認識到，正因為在實踐層面列寧發現俄國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有別於歐洲，因此革命的實際發展就不可能完全依附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也就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之外尋求理論基礎，因為歷史唯物主義是關於社會必然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概念表述。

之後，「無產階級」成為一個重要的階級概念術語，它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構成概念、一個象徵集體，但對應於俄國實際層面的確實情境，其對應的主體就是農民，而使得無產階級與抽象、含混的「人民」概念決裂。無產階級成為社會變革的領導階級，它是引發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來源，但不是全部。

對列寧來說，引發社會變革動力的另一個主要部份，是一種具集中化傾向的黨組織。因為就現實性而言，列寧強調：「政治問題不能與組織問題機械地分開」（盧卡奇，1991：43）。無產階級雖然能作為改革社會的動力，但是他們需要被組織，被賦予階級意識，因此黨的功能，在於保持與促進無產階級的「活躍性」、「高度性」與「革命能力」（盧卡奇，1991：45）。列寧的黨組織思想就是根據無產階級意識，盡量嚴格地挑選黨員，以及全面聯合並支持社會內一切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盧卡奇，1991：47）。

那麼，我們可以藉由盧卡奇（1991：53）對於列寧思想所呈現「黨與階級之間富有成果的互動過程」看出，社會主義的實踐，除了必須認清教條主義可能對黨造成組織上的僵化，更重要的是，黨組織本身必須掌握各種認識總體性社會動力發展的工具與方法。因為在實踐層次，黨組織的運作一直面對社會群眾與普遍

意志的界定性問題，這表示社會主義的實踐背後，必須始終有一個動態的發展邏輯、一種屬於方法論層次的引導。

正如盧卡奇（1991：52）所強調的：策略和組織是一個整體的兩個方面，共黨必須頑強堅持原則又必須始終保持彈性，時時關注整體的社會經濟關係；這表示社會主義在追求進步的積極性上面，必須在實踐層次更為關注社會動力的來源與推動，亦即關注社會的自覺與能動成份，作為一種起自社會內部的持續性發展動力。

列寧在面對實踐層面所建立的理論與執行方法，同樣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阿里奇便指出（Giovanni Arrighi, 2007: 374）：中國政黨軍塑造出隸屬中國農村社會的層級（底層），而成為一個具革命性的力量，而且與這些底層階級的價值與抱負相互塑造。於是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改革前後）中國現代化的基礎，不是基於西方工業革命的內在化，而是基於固有的、農民基礎的特徵之復甦，所從事的勤勞革命。

這樣一種自覺、能動的在黨組織與被剝削階級的相互互動過程，不只說明中國的現代化不同於西方工業革命意義的現代化過程，更彰顯執行現代化過程的政府官僚組織，也明顯的不同於西方兩黨政治意義底下的官僚體制。黨員能力如何適當的面對遭受苦難的群眾生活，是建立共黨意義底下形成強大專業官僚機制的一個重要原因！

無可諱言，列寧的確是把國家當成一種階級鬥爭武器，如果依照盧卡奇（1991：82、85）的看法，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是分裂與瓦解受壓迫階級；但社會主義的個人，並不是抽象公民、孤立原子，而是具體的人，他們不是非辯證的多數，這使得列寧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國家，其實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完全公開、而且承認它是一個階級國家、一個鎮壓機器和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

但我們應該關注的是，是怎樣的一種動力邏輯能讓列寧將國家視為一種鬥爭工具？而且依照這樣的動力邏輯而言，又能夠說明列寧當時對共黨國家的定義就

完全是定型的嗎？

盧卡奇強調（1991：53）列寧的組織概念本身是辯證的，「它既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歷史發展有意識的促進者」。列寧的現實主義不只排除烏托邦主義而僅僅成爲一種實踐理論；反之，更是盧卡奇（1991：91）在當時所認爲的「表現唯物辯證法迄今所達到的最高階段」。

我認爲盧卡奇因此做出一種表態，那就是社會主義在實踐層次之所以能夠不斷從社會整體內部激發自覺與行動力、並進行持續性指向未來的變革、而能推導出眾多的行動方法的背後，實際上有一種我稱之爲的「方法論導引」在推動社會整體進步。而社會主義的方法論導引，正在於辯證唯物論的作用。

盧卡奇（1991：92、95）批判地強調：「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習慣思維方式使每一個人——特別是那些愛做系統研究的人——具有想完全按舊事物說明新事物，完全用昨天的一套來說明今天的一種傾向」；反之，唯物辯證法要求「在發展的進程中全面考察有關的社會現象，從所有外部的、可見的表現中歸結到它們的基本的動力——歸結到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發展」。

那麼，我認爲儘管先不去陳述資本主義動力邏輯（事實上馬克思已經說得很清楚），最起碼社會主義的動力邏輯，就在於辯證唯物論引導上對社會兩個根本的動力能源（生產力、階級鬥爭）所進行的辯證推動。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正是在辯證唯物論引導下所產生的方法、工具，它並不具有確切的永久性質，卻有著關鍵的階段性任務，而這樣的任務就在於面對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如何從公共所有制轉變成爲社會所有制。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如同資本主義必須面對自身所建立的危機，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面對此一核心問題而在社會進步過程中持續面對屬於它自身所創造的危機。

因此正如盧卡奇（1991：102）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的每個轉捩點，都同時是一個關鍵性的黨內問題」。社會總體需求的轉變、以及社會問題的發生，就會促成黨的改變，形成一種力量發展的重新組合。

一些研究者的觀點，其實並沒有盧卡奇講得這麼透徹。例如陳振富（1999：4）認為：「馬列共產黨的一切策略與行動都是以『理論』與『實踐』，『思維』與『實在』，以及『目的』與『方法』的『辯證統一』為前提。它的理論指導是馬列主義，戰略基礎是階級鬥爭論，策略手段為無產階級專政論」。該學者其實在其論文的說明中也有引用盧卡奇的論述，但可以發現這樣的說法只是把一大堆馬列思想的術語全部放在一起，但卻沒有產生一個對社會主義具有統合動力邏輯的說明。這也造成陳振富在〈中、蘇共無產階級專政實踐之評析〉一文中，明顯的出現認識錯誤。陳振富（1999：59、60）認為：「整個來說，『無產階級專政』由馬克思到毛澤東，是一個由「手段論」(Methodolog)到「目的論」(Teleology)的異化過程」；「『專政』與『民主』根本上就是對立的概念，不論『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踐時是一政治狀態抑或政府形式，它基本上是一個專政體無疑，此時馬克思所標榜的無產階級革命所爭得的『民主』也就蕩然無存」。基本上這樣的說法，就是忽略無產階級專政背後的方法論導引所帶來的影響，進而產生錯誤認識，即便陳振富常常在論文中引用到「辯證」兩個字。

總而言之，當社會主義國家在面對邁向社會所有制所產生的各種反覆出現的危機的同時，已經將馬克思主義那種飄在雲端上的理論拖曳至人間，而使得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面對理論與實踐的反覆辯證的問題；一旦牽扯到實踐，那麼對於方法論導引的探索，其重要性就遠遠大於「給你一條明確的發展模式與道路」。社會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意識，如果沒有達成，社會主義無法取得最終成就！然而，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卻因為不斷面對此一問題，而必須不斷進行在方法論層次的動力引導。

無可諱言，以「組織內捲化」的概念確實可以讓我們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教條部份對中國政權發展的影響，甚至發覺教條阻礙著中國內部動力的發展，但是它不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所具有的主要動力邏輯，特別是這個主要動力邏輯正是去除教條限制的關鍵！

因此，以內捲化的概念來論定中國發展，只是一種在理論層次上的過早干預，因為你可能根本還沒看透中國現象的本質為何。因此，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就在於探究中國社會主義一黨專政底下的動力邏輯、一種方法論的導引究竟是什麼？而這樣的方法論導引是否在中國產生特殊的變化，是否已經不同於列寧基於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論導引所進行的理論創新？這樣的開始，使得我們必須再回頭面對毛澤東思想。

五、問題意識的誕生

到目前為止，我企圖針對中國動力學研究所提出的虛假問題提出整理與辯駁，希望在這樣的基礎上，釐清問題意識。破除凱因斯模型的幻象，是第一步。畢竟凱因斯的理論是一種基於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兩黨政治下的產物，它確實是西方實踐所依據的重要理論架構之一，但卻不足以說明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因此以「中國是否對凱因斯模型造成偏離來說明中國的發展」，除了對凱因斯理論進行擴容外，我們將看不出中國發展現象背後的一些本質性因素。

同時，以一些既存的理論概念來對中國研究進行剖析，可能也有盲點。首先，制度論可能彰顯總體內部各制度部門的力量對比，以及各制度部門發展的細緻描述，但很難說所有部份的集合就能夠拼湊出一個整體觀出來，亦即，我們還是不清楚中國一黨專政下的總體動力邏輯學為何。雖然內捲化概念可能以較為總體觀的考量試著描述中國一黨專政下的未來發展，但它可能只是用一個過時的概念來解釋一個認識錯誤的現象，並且假設出一個或許根本不會發生的未來。亦即內捲化概念本身無法幫助認識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就。這使得我們必須回歸到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探討上，發現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進而發現社會主義在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中，必須關注方法論導引的事實。⁴

⁴ 以余源培（2009：8）等編著的《哲學辭典》之定義，「方法論」是關於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同時「方法論」同世界觀是統一的，用世界觀去指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

我認為在邁向研究中國動力學探討的過程中，必須站在方法論導引的高度來看待與釐清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脈絡，以至於我的問題意識將會導向為：中國一黨專政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是否基於某種方法論導引的動力邏輯，而建構出一個面對中國本身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套整合的發展體系，以維持、與成就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過程。

「方法論」。洪鎌德（1977：289）指出，要認識與瞭解宇宙萬事萬物，人們必須選擇一條途徑，要講究方法，將這些方法加以枚舉、分類、評判得失而自成體系的學問，便是「方法論」。那麼，「方法論」就包含「本體論」與「認識論」兩個部份的探討。本體論是研究世界本原或本性問題的理論（哲學辭典，2009：14），或以馮契、徐孝通主編（2000：146）的《外國哲學大辭典》的定義而言，本體論是研究關於存在的理論。至於認識論，是關於人類認識的對象和來源、認識的本質、認識的能力、認識的結構、認識的過程和規律以及認識的檢驗的哲學理論（哲學辭典，2009：20）。以「唯物辯證法」此一方法論為例，「唯物主義」就是體現一種世界觀、一種強調以唯物面探究世界本源的「本體論」。而「辯證法」，就是一種認識萬事萬物的方法理論，是認識論的體現。因此可以將「方法論」理解為：具有世界觀表述、兼具探究認識與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

如果把「方法論」、「理論」、「實踐」三個概念擺在一起來看，更可發現方法論具有一定的思維深度與高度。「實踐」是人類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社會活動，但「實踐」可以具有客觀、能動、與歷史性（哲學辭典，2009：23、24），這是因為「實踐」可以與「理論」聯繫。「理論」能幫助「實踐」更加具有客觀、能動與歷史性。洪鎌德（1977：296、297、302）指出，「理論」是把事實加以組織、加以連貫的架構，這種架構提示一些新觀察、新觀點、新說詞，可以被檢證、被證明其為有效抑無效。同時「理論」的兩大作用是對現象的解釋與預測。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78/ 2010：1- 2）則指出「理論」是一種反思，是對人類歷史的反思，也包括對預期運用過程的反思。哈貝馬斯強調，「理論」一方面研究「社會實踐」（社會實踐作為社會的綜合，使認識有了可能），另一方面又研究「政治實踐」（政治實踐自覺提出的目標是徹底改變現有的制度體系）。那麼，可以將「理論」理解為：是一種對歷史現象進行解釋、反思以預測未來的架構，作為對世界認識與改造的實踐的輔助。而「方法論」能提供「理論」的基礎與指導原則，用來檢驗「理論」是否符合經驗事實與邏輯原則。亦即，方法論是建構理論、檢證理論的指導原則（洪鎌德，1977：290）。因此，「方法論」相對於「理論」與「實踐」而言，更具思維的高度與深度。

本文以「方法論導引」的視野切入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企圖以更具深度與高度的「方法論」層次來進行理解。洪鎌德（1977：290）指出諸如政治、社會、自然或人文科學，都必須藉方法學的導引，才能建構起學問體系。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從「方法論導引」的層次，來看出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所創建的社會經濟轉型體系。從「方法論導引」的角度切入，就必須關注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方法論基礎：唯物辯證法。一方面唯物辯證法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邏輯的傳統，一方面更為深入的來看，唯物辯證法是涉及運動的普遍律則之學（洪鎌德，1977：241），因此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經濟轉型過程，勢必扮演建立發展體系的重要核心邏輯角色。這也是本文必須深入探討之處。

貳、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方法論原型

一、毛澤東思想的意義

起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西方學者持續進行對於毛澤東的研究。但正如蕭延中（2003）提及，早期的毛澤東研究充滿「冷戰思維」的色彩，很多時候是因為西方外交領域對華政策諮詢的需要，才使得毛澤東研究持續。尙慶飛（2009）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只是他還指出毛澤東曾經作為西方青年崇敬的領袖，而使得「毛澤東學」具有研究上的另一層意義。不過兩人同時認為，關於毛澤東的研究呈現出愈來愈強的學術化傾向，這表明毛澤東思想似乎逐漸變成只是學者專家的事情。尙慶飛（2009）還指出，當毛澤東逝世後，毛澤東研究已經不再是「顯學」。

比較重要的是兩位學者同時點出：西方學者起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把「毛澤東研究」當作「中國問題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時，他們一直希望能憑藉毛澤東研究，尋找新的理論生長點，希望能在理論的高度上找尋「中國經驗」，進而體現出毛澤東思想的某種合理性、普遍性意義。這樣的路數，可能走向本文在第一章導論提及關於「典範」濫用的危機之中：在理論層次邁向毛澤東研究，形成一個可能事後才知曉的、其實不具普遍性的理論典範範疇。

其次，田世錠（2009）多少點出了濫用毛澤東思想的現象。他認為像是一些西方學者諸如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斯圖爾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等人，都曾經表明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等觀點，是值得重視的，以至於在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這些觀點仍然常常被引證。似乎，當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越來越好，毛澤東的引用次數也會倍增，於是毛澤東思想就有可能成為另一個如同凱因斯學派般的聖經，每次閱讀都會獲得不同的新意。像是楊繼、楊承訓（2009）兩位學者的看法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強

調可以用毛澤東的理論思想高度，來廓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藉以總結起自中國革命到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切經驗，於是他們寫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十大方面貢獻。如果以這樣的方式論述毛澤東思想，可能把該思想範疇過度拉大，以至於可能完全沒辦法發覺中國內部發展的動力邏輯。

其實連毛澤東本人，都曾一再地強調不要使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大會當時修改黨章規定，使得中國共產黨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金光耀，2011）。於是將毛澤東思想納入中國共產黨黨章的一個關鍵意義，不在於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神聖化，而是確立某種可能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的——起始路線。如果從張偉良、林全民（2009）兩位學者對於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探討可以發現，毛澤東本人一度提出刪除「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但是當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稱為毛澤東思想時，毛澤東才覺得倘若是以一個人的名字代表馬列思想與中國革命的結合，方可接受。此後毛澤東本人一再地拒絕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詞彙，直到六〇年代初，「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意見逐漸分歧到全面爆發中蘇論戰，中共中央開始逐漸恢復和使用『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張偉良、林全民，2009）。

那麼，我以為毛澤東思想彰顯的另一層面意義在於，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所使用的思想動力邏輯，可能已經逐漸不同於當時蘇共的作為，當然這需要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首先是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關聯，其次是中蘇共的發展為何會產生差異。針對第二點，或許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與俄羅斯在歷史地理與文化環境上畢竟是不同的。而第二點也關聯於第一個發問，亦即是否毛澤東思想是造成這樣差異的主因？

傑克·格雷（Jack Gray，2006）認為中國的任何事件都有三個維度：中國文

化的歷史、社會主義以及落後農業國脫貧的努力。我以為，或許在改革開放後，應該再加入資本主義的維度。但先不談改革開放後的轉變，基本上若依照傑克·格雷所述，他提及的關於毛澤東對史達林的主要批評、以及毛澤東受到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某些思想資源的啓蒙、又或是毛澤東如何進行農村發展的思路，可以顯見毛澤東一直細微地周旋於這三個維度之中，而致力於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ener，2008）則以明顯的數據呈現毛澤東時代農業與工業的發展著實驚人，進而強調當時的中國「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不過依照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87/ 1993: 214）採用艾蒂安·巴拉茲（Etienne Balazs）的看法：研究數字和統計數據起不了什麼作用，部份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進行大量的人為操縱，更主要的因素甚至是中國的統計學家也正在摸索與學習。只是布勞岱爾還是肯定的認為，即便數據不夠可靠，但是中國竟能在未犯過多錯誤的情況下，制定出可供執行的計劃，這樣的結果正是數據背後所具有的意義。以「長時段」研究方法著稱的布勞岱爾（1987/ 1993: 215），最後還是把毛澤東時代的驚人發展與中國長時段帝國的官僚傳統（Bureaucratic Tradition）進行銜接，認為中國進行非凡實驗的祕訣就是「官僚制傳統」。這樣的思考路徑是正確的嗎？

像是阿里奇（2007: 329）以清朝官員陳宏謀（Chen Hongmou）為例，舉出中國古代官僚對市場進行支配，並將市場作為一種工具，進而善用類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觀點，以推動、訴諸各種發展計畫，諸如建構新路、引介新商品出口至其它地區、建立共同糧倉等等，似乎顯現出中國官僚在執行面的優越性。然而我們要是再回到黃仁宇（2001：40—45，69—70）對明朝政府進行田賦徵收所面對的種種技術性困難，以及如何解決人民吃不飽的問題，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上

層建築的家產官僚制得以延續的緣由，是由於它不斷汲取中國小農社會的資源，卻不斷擴大自身的內在矛盾；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的官僚系統無法以中央集權的有效手段，管理與面對諾大的統治區域，也無法有效處理人地的緊張關係，因此使得中國兩千餘年的歷史呈現如同翁之鏞（1952：22）所提及的「土地與人口的治亂循環」。

因此，或許以具有中國歷史文化特色的官僚傳統作為研究的起始點，能看出歷史現象背後既深且廣的節奏觀，但是我們將可能抹滅中國在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之後所具有的特殊發展動力。正如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1969 /1993: 69, 72,73）所強調的：每一個歷史層次都有其自身的境界和分析形式，所以歷史的不連貫性也很重要，特別當研究者要研究形成新基礎的轉變過程，或是新基礎的重建因素時，亦即是否跨越具有某種歷史界線的門檻（threshold）、或是與傳統的裂絕（rupture）、甚至是進行轉化（mutation）。我認為傅柯的見解並不是一種對「長時段」研究的否定，而是一種針對「長時段」研究的翻轉；我們正是因為首先看見中國長時段以來的綿延結構，才能認清中國此一社會主義國家在面向現代化發展時的特殊動力。所以我比較關心的，正是布勞岱爾（1987/ 1993: 215）所提出的「古代帝國偉大的官僚傳統的後繼者」，亦即那批「新的大膽而活躍的知識份子淘汰了舊的書生氣十足、保守的知識份子」的中國共產黨員。究竟這些行動者產生怎樣的動力邏輯呢？或許毛澤東思想能作為一個切入點，讓我們瞭解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長時段官僚傳統的國家，究竟產生了怎樣的自主性新動力。

如果在這樣的前提下進行毛澤東思想的理解，我們便不能如同張偉良、林全民兩位學者（2009）所認定的：毛澤東思想是作為一種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亦即，我們不能把毛澤東思想只是當作一個確定的理論來進行論述，而是應該把毛澤東思想作為理解中國社會主義行動者的一個重要資產，亦即我們應該透過毛澤東思想，來發現那些如何在理論與實踐過程中進行創造與反思的社會主義行動者，並藉此來挖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內在動力邏輯。我想這才是毛澤東思

想所代表的重要意義。

二、毛澤東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行動者

沃馬克（1982/ 2006：8）曾引述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爲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雖然沃馬克並沒有特別以一個所謂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來詮釋毛澤東。而且李銳（2006）也認爲：毛澤東自認身爲馬克思主義者的確切年份可能記錯了，但是從毛澤東早期閱讀的書籍，包括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Karl Kautsky）的《階級鬥爭》（The Class Struggle）、以及柯卡普（Thomas Kirkup）的《社會主義史》（A primer of socialism），還是可以確切的認知毛澤東以身爲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所進行的活動歷程，可能從一九二〇年代直到他過世爲止。但同樣的，我所關注的毛澤東，並不是他身爲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而已，也不是要以時間的切分來劃定毛澤東的思想，而是他所認知的的方法論。

正如李銳（2006）取用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在延安對婦女生活調查團講話的內容：

「記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

從這段話很容易讓人誤以爲毛澤東是一種表面的階級鬥爭信仰者，這也影響一些學者的看法，像是劉林元（2009）便認爲新中國的六十年歷史中，是以十一

屆三中全會分成前後兩個三十年，他強調前三十年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搞的是革命邏輯；而後三十年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強調改革開放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的是建設邏輯。於是毛澤東思想被片面的認為是一種屬於階級鬥爭的革命邏輯。

余品華（2009）對「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鬥爭哲學』」做出了批判，雖然他批判的著眼點是爲了調和毛澤東思想與當今中共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概念。不過他準確的以方法論的角度來陳述毛澤東思想不能被簡單化約成鬥爭哲學，他甚至引用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優良傳統，諸如《老子》、《孫子兵法》、《正蒙》來說明毛澤東其實汲取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使得毛澤東能更爲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而且比史達林更好地理解對立統一規律。但我認爲這或許不是單純的鬥爭與和諧的簡單辯證而已，而是一種方法論的動力詮釋。

澳大利亞學者保羅·哈里（Paul Healy）在題爲〈對毛澤東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誤讀〉文章中，批駁了一種觀點：毛澤東思想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背離。基本上遭受保羅·哈里批駁的觀點主要有兩個方面的體現。首先該觀點強調毛澤東以一種「唯意志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第一性；其次，毛澤東是以政治行爲與意識形態來定義階級，而不是從經濟層次定義階級。保羅·哈里（Paul Healy，2009）於是透過對於毛澤東所著文獻的回顧來強調毛澤東本人並未對所謂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產生背離，毛澤東仍是把階級視爲一種經濟範疇、仍是把階級視爲——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所決定的上層建築領域的階級鬥爭的——積極參與者、同時經濟層面上的階級也由上層建築領域一定的政治機構和意識形態形式來代表。保羅·哈里（2009）以極爲務實的方式表述了毛澤東的根本信仰，而且他還點出一件極爲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基本意識形態的認識，亦即毛澤東仍是從產權的角度、從社會所有制的觀點來強調所謂的階級單位、以及階級鬥爭的行動。

因為依照毛澤東（1957）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一文中的看法，只要所有制問題沒有解決，階級鬥爭就不可能熄滅。保羅·哈里（2009）強調，文化大革命的「藍圖」，基本上就是從上述方面進行描繪的。所以我們是否可以先強調毛澤東仍然牢牢掌握社會主義的根本意識形態不放？

邁斯納（2005：4）對毛澤東的詮釋，似乎更為偏向毛澤東是牢牢掌握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他是以「毛澤東思想根本就是一種烏托邦社會主義」來進行詮釋；他甚至以這樣的觀點來說明現在發展的中國早已遺忘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思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面臨著一個嚴酷的悖論。在人民共和國早先的幾十年間，那時中國還很貧困，物質匱乏成為其追求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未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各種景象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今天，當中國從經濟匱乏狀況急速轉變到一種相對富裕的境域時，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烏托邦景象則幾乎被人們遺忘。正當社會主義的客觀情景被逐漸現實化之時，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觀意志則有所消解」。邁斯納的這種看法已經受到中國國內學者的批評與商榷（田世錠，2009）。

的確，毛澤東確實牢牢掌握社會主義的基本意識型態，但這並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全部。格雷（2006）便認為如果把意識形態說成是一種用以支持權力體系的觀念體系的話，那麼根本問題在於：毛澤東的戰略與政策是不是對一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理論原則進行盲目的模仿？

格雷（2006）的回答是：毛澤東的戰略是注重實用的，毛澤東談論的是從新經驗中產生新意識的力量。那麼，基於這樣的說法，我們可能更能體會華勒斯坦（1989：13）對毛澤東思想的詮釋，他說：毛澤東之所以要做出與蘇聯不同的選擇，是因為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看成是過程，而不是結構。

亦即，毛澤東是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當作一種信仰的泉源、以及人類追求未來幸福的可能想像與藍圖，毛澤東思想的根本並不是創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理論架構，而是建基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本，去進行實作的運用。如果以這樣的

看法，我們可以再一次的回歸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於延安對婦女生活調查團講話的內容，則毛澤東思想所彰顯的根本意義，並不在於他強調階級鬥爭的哲學，而是認識問題的方法論。

毛澤東的確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本上，不斷使用了階級概念，並且強調階級鬥爭的持續性，但他是以方法論的態度，建基在實用的立場上把階級當作對社會實際問題的分析單位，而把階級鬥爭看作是一種社會動力的彰顯！與其探討毛澤東的烏托邦想像，不如探討毛澤東的方法論；與其探討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不如探討毛澤東的社會動力學。這也進一步指出，我們應該把毛澤東作為一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行動者，也說明毛澤東思想的探討，對瞭解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內在動力邏輯而言，是有其必要的。

三、毛澤東的方法論基礎：群眾、理論、實踐三要素

本文在第一章第四節曾說明，列寧以「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重要的階級概念術語，將農民與黨組織加以整合，形成引發社會進步動力的方法。而毛澤東也有相同的認識。根據田辰山（2008：128）對歷史的考據，毛澤東於二十世紀三〇年代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著作，其中大部分來自俄國文獻，只是毛澤東閱讀的幾乎完全是中文譯本，同時毛澤東的解讀也都使用中國典故和古漢語用語。不過，我們的確能夠理解毛澤東應該受到列寧思想的影響頗深。

哈里（2009）便指出毛澤東認為國家存在和階級存在密不可分，但國家只是階級利益在上層建築領域的代表機關之一，而政黨則是階級在政治層面表達其利益的一個主要載體，透過黨方能將階級組織起來。只是毛澤東並不是以一種純粹接受理論教條的方式來接受列寧的思想，毛澤東是著重於「理論在實踐層次如何可能」的方法論層次探索上接受列寧的思想，這一點從毛澤東強調黨對階級「該如何強化組織」就能看得出來。

阿里奇（2007：374）便指出，列寧主義的先鋒政黨目的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仍持續使用，但是列寧主義的造反面向則被毛澤東所放棄，改以「群眾路線」（Mass Line）代替。而「群眾路線」這種對於強調革命運動的組織與動員，基本上發跡於毛澤東越來越重視農民此一角色對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影響上。

沃馬克（2006：57）指出，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毛澤東越來越強調農民對革命的重要性，而且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的革命政治活動是以農民為中心，則是毫無疑問的。中國共產黨如何組織與動員農民此一壓倒性的多數，成為中國共產黨能建立起合法性地位的關鍵。而且我認為之所以強調毛澤東並未是以一種理論複製的方式來接受列寧主義的原因在於，毛澤東的實踐觀點基本上仍是依賴實踐調查、以及對當時社會條件進行系統的、徹底的研究。

一份例證就在於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文章的提出。毛澤東在一九二五年夏天捲入他自身家鄉周圍幾個縣的農民組織運動當中，並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之交，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調查五個縣的地方情況，並於之後向武漢地區的許多團體發表他關於湖南調查的書面和口頭報告（沃馬克，2006：74）。在該篇文章中，毛澤東（1927）指出湖南農民運動大約分為兩個時期。第一階段，是指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六月的秘密活動時期、以及七月至九月的公開活動時期。毛澤東在該文的第二段明確指出，湖南農民運動的開展，是組織先於革命的，亦即在他對農民運動的調查過程中，他特別強調組織的重要性。

沃馬克（2006：92-93）於是說明，毛澤東在接納馬克思主義思想之後，便極為努力的重視與發展農民的有效動員，將農民視為首要資源，並以此促成鄉村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轉型；同時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最突出的貢獻就是能靈活地聯繫群眾以及最有效地進行動員，因此毛澤東在實踐上的創新先於理論上的概念化。那麼，我認為毛澤東思想基本上突顯的是必須在客觀的社會條件情況下，關注人力資源、以及群眾動員的重要性；此外，毛澤東思想也並不是一種新穎的理論建構。

正如沃馬克（2006：32、39）強調的，這種以農民為取向的實踐，基本上仍然沒有超出「列寧主義政黨範式」的範圍以外，但卻仍有著創新之舉，就是針對「意識形態和組織方面的創新」。然而，沃馬克對毛澤東這種所謂「意識型態和組織方面的創新」，到底該如何進行詮釋呢？

首先，哈里（2009）認為「意識形態」指的是一種系統的、一致的思想觀念，毛澤東則稱之為「世界觀」；他認為毛澤東基本上仍看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毛澤東認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是和特殊階級相聯繫的，並且表現了特殊經濟集團的基本利益、利害關係和思想觀念，同時也認同意識形態是階級鬥爭的重要載體。

但是透過毛澤東對於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我們發現毛澤東基本上是著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客觀條件實踐上的運用與聯繫，而不是把蘇聯的列寧主義範式視為一個斬釘截鐵的教條。湖南農村有其自身激烈的階級鬥爭，鬥爭具體對象就是當地地主，同時也能把湖南農民視為是反封建主義、反帝國主義的群眾基礎，而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產生關聯，並促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實踐上的作用力。其次，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農民實踐加以聯繫與運用的最好方式，就是透過政黨的運作加以組織，使得毛澤東特別強調「組織起來」的重要性。

因此，毛澤東思想的創新並不是在於理論，而是以後設的角度觀看社會主義理論的功用，亦即毛澤東並不是牢牢地信奉社會主義理論教條，卻是跳脫開來以第三世界的角度、第三人稱的視野來思考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何能在中國的客觀環境下進行運用與實踐，並反芻列寧政黨範式以創新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然後以此進行對於農民的組織與動員。那麼，毛澤東其實是在方法論層次上進行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以建構其獨特的發展運作邏輯。並且根據他所理解的方法論原則，來針對中國農村的客觀環境情況，進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我認為，毛澤東的個人特質便是一位重視後設思考的人物，他是著重方法論原則建構的積極分子、一位著重方法論建構的行動者原型。

沃馬克（2006：36）認為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其個人自身的思想

就呈現出幾個特點。第一是儘管在他思想內容上並不呈現連續性，但在思想形式上具有連續性；第二是他著重當下的關注以及對於辯證邏輯的使用；第三點更為重要的是，雖然他在方法上表現出不連續性，但在方法的基本假設上具有連續性，例如沃馬克強調毛澤東始終重視「民眾聯合」的力量，也就是群眾路線的發展；我想這基本上說明毛澤東在方法論層次的掌握。因此，我認為與其要注意毛澤東思想是否建構出一個嶄新的理論，不如專注於毛澤東是否建構出一個特殊的、屬於中國範疇的方法論原則。

田辰山（2008：80、81）更指出，其實起自十月革命後，中國知識界諸如李大釗、陳博賢、胡漢民、陳獨秀等人，其實都是以一種最不教條的靈活解讀方式來理解馬克思主義，這使得馬克思主義給與中國的是一種對話的機會，並使得中國的辯證法發展在毛澤東那裡臻於成熟。那麼，毛澤東是否建構出一個獨特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就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地方。

而之所以強調毛澤東在方法論層次的運用，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就在於毛澤東對於理論與實踐相互證成的重視。毛澤東在革命的實踐道路上，最爲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他所建立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一種基於地理上的客觀事實，卻轉變了執政者統治面向的、共產黨思想中國化的戰略行動。

沃馬克（2006：109）指出，一九三〇年夏季，中國共產黨攻打長沙、南昌失敗後，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信中，亦即後來更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篇文章中，他根據過去三年游擊生活的實際經驗，開始系統地論述與反思蘇維埃的政策和管理問題，以進行理論背景的再次設定。也是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第一次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就是長期以農村爲中心進行革命的所在地。然後毛澤東還提議把攻占江西省作爲一個直接目標，並藉此體現理論與實踐辯證後的結論。那就是之所以奪取江西，正因爲它是落後、薄弱的、而且遠離帝國主義。則奪取江西的舉措，既符合農村包圍城市的實踐經驗，更能反應列寧思想的理論基礎，那就是從西方帝國主義控制最脆弱的地方開始進行革命。於是，毛澤東思

想開始建構出中國共產黨長期鬥爭的戰略基礎，它不是以城市起義為中心，而是以農村。

其次，毛澤東對於各種實踐的前提，就是必須先進行實際調查。毛澤東的文章中，諸如〈興國調查〉、〈反對本本主義〉、〈農村調查〉、〈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等文章中，基本上都特別強調在實踐之前，必須先做好研究與調查，以促成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過程（沃馬克，2006：132）。這些基本上也可以說明毛澤東並不是一位死守社會主義教條的人物，毛澤東一再提醒中國共產黨員應重視實踐之前的調查與研究，這應是一種對黨員關於方法論原則的提醒。

同時沃馬克（2006：133- 134、205）也強調毛澤東這種重視理論與實踐的互動，的確是其本身思想上的重要特點，特別是在毛澤東於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所撰寫的文章上，能看見毛澤東更為細緻地闡述。沃馬克於是認為毛澤東不是要與共產主義學說、共產黨權威進行相對抗，但毛澤東更為關注理論與權威在實踐的效用問題，對於社會主義的研究並不是追求純正，而是追求效用。那麼，我認為毛澤東即便仍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行動者，但也正是作為一個行動者，一位積極份子的原型，所以他更必須注意在基於方法論原則的基礎上，來如何的靈活運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沃馬克（2006：232）還說明：西方馬克思主義更傾向於把革命看做一個具哲學優先性的問題，而不是類似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基本上發展出一種方法論，讓實踐可以一直控制理論。我認為沃馬克能將毛澤東思想轉入到方法論探討層次，是對毛澤東思想探索的巨大貢獻之一，而且也正如我所強調的，毛澤東思想的創新是一種方法論創新，而不是一種理論創新，更不是對外來物的照搬照抄。

只是，沃馬克（2006：213）在強調理論與實踐互動中，會比較刻意強調理論部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毛澤東的實踐則是中國的。然而一旦我們要立足於方法論層次來詮釋毛澤東思想，或許應該輔以另一位學者田辰山的看法。田辰山

(2008 : 134- 135、142) 認為毛澤東對於理論與實踐的互動，其實是在方法論層次上的一種偶對雙方的相通，彰顯的是一種基於「互係性」(correlative) 的、中國「通變」(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 思想的影響，而該位學者也藉由毛澤東的一些話語來佐證關於「通變」思想的體現。例如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裡，就以「禍福相依相伏」的通變思維，強調事物矛盾互相轉化的觀點。而中國的「通變」思想，其實正是彰顯中國文化有其自身的辯證法概念。

田辰山(2008 : 14) 指出「辯證法」在中國環境中已是一種宇宙觀和互係認識的方法，它提高人們對偶對矛盾的敏感性，認識到既是個體卻相互依賴、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轉化的敏感性。不過田辰山過於強調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通變」思想的顯現，甚至可能暗指毛澤東思想是與西方哲學傳統根本無關的。我認為，毛澤東的思想很難完全跟西方哲學思想做出完全切割，但由於我並不是只專注於哲學探討上，而且本文主要發問也不是針對此一問題，所以只好放棄不談。但可以確定的預設是，毛澤東在中國傳統認識背景之下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融入後，毛澤東可能已經發展出一套獨特地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並且已經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全然相同。

其實學者田辰山(2008 : 10) 的一個重要貢獻，也正是說明西方馬克思主義背後的西方思想傳統其實與中國的「通變」思想傳統完全不同。於是在後來田辰山對於歷史脈絡的鋪陳論述中，使讀者的我產生一種欣喜的體會。那就是起自十月革命之後直到一九三〇年代，由於中國諸多知識份子對於蘇聯文獻的翻譯，產生了一個有趣的化學作用，那就是中國知識份子可能以一種中國固有的「通變」思想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術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可能。如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可能，那也就表示毛澤東思想在方法論層次，也可能成就一個獨特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而且不全然相同於列寧範式。

這樣的推論於是可以先引回到本節的主題中，也就是毛澤東的方法論基礎，

是強調如何將人群進行組織動員，以進行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過程，進而形成一股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以促發整體社會經濟的轉型。這當中展現群眾、理論、實踐三要素的相互整合，及其作為方法論基礎的重要性。只是我們目前只知道毛澤東方法論的三個重要元素，還需要更為細緻的探討毛澤東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由於沃馬克（2006：239、319）一直認為〈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這篇文章是毛澤東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這使得沃馬克對於毛澤東思想的體會，始終只是關注到理論與實踐的互動層面，這也與沃馬克對於毛澤東的〈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Outlin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一文只能在英文書籍之中找到該文章的部份引文有關，因為該位學者並沒有找到全文。但是我認為〈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才是探討毛澤東思想中最關鍵的一篇文章，特別是站在方法論層次的探討上，正是由於毛澤東對於辯證唯物論的說明、建立一種方法論導引的創新，才使得理論與實踐的互動受到更加的重視。

而且透過〈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一文在歷史上如何誕生出來的敘述，我們也能理解毛澤東基本上正是使一個特殊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能臻於成熟的人物，且不完全相同於西方的唯物辯證法範式。田辰山（2008：100）指出，一九三二年，共產黨員李達與雷仲堅合譯並由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的《辯證唯物論教程》，是影響中國最大的一部辯證法翻譯著作，其原書為俄文，是蘇聯共產主義學院列寧格勒分院西洛可夫等六位哲學家合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但正如田辰山始終強調的，李達也是運用中國的「通變」思想來理解西方的辯證唯物論，那麼《辯證唯物論教程》的中文翻譯成果就勢必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反應在毛澤東一九三七年所作的〈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一文，而該文正是〈實踐論〉和〈矛盾論〉兩文章的前身，但卻只是前身中的一部份。

而且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毛澤東對於辯證唯物論的詮釋，勢必有著早先在中國從事革命發展的經驗對於辯證唯物論詮釋的影響。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對農民

運動的重視，到一九二九年於井岡山根據地的活動與持續的農村革命，再到一九三一年至江西建立根據地，基本上都會影響到毛澤東對於其方法論相關原則的修正。特別是一九三五年毛澤東成為政治局主席後，毛澤東為了從事全面領導，他開始進行大量的思想總結（沃馬克，2006：164），這使得我相信一九三七年的〈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一文，有助於我們認識毛澤東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一些基本原則。

四、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一些中國內地學者將其起因歸咎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林毅夫（2009：218）便認為，改革開放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不是任何中國政府領導人設計出來的，而是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自發進行的制度變革。也就是說，民間力量其實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我們始終必須重視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變革，因為中國在政治上仍是一黨專政領導，如果沒有該黨自身的變革，我認為就不會允許改革開放的出現，民間力量也就無法釋放。

社會主義曾在世界各地產生勝利，如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一九四五年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成功，一九五九年古巴遊擊隊勝利、一九七六年的越南解放。這些運動都依附於一種信任：即社會主義政黨指向未來的美好世界。然而我們從現在看來，這個信心產生動搖、有些地區甚至產生信心崩毀，雖然轉型為市場經濟的俄羅斯與東歐各國的情況還是沒好到哪裡。然而，就如同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2000, 3：568）提醒的：「如果左翼的方式是以國家壟斷來取代資本主義壟斷，下層仍是市場經濟，還是引不起選民的熱情」；這表示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仍然要面對許多質疑，而現存於世界的少數社會主義國家，仍持續面對諸多考驗。在社會主義政黨追求「社會所有制」如何可能的過程中，由於一再地面對合法性的問題，使得社會主義集權、就如同

中國共產黨的集權領導一般，可能含有一種特殊的集權特徵性質存在。

陳明明（2000）指出：

「無產階級政黨一開始就是非法的，被統治者認為是極度危險的，因而必須置於國家機器的嚴密監視之下，這意味著無產階級通往政權的道路具有極其緊張的性質…這樣一個黨必然按秘密工作的要求發展成一個職業革命家組織，而不能將各色各樣的人都變成黨員，必然強調黨的高度集中和高度統一，而不能像孟什維克那樣把黨建成西歐模式的群眾性政黨」。

是故，社會主義政黨從革命到取得政權的過程，再到國家內部持續發展的過程，都呈現一種緊張態勢。馬克思所強調的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是他根據西方工業革命後的現實狀況所進行的理論性推導，然而事實情況卻不是如此產生輕易的過渡，其理想大過現實，而現實卻更為複雜。這使得現今殘存的社會主義政黨必須不斷地進行修正與試驗。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擴張的當下，顯然資本主義不會輕易瓦解，而社會主義政黨幾乎是以一種人類理性思維所創造出的產物，逆向發展於既有的、被共黨視為仍不合理、不完善的人類世界；這導致即便共產黨已經取得政權，還要不斷處於緊張狀態，不斷面對資本主義的侵蝕、又要不斷試驗可能的社會主義發展，以及共產黨本身隨時可能的瓦解，遂導致集權性的擴張。

雖然以陳明明的說法可能不足以完全解釋社會主義國家的集權特徵原因，但是他點出社會主義國家的集權特徵所具有的緊張性。這種緊張性，是社會主義政黨以集權態勢進行國家發展的一種表現，反應在理論與現實交織的過程上。如果說中國的改革開放產生讓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績，那麼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面對此一緊張性？緊張性質的背後，是以怎樣的動力進行社會主義方式的發展與變革？

(一)、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轉型模式？

對於不同社會經濟發展的每一種運動模式，我們可以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模式的質的區別。針對中國共產黨如何進行改革開放，產生怎樣的經濟轉型模式，雖然是屬於靜態層面的理解，但是能夠幫助我們做出進一步探討的可能。

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副教授張建君（2009）的短文〈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模式特徵探析〉，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中國一黨專政領導轉型所具有的特殊性。張建君首先提出中國大陸經濟轉型具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和轉型目標。而關鍵指導思想，他認為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而這個理論具「主導性、實踐性、多元性和相容性的統一」。我們可以用簡單的幾句話帶過：亦即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有著理論上的指導，但這種理論具有開放性，不是一種教條主義，而且會與其他理論進行交織。在該文中，張建君運用比較的方式，突顯社會主義國家在轉型時，中國所具有的特殊性。他引用俄國學者在總結中俄轉型經驗時的說明，指出俄羅斯在經濟改革時，放棄嚴肅的理論思考，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並把它當作教條，於是導致失敗；而中國卻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剛性原則，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探索。也就是說，中國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上，進行持續的理論發展。

張建君提到的第二點，說明中國經濟轉型是以剛性化的社會主義制度約束為基礎。他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說法，認為漸進改革方式的可取性在於政府要承諾不扭轉改革的方向，以及強調通過學習來避免「資訊超載」

(information overload)和組織遭到破壞而引起的資訊損失問題；他並再次以蘇、東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為例，強調社會主義制度的維持，有其重要性。其實就社會學的觀點而言，中國原本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要進行改革開放的一個必要條件，

就是要避免社會失序與盲動，否則不可能完成國家轉型的任務，當然還需要其他的充分條件，例如對外開放。因此社會主義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三點，張建君指出中國大陸經濟轉型過程有著階段性：經濟改革的理論和戰略會隨著實踐的發展實現階段性調整和轉換，而形成動態演進的過程。張建君非常巧妙的轉換一種觀念，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各種戰術性內容，都不足以說明中國經濟轉型的模式；反之，應該突顯中國經濟轉型的階段性推進與目標調整，才是中國轉型模式的特徵。張建君還強調，在階段性轉換過程中，會包含經濟增長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雙重主題，而各個大戰略階段還會包含無數個小戰術階段的聚合；此外，每個階段無疑還包含著各自的理論邏輯。我認為，張建君強調中國改革開放的階段式發展特徵，無疑包含一種理論的持續性探索過程，這也與他提及的第四點有關。

張建君提及第四點：中國的經濟轉型過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實驗政治經濟學發展歷程。諸多政策都是經過試驗的方法，從而有效解決社會盲動的弊端。他引用轉型經濟學家熱諾爾·羅蘭（G·Roland）的看法，認為雙軌自由化是一種創造性的方法，它既克服價格自由化的政治約束，又避免局部自由化的陷阱。那麼撇開張建君所引用的這些複雜經濟學用語來看中國的「試驗」，可以說中國是在實踐的層面上所進行的不斷嘗試。

再來是第五點，該文提及中國經濟轉型有著雙主題聯動性：追求經濟增長和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第六點則是強調地方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積極作用。我們可以把這兩點一起來看。張建君提及，中國最早的「分權化」改革奠定於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正確處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關係，要確立「發揮兩個積極性」的原則。這個原則經過長期的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架構：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為能夠為經濟體制改革積累經驗、開闢道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最為關心的是經濟增長的問題，這是中國政治體制中激勵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從該作者的論述可以理解的是，中國一黨專政的領導，地方

政府是負責經濟增長的推動與累積經驗，而中央政府則總結經驗進行理論的變革與推進，進而產生進步與發展。

則我們可以針對張建君的短文進行一個初步的概括性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上層的一黨專政層面，是以馬列思想為綱，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基本面，透過中央與地方，即理論與實踐交織的試驗過程，進行經濟增長與體制改革。這是一個明確且可觀察到的現象。但該文針對中國轉型模式特徵的說明，仍只是顯現一個現象與其特殊性，我們如何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基礎（社會主義思想與制度）、過程（理論與實踐交織）、結果（經濟增長與體制改革）進行總體性的認識呢？我們必須進一步深入探討，以避免停留在靜態發展模式的探究上。

（二）、重視「理論與實踐的循環過程」才是關鍵？

黃宗智（2005）在〈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一文中指出：

「“轉型”一詞，用於中國，不應理解為目的先導的從一個類型轉成另一個類型，從封建主義轉到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轉到資本主義，而應認作是一種持久的並存以及產生新穎現象的混合。正因為現有單一類型理論的不足，我們需要從混合社會的歷史實際出發來創建新的理論概念。」

這句話我完全同意。中國轉型包涵中國傳統歷史結構、馬列主義、東亞的資本主義出口生產體系、以及石油世紀即將結束等諸多因素的混合，它的走向全然不同於資本主義中心移轉的西方歷史傳統，自然不能以過去的理论作為發展框架來進行對中國社會經濟變革的探討。

黃宗智並在該文中強調必須以實踐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發展。黃宗智認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實踐社會學與中國革命在大革命失敗後形成的獨

特認識方法有不謀而合之處。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於文革後，排除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這套認識方法在理念上接近於布迪厄的實踐理論；而在對於農民社會的調查方法上，它類似於現代人類學；而在學術研究上，則體現於費孝通那樣的現代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研究。他並且申述西方的主流形式主義認識論是以抽象化的理性人構造出發，作為一切認識的基礎。但是西方形式主義認識論其實不同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方法，黃宗智（2005）說明：

「中國革命的認識方法和西方現代形式主義認識方法的不同之處可以見於農民學三大傳統及其對我們認識的挑戰。形式主義的農民學傳統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性小農為前提的；馬克思主義反之，以被剝削而（在適當歷史條件下會）追求解放的小農為前提；而實體主義則以追求滿足消費需要，亦即生存需要的小農為前提。但我們如果從農民實踐出發，並以之為準繩，則小農很明顯地同時具有這三種理論所分別投射在他們身上的不同特徵（我曾稱之為三副面孔），而這三種特徵所分別占的比重因各階層的小農而異，也因歷史時期、歷史環境而異。現存的三大理論中的任何一種顯然都不能涵蓋小農實踐的全面；它們都是片面的。」

因此，黃宗智（2005）認為中國革命的認識論是可貴的，他突顯中國共產黨把認識的集中點放於村莊和農民的實踐，而產生革命性的變革，即從實踐的認識出發，進而提高到理論，然後再驗之於實踐，這種實踐認識論與西方現代主義的認識論截然不同。亦即黃宗智所謂的實踐認識論，就是以實踐先行，進行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踐的不斷循環過程。

黃宗智（2005）又於該文強調：

「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之中，有許多出於階級鬥爭意識形態而違反這種認識

精神的例子，包括許多以簡單化了的意識形態來替代實際的例子。在革命勝利當權之後尤其如此。譬如，土改時強行要求一村村地鬥地主而實際上當時可能有一半的村莊並沒有地主。又譬如，文化大革命時亂戴“走資派”帽子，而當時其實已經消滅了私人資本。」

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仍有教條性的意識形態束縛；而中國革命特殊的認識方法，黃宗智（2005）認為就是「對大革命時期所犯過分依賴經典理論錯誤的反思，以及此後必須獲得農民支持才可能生存的歷史必要。」因此他認為必須擰出革命傳統中符合它原先認識理念的部分，黃宗智（2005）強調：

「中國革命之所以勝利，與其說是出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如說是出於以實踐為先的認識方法對（當時共產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糾正」。

那麼透過該文的引導，我們可以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基礎（社會主義思想與制度）、過程（理論與實踐交織）、結果（經濟增長與體制改革）三者的關聯做出更進一步的申述。即黃宗智突顯實踐與理論交織的重要性，而且是以實踐先行所進行的理論與實踐循環，重點是在於過程的認識論運用；透過這種實踐認識論的發揚，中國共產黨糾正既有馬列思想意識形態束縛，並產生經濟增長與體制改革的成果。

誠然，黃宗智點出轉型與發展中「過程」的重要性，而「過程」的認識論建立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但我認為黃宗智只是點出理論與實踐的循環過程，卻過於低估馬列思想的方法論導引。

這可以從毛澤東思想中看出方法論導引的重要性。從毛澤東所寫的〈實踐論〉一文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確重視實踐認識論的重要；然而毛澤東所撰述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其實是毛澤東（1937）在抗日戰爭時期為紅軍大學講授哲

學課的提綱《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的其中兩部分而已。在毛澤東準備和醞釀寫作《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期間，毛澤東閱讀蘇聯哲學家愛森堡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米丁等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還閱讀在當時的延安能夠找到的其他一些中外哲學著作，並對所閱讀的哲學著作寫下大量批註。

我們從《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的章節，也可以看到馬列思想方法論導引的重要性：該文共分三章十六節。第一章是「唯心論與唯物論」，第二章是「辯證法唯物論」，第三章是「唯物辯證法」。第三章原計劃寫三節，分述辯證法的三個根本法則：即矛盾統一法則、品質互變法則、否定之否定法則。但後來只寫了第一節，後面兩節沒有寫（白雲濤，2009）。因此，我們有必要根據〈矛盾論〉、〈實踐論〉兩篇文章、特別是《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該書，來認識黃宗智所強調的實踐與理論循環是如何可能、以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產生的、在方法論層次上的引導動力。

（三）、辯證唯物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導引

我就以毛澤東所撰寫的《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內容為主軸，輔以〈矛盾論〉、〈實踐論〉兩篇進行說明，並以分點的方式來解釋毛澤東在方法論層次的思想理路，突顯中國共產黨在方法論導引上的特殊性。

1、辯證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體現

要瞭解中國共產黨施政方針背後的方法論導引過程，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極好的切入點，畢竟毛澤東思想仍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重要的思想綱領之一；而毛澤東所撰述的《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⁵更可突顯辯證唯物論乃作為中國

⁵下文論述，均簡稱《講授提綱》。

共產黨方法論導引的重要依歸。首先，辯證唯物法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體現，它是一種認識世界的特殊方法論。毛澤東（1937）在《講授提綱》中說明：

「無產階級吸收了人類全歷史中一切實踐的成果，同時又由於自己的實踐，經過他們的代言人與領導者——馬克思、恩格斯之手，造成了辯證法唯物論。不但主張物質脫離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而且主張物質是變化的，成為整個完整系統的嶄新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因此，辯證唯物論仍位於馬列思想範疇中，而且《講授提綱》內文繼續強調：

「由於中國社會進化的落後，中國今日發展著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與改造自己哲學的遺產而來的，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而來的。然而要使辯證法唯物論思潮在中國深入與發展下去，並確定地指導中國革命向著徹底勝利之途，便必須同各種現存的反動哲學作鬥爭，在全國思想戰線上樹立批判的旗幟，並因而清算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產，才能達到目的。」

那麼，辯證唯物論不僅是馬列思想範疇中的產物，同時是作為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主軸，並在強調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否定中國一些既有的傳統思想教條。毛澤東在《講授提綱》裡強調，辯證唯物法就是世界觀、是方法論：

「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並沒有別的什麼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

其次，我們必須瞭解辯證唯物法所指涉的主體為何？在《講授提綱》中指出：

「人類在社會生活中，人同人之間互相發生關係與影響，在階級社會中並且實行著階級鬥爭。被壓迫階級考慮形勢，估計力量，建立計畫，在他們的鬥爭成功時，使他們確信自己的見解並不是幻想的產物，而是客觀上存在著的物質世界的反映。被壓迫階級因為採取錯誤的計畫而失敗，又因為改正其計畫而成功，使他們懂得只有主觀的計畫依靠於對客觀世界的物質性及規律性的正確的認識，才能達到目的。」

則辯證唯物法乃作為弱勢階級的方法論，它企圖改變受少數人所控制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的壓迫；辯證唯物法所指向的主體，就是受壓迫的階級。

2、辯證唯物論是方法論，不是方法

毛澤東在《講授提綱》中強調：

「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無產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它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體，唯心論的馬克思主義修正派認為辯證法唯物論的全部實質只在於它的“方法”，他們把方法從一般哲學的宇宙觀割裂開來，把辯證法從唯物論割裂開來。他們不瞭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辯證法，不是如同黑格爾一樣的唯心的辯證法，而是唯物的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是絲毫也不能離開它的宇宙論的。」

這一句話，點出辯證唯物論是唯物世界觀與相應方法的結合，是方法論，它

包含西方所謂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基礎，而不是只是戰術層面的應用方法而已。

3、辯證唯物論是導引動態發展的法則

毛澤東引述列寧的看法，認為唯物辯證法與其他任何科學一樣，有它自身的研究物件。這個物件便是自然、歷史和人類思維之最一般的發展法則。而且要能導引出未來的發展，就必須強調總體性。《講授提綱》中指出：

「各個科學分析（數學、力學、化學、物理學、生物學、經濟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是研究物質世界及其認識之發展的各個方面。因此各個科學的法則是狹隘地片面地被各個具體研究領域所限制了。唯物辯證法則不然，它是一切具體科學中的一切有價值的一般內容，及人類的其他一切科學認識之總計、結論、加工和普遍化。這樣，唯物辯證法的概念、判斷和法則，是極其廣泛的（包含著一切科學的最一般的法則，因此也包含著物質世界的本質的）各種規律性和規定」；

「關於哲學物件問題，馬克思、恩格思和列寧，都反對使哲學脫離實在的現實，使哲學變為某種獨立實質的東西。指出了那根據實在生活和實在關係的分析而生長出來的哲學之必然性，反對單單以理論觀念和理論觀念的自身做研究的物件，如同形式理論就是少數派唯心論的那種幹法。所謂根據實在生活和實在關係的分析生長出來的哲學。就是唯物辯證法這種論發展的學說。」

亦即，辯證唯物論作為一種方法論，是站在總體性的角度來看待發展，並且要貼近生活現實，與實在連結，不能單以理論本身來談；因此辯證法是凌駕於理論之上，確定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關係。同時在《講授提綱》中也強調：

「辯證唯物論深刻地多方面地觀察了自然及社會的運動形態，認為當作全體看的世界之發展過程是永久的（無始無終的），但同時各個歷史地進行的具體的運動形態又是暫時的（有始有終的），就是說，它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發生，並在一定的條件下消滅的，認為世界的發展過程由低級的運動形態生出高級的運動形態，表示了它的歷史性與暫時性，但同時任何一個運動形態都不是絕對最初的，也不是絕對最後的。」

則辯證唯物論也彰顯為一種動態觀念，它是重視運動過程的。

4、辯證唯物論重視歷史經驗過程如何為我所用

毛澤東認為辯證唯物法作為一種認識論，包含認識過程的兩個階段。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這兩個階段統一為認識過程的階段。而感性和理性的性質不同，卻又不互相分離，它們會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所以辯證唯物法作為一種認識論，包含對於經驗的取得，即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兩部分，而且就知識的總體而言，所有知識都不能離開根本的直接經驗。毛澤東這方面的說法，是重新詮釋列寧之後的看法，在《講授提綱》中強調：

「列寧精確地闡明了認識中的經驗元素和理性元素相互關係之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許多哲學家都不瞭解認識的運動過程中即從感覺到思維（從印象到概念）的運動過程中所發生的突變。因此，理解這一由矛盾而產生的飛躍式的轉變，即理解感覺和思維的一致為辯證的一致，便是理解了列寧反映論的本質之最重要的元素。」

亦即，除了經驗的取得，還包括主體論理的形成。由於牽扯到論理的問題，

於是唯物辯證法涵蓋「真理論」，包含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這兩者不是片面地承認或否認某一方面，而是同時承認它們，並指出它們正確的相互關係，指出它們的辯證法。毛澤東在《講授提綱》中提出：

「唯物辯證法在認識客觀真理時，就是承認了絕對真理的。因為當我們說知識的內容是客觀世界的反映時，這就等於承認了我們知識的物件是那個永久的絕對世界。“關於自然之一切真理的認識，就是永久的無窮的認識，因此它實質上是絕對的”（恩格斯）。然而客觀的絕對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為我們的知識，而是在我們認識之無窮的發展過程中，經過無數相對真理的介紹，而到達於絕對的真理，這無數相對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真理的表現。」

因此，毛澤東企圖強調唯物辯證法的論理積累過程，從不同時空階段的相對真理的挖掘，以建構出絕對真理。而且也表示，毛澤東並不是全然地吸取諸如恩格斯等人的立論而作為教條來信仰，反之，毛澤東在哲學閱讀中、以及涵蓋他實際革命經驗過程中，已開始從事辯證唯物論的重新詮釋，一種屬於特定中國情境的辯證唯物論範式。《講授提綱》中也強調：

「客觀真理在我們感覺和概念中，雖不是一次就取完成的形態，然而不是不能認識的。辯證唯物論的反映論反對不可知論的見解，認為意識是能夠在認識過程中反映客觀真理的。認識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當未被認識的“自在之物”，反映到我們的感覺印象概念上來時，就變成“為我之物”了。」

則辯證唯物論不只強調如何認識的作用，還強調客體必須為主體所用，亦即在認識運動中，呈現的是一個複雜的充滿矛盾與鬥爭的運動，並在此運動中，被壓迫階級能獲取資源而為其所用。這使得辯證唯物論必須關注歷史。如《講授提

綱》中所言：

「一切哲學在認識論上的反歷史觀點，都不把認識當作過程看待，因此都帶著狹隘性。」

辯證唯物論由於重視整體性，重視過程中經驗與論理的形成，重視客體如何與主體統一，因此必須有歷史觀，方能顯現動態的認識、論理與實踐。

5、理論與實踐的不斷循環，以面對現實條件限制所造成的錯誤

由於辯證唯物論是徹底唯物地指出世界的物質性，亦即物質的客觀實在性和物質對於意識的根源性，是存在決定意識，而非意識決定存在。因此，毛澤東在《講授提綱》中寫到：

「德國唯心論哲學家黑格爾認為現在的世界是從所謂“世界理念”發展而來的，中國的周易哲學及宋明理學都作出唯心論的宇宙發展觀。基督教說上帝創造世界，佛教及中國一切拜物教都把宇宙萬物的運動發展歸之于神力。所有這些離物質而思考運動的說法都和辯證法唯物論根本不相容。」

亦即我們必須從存在來決定我們的意識發展；於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就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講授提綱》強調：

「原來辯證唯物論的物質觀，正是以多樣性去看物質的世界的統一，就是物質多樣性的統一。這種物質觀，對於物質由一形態轉化到另一形態之永久普遍

的運動變化這一事實，絲毫也沒有矛盾。」

也就是說，除了重視實踐的重要性，也要注意物質型態多樣性，以及其運動變化所產生的質的改變。於是實踐與理論必須相互依賴，亦即在實踐過程中經由感受與論理的過程，建立理論，再反過來為實踐服務，以徹底的瞭解與運用物質的運動變化。《講授提綱》內文指出：

「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第二是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

「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麼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

則毛澤東對於辯證唯物法的強調，是認識過程與實踐過程的結合，亦即透過實踐而感受片面的認識，再到論理的總體性認知，形成理論，進而回過頭來輔助實踐。這種方式可以避免錯誤。如同《講授提綱》所強調的：

「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到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著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畫、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

由於面對現實條件的限制，在進行實踐過程所運用的方案不一定正確，因此必須建構實踐與理論來回循環的過程。於是毛澤東（1937）才會在〈實踐論〉一文的總結提到：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那麼毛澤東的思想，說明黃宗智的理論實踐循環論其實是納入於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導引中。同時還有一點值得說明，就是在毛澤東（1937）〈矛盾論〉一文所強調的：

「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畫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畫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

也就是就唯物辯證法而言，在探討理論與實踐循環時，雖然強調以實踐為第一基礎，但是必須考量現實內在矛盾問題；當內在矛盾顯示出理論必須優先建構時，理論就必須先起決定性作用。這也反應黃宗智單從實踐與理論循環來看的局限性，因為必須從辯證唯物法的方法論高度，我們才能從辯證唯物法的諸多要素中總的來觀看實踐與理論的循環。畢竟有時理論先行，亦很重要。

6、思維能動性與客觀社會條件限制

毛澤東在《講授提綱》內文指出：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機械唯物論）沒有強調思維在認識上的能動性，僅給以被動作用，把它當作反映自然的鏡子看。機械唯物論對唯心論採取橫暴的態度，不注意其認識論的根源。因此不能克服唯心論。只有辯證唯物論，正確地指出思維的能動性，同時又指出思維受物質的限制。指出思維從社會實踐中發生，同時又能動的指導實踐。只有這種辯證法的“知行合一”論，才能徹底地克服唯心論。」

亦即，辯證唯物論作為一種方法論，除了揭示物質、社會條件對人的限制，也展現主體思維的能動性。因此，不能過份誇張主觀能動性，而是要接近於現實。毛澤東在《講授提綱》中強調：

「唯心論歷史家把英雄看成歷史的創造者，唯心論政治家把政治看成萬能的東西，唯心論軍事家實行拚命主義的作戰，唯心論革命家主張白朗基主義，蔣介石說要復興民族唯有恢復舊道德，都是過分誇張主觀能動性的結果。我們的思維不能一次反映出當作全體看的物件，而是構成一個具有接近於現實的一切種類的無數色調的，生動的，認識之辯證法的過程。」

此外，也要強調概念能動力必須受到社會生產關係所規定與限制，毛澤東在《講授提綱》中舉例：

「經濟學上的唯心論，過分誇大交換中非本質的一方面，把供求法則提高到資本主義的根本法則。許多人看到科學在社會生活上發生了能動的作用，不知道這種作用受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所規定與限制，而作出科學是社會發動力的結論。」

同時，毛澤東亦在〈矛盾論〉一文中指出：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地列寧和史達林，他們對於應用辯證法到客觀現象的研究的時候，總是指導人們不要帶上任何的主觀隨意性，而必須從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係。」

亦即，主體主觀思維的能動性，必須客觀的針對現實條件進行研究與實踐；總之，唯物辯證法作為一個方法論導引，突顯思維能動性，但必須認清社會結構的客觀限制，以此產生反覆辯證過程，進而產生變革。

7、關注社會運動的內在矛盾

毛澤東認為辯證唯物論是強調從內部原因來說明物質或運動，而不是從外力原因去說明。因為如果單從外力原因說明，就會失去世界的多樣性。於是在《講授提綱》中才強調：

「物質所以轉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內部，不是由於外部機械力的推動，而是由於內部存在著性質不同的互相矛盾的兩種因素相爭相鬥，推動著物質的運動和發展。由於這個運動轉化法則的發現，辯證法唯物論就能夠把世界的物質統一原理擴大到自然與社會的歷史上去，不但把世界當作永遠運動的物質去考察，而且把世界當做由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的無限前進運動的物質去考察，即把世界當做發展、當做過程去考察。」

不過，毛澤東認為從內部原因進行瞭解，不是要去排除外部原因，而是要把外部原因當作條件，內因則是變化的根據。他在〈矛盾論〉中強調：

「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

「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並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

因此，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再來，矛盾具有普遍性與絕對性，即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毛澤東在〈矛盾論〉一文中認為：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

這使得中國共產黨能不斷發現社會的內在矛盾，並且進行持續性的思想鬥爭運動。如果單從黃宗智的理論與實踐循環，看不出這一點。矛盾除具有普遍性，還必須強調特殊性。〈矛盾論〉一文強調：

「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

在這裡顯示出辯證唯物論中，關於發現內在矛盾所展現的方法論導引的作用力，亦即各種不同內在矛盾，都有不同認識與實踐方法，而這必須從方法論導引層面，方能看清。其次，事物內在矛盾會在長時段過程中演變，並在某些階段上產生激化。毛澤東在〈矛盾論〉指出：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

於是，對於諸種矛盾，我們必須面對主要矛盾，首先對付主要矛盾激化問題。〈矛盾論〉指出：

「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由此可知，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亦即，發覺事物或社會內在矛盾，才能不斷發展進步。在過程中，勢必有一個主要矛盾起領導作用，而主要矛盾的激化作用力亦是最強，故而必須首先面對主要矛盾，以解決主要的階段性激化問題。最後，面對內在矛盾的兩個方面，我們應該注意內在矛盾中兩方的作用力與關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認為：

「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

「一切對立的成分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方面都因一定條件具備著不同一性，所以稱為矛盾。然而又具備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聯結」；

「事情不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還在於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轉化。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著的兩方面，因為一定的條件而各向著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著它的對立方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種意義。」

也就是說，事物內在二元對立是存在一個統一體中，因為事物內部兩方對立，所以產生矛盾，但也會依客觀階段條件而產生同一、相互轉化；在內在矛盾轉化過程中，會產生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強調的：

「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

亦即，事物或指涉社會的內在矛盾，會產生絕對必要的鬥爭，形成動力，產生運動。上述七點，是辯證唯物論的幾個重要觀點，主要陳述於毛澤東的《辯證

唯物論（講授提綱）》、以及〈矛盾論〉與〈實踐論〉兩篇文章之中。毛澤東在《講授提綱》中特別強調：

『辯證法唯物論對於指導革命運動的幹部人員，尤屬必修的科目，因為主觀主義與機械觀這兩種錯誤的理論與工作方法，常常在幹部人員中間存在著，因此常常引導幹部人員違反馬克思主義，在革命運動中走入歧途。要避免與糾正這種缺點，只有自覺地研究與瞭解辯證法唯物論，把自己的頭腦重新武裝起來』；

「唯物辯證法本身是一種科學（一種哲理的科學），它是一切科學的出發點，又是方法論。我們的革命實踐本身也是一種科學，叫做社會科學或政治科學，如果不懂得辯證法，則我們的事情是辦不好的，革命中間的錯誤無一不違反辯證法，但如果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絕大的效果。一切做對了的事，考究起來，都是合乎辯證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們首先是幹部，都應用心地研究辯證法。」

亦即，毛澤東作為一位辯證唯物論的、實踐的積極原型份子，他同樣希望中國共產黨員藉由辯證唯物法的方法論導引，進行思想的改造並付諸實踐，而且幾乎要確實的以唯物辯證法作為依歸，以避免革命的錯誤。田辰山（2008：129）指出毛澤東學習哲學的目的，是為掌握工具。也就是說毛澤東並不是以一種純理論的閱讀方式來瞭解西方哲學；特別是他對於方法論的掌握，最關鍵的還是要面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情況，這也使得毛澤東對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有著新的見解。

另一方面，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之所以可能，更在於毛澤東是個中國人。雖然他極力否定中國傳統的教條理論思維，但他仍接受了中國的辯證法影響。田辰山（2008：12）基本上以中國易經含義中的「變」、「通」思想，試圖來說明毛澤東對於中國古代辯證法的掌握。我們其實也可以從毛澤東《辯證唯物論（講授提

綱)》之中，發現田辰山所強調的中國辯證法的一些特點，諸如事件、客體之間關係的作用，以及主體對客體的情境化解釋，還有事物間內在聯繫的重視，以及強調對特殊情境脈絡進行特殊化詮釋與發展的整體觀；當然更關鍵的是對主體能動性的強調、以及指涉一種恆常的變化運動。因此，我們可以說有一種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在毛澤東手上趨於成熟。

如果我們能看清中國共產黨的方法論導引，即以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作為革命與建設的導引方式，就能加以說明中國此一社會主義國家所具有的緊張性表現。亦即，緊張性的產生是源自於唯物辯證法的導引。中國共產黨員在革命階段必須面向受壓迫階級以對抗少數掌權者，他們必須不斷發現社會的內在矛盾，掌握內在原因與外部原因的激化關係，認清客觀現實，以實踐與理論的循環辯證過程，執行鬥爭與改革運動。這是上層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具備的內在動力與視野。

黃宗智在某種程度上做出一個正確強調，即中國共產黨藉由實踐與理論循環以糾正馬列主義理論；但他也說得不完全對。毛澤東的《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矛盾論〉與〈實踐論〉，其實是以方法論層次的辯證唯物論為基礎，為了克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亦即中國共產黨對於社會主義思想並未動搖，而是要糾正教條，不是糾正馬列主義。

至於張建君所強調的轉型模式，其實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經濟改革開放後的結果來進行認識，而不是從過程的方法論導引去進行總體性認識。如果只是把改革開放結果進行模型建立，只是形成另一個教條，或只是陳述一個現象，並且違背辯證唯物論精神，因為在發展道路上始終會出現內在矛盾。不同質的矛盾，就會有相對應的不同方法，就會面對不同改革進程與階段、與不同現象。則黃宗智將焦點放在理論與實踐的過程中來看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動力，卻是正確的；但理論與實踐的循環只是辯證唯物論當中的一個原則，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動力，比方只強調「實踐」，就會忽略「矛盾」的觀點。

如果從中國共產黨方法論導引此一高度看待中國革命與社會經濟變革，就會產生一個更為總體性的認識：中國一黨專政的集權領導，不只在理論上與實踐上的認識論循環，還包括一個本體論世界觀，即社會主義思想世界觀，同時必須掌握關鍵多數受壓迫階級，不斷面對歷史內部原因的主要矛盾、歷史外部原因的客觀條件、與階段性激化態勢，進行總體性論理與實踐循環過程，形成不斷地運動、發展與轉化，使得我們能將中國革命與改革開放的基礎、過程、與結果進行總體性的認識與瞭解。

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方法論導引範例

透過本文第貳章對中國社會主義方法論原型的論述，可以理解一個重要革命傳統因素的發展與傳承，就是作為本體論與認識論相結合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此一方法論的影響性可能大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教條規則，也大過以革命、改革結果作為未來發展的僵化模式。

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影響性，基本上反映在中國共產黨對持續辯證歷史過程的重視。我們可以首先從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作為一個歷史面向，來看待方法論導引的重要性。即一九二七年於上海，國民黨大屠殺共黨領導工人，其結果表示沿海地區聚集的大批城市無產階級是靠不住的，無法挑戰外國與國民黨霸權；由於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力量驅動，國民黨接受西方訓練與裝備，使得共黨與紅軍轉往窮困農村與偏遠區域。這個結果產生兩種方式的社會化過程，亦即政黨軍塑造出隸屬中國農村社會的層級（底層），而成為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而且與這些底層階級的價值與抱負相互塑造（Giovanni Arrighi, 2007: 374）。

毛澤東在《講授提綱》指出：

「中國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隨著中國無產階級自覺地走上政治舞臺及科學水準之提高，發生了與發展著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運動。然而在它的第一時期，中國的唯物論思潮中，唯物辯證法的瞭解還很微弱，受資產階級影響的機械唯物論，和德波林派的主觀主義風氣占著主要的成分」；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瞭解進了一步，唯物辯證法的思想逐漸發展起來。到了最近，由於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的嚴重性，也由於蘇聯哲學清算運動的影響，便在中國思想界發展了一個廣大的唯物辯證法運動。」

毛澤東亦在〈矛盾論〉中指出：

「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後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那麼，毛澤東便嘗試將一九二七年的歷史事件與中國共黨的持續發展，以辯證唯物法的認識加以理解，並強調出中國共產黨強調歷史辯證過程的發展態勢；亦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的轉變，是在方法論層次的導引，根據實際的歷史客觀條件，做出革命時期的轉型與變革。

一九二七年的歷史辯證轉變，使得中國和東歐、俄羅斯對待革命傳統的態度產生不同，也反映中國革命的獨特性。首先列寧主義的先鋒政黨目的雖然在中國持續，⁶但列寧理論的造反面向，卻被毛澤東所稱的「群眾路線」（Mass Line）代替，形成中國特色的民主集中制。中國共產黨給與工農優先性，而不是馬列教條底下的城市無產階級（即馬克思原先強調的革命階級），其實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歷史辯證過程中便已萌發。

接下來，我將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之文件，作為一個重要範例，來看待中國共產黨於方法論導引的關鍵性。

為什麼要以這個文件作為範例？

⁶ 列寧主義堅持有意義的社會變遷必須透過革命，改革只有腐化被壓迫者的傾向。列寧主義蘊含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低度發展地區之應用，並以此發展彈性的政治策略，包括動員農民和少數種族團體以從事革命。最主要的是它強調由職業革命家組成「先鋒黨」（vanguard party）之必要，革命先鋒受命藉由結合群眾動員與官僚控制之方法，確保開明「意識」對盲動之優越性，此即列寧所謂的「民主集中制」。

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三月至六月這段時間，針對該文的起草也提出若干意見，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以下簡稱〈起草意見〉）。⁷我們可以透過鄧小平的說明，看出這份文件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所具有的重大意義，而這一層次的意義是突顯於方法論導引層面上的；亦即，中國改革開放如果沒有首先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部在辯證唯物論層次上的論理過程，是不可能有接續的經濟改革與開放發展。

站在馬列思想世界觀的基礎上，以辯證唯物方法論作為導引，中國共產黨必須總體性面對歷史動態過程中的主要內在矛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激化所帶來的創傷；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首先在論理層次而不是實踐層次進行對於過往歷史錯誤的否定，特別是對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否定，進而產生論理轉化，建立起階段性的論斷同一性，以面對中國當時的客觀現實，進行指向未來的實踐，即四個現代化的建設運動，方能持續理論與實踐的循環過程，以面對未來的持續發展。

則這份文件，不只在內容上對未來的改革開放措施具有重要的關鍵意義，亦突顯中國共產黨在方法論導引層次上的關鍵特殊性。如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論導引，中國共產黨不會特地撰寫這篇官方文件，而正是因為有著方法論的導引，這份文件也就具有指向未來的重大意義。

鄧小平在〈起草意見〉中強調：「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準確」，因為《決議》一文必須是根據歷史動態過程上的論理，而不是歷史鋪陳，也不只是陳述歷史證據而已。鄧小平認為在《決議》一文的中心意思只有三條，而其中最核心、最根本、最關鍵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是說在爾後的改革開放過程，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鄧小平在〈起草意

⁷《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國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起草小組由胡喬木負責。從一九八〇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多次談過對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見。這是其中九次談話的節錄。

見〉中認為：

「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志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國際上很關心，左派黨很關心，許多朋友也在看我們怎麼說」；

「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延安時期那一段，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比較完整地形成起來的一段。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包括黨的建設的理論和處理黨內關係的原則，在延安整風前後，都比較完整地形成了。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批判三次

“左”傾路線，對照著講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沒有專門講毛澤東思想的全部內容。現在這一次，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則透過鄧小平的說明，可以知道在中國經濟改革初期，中國共產黨內部仍面對文化大革命激化所帶來的主要內在矛盾，即思想路線的確立問題，這個問題也有外部因素的牽連，即國際上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的發展。這個說法突顯辯證唯物論的導引特質，就是從內部原因來看待內外關係。同時必須針對過去思想路線的懷疑進行論理的否定與開展，進而產生思想上的轉化，與理論上的同一性。

鄧小平在〈起草意見〉中認為《決議》文第二個必須審視的重點就是：「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這主要也是呈現歷史動態的否定過程。而第三個必須注意的重點就是，強調通過《決議》一文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總結。鄧小平在《起草意見》中強調：

「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當然，議論過去，將來也難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討論當前工作的時候，聯繫著談談過去有關的事情。現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團結一致向前看。做到這點不那麼容易。決議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認識一致，不再發生大的分歧。這樣，即使談判歷史，大家也會覺得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可說了，要說也只是談談對決議內容、對過去經驗教訓的體會。」

從鄧小平說明強調的第三項重點，可以知道鄧小平認為《決議》一文的總結宜粗不宜細，是說明在方法論導引上應在該文進行論理上的共識，並產生思想轉化，建立起階段性的思想同一性，以面對中國未來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將無法在黨內歷史動態發展過程中建立起共識，那麼共產集權的意義將消失，形成一盤散沙。

當時論理層次雖然是主要內在矛盾，但發展過程還是必須根據過往實踐經驗進行方法論上總體性的認識與理解。那麼根據鄧小平的三條重點陳述，可以知道最為關鍵的，還是根據第一條所提的「思想路線確立問題」為核心，以保證後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這使得《決議》一文扮演非常重要的政策文本角色，也會深刻地影響後續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以下，我將仔細論述《決議》一文的內容。

《決議》一文有著辯證唯物論對於歷史發展的尊重，該文首先從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前的革命運動談起。於歷史陳述中，該文再次提及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七年的挫敗：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和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不顧以宋慶齡為傑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的堅決反對，背叛了孫中山所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黨當時還比較幼稚，又處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致使革命在強大敵人的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已經發展到六萬多黨員的黨只剩下了一萬多黨員」。

這樣的結果於是導致中國共產黨進行轉化，開始進行土地革命，以及從鄉村包圍城市的工農革命軍的武裝起義。接著提到在一九三四年紅軍不能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於是進行戰略轉移，「萬里長征」至陝北，這是另一次挫敗，共產黨員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而一九三五年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得以去除分裂主義，「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接著從抗日至國共內戰時期，《決議》一文有強調：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從一九四二年開始在全黨進行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礎上，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著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歷史的經驗，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

亦即，中國共產黨在動態發展過程上，始終重視階段性的歷史辯證過程，以取得在思想、政治、組織的階段同一性。然後《決議》一文先約略總結中國共

產黨從建黨到建國二十八年時間，所產生的變化：

其一、將馬列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結合，建立起毛澤東思想。

其二、突顯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鋒政黨與工農軍隊的結合。

其三、中國各個階段革命，有受到外部因素的援助，但更與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內在原則有關。

其四、《決議》一文說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對國際局勢和世界人民鬥爭的發展具有深刻的久遠的影響」。

至此，《決議》文的陳述，已經表達「毛澤東思想」是理論至實踐再至理論的轉化過程所形成，並突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抓緊內在矛盾而形成先鋒政黨與工農軍隊的實踐過程，進而影響外部條件的轉變。

緊接著在《決議》文開始論述毛澤東在建黨到建國二十八年間的貢獻，以及公認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說明建國後的發展基礎，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該文說明中國共產黨建立起工農聯盟的民主專政政權、實現國家統一（除了台灣）、戰勝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侵略、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去除剝削制度，以及說明建國後的三十二年在工業、農業、商業、對外貿易、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國際外交、軍隊建立的增長與進步，時間點都是以一九八〇年與一九五二年進行比較。不過該文不是一味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政績，否則《決議》一文就失去吾人於前文所提及的意義。

《決議》文論述：

「新中國建立的時間不長，我們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於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黨的領導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過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後來，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這就使得我們沒有取得本來應該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

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多更大的錯誤。但是，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

《決議》文開始突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錯誤，並承認實踐的成就，企圖就思想上的論理辯證否定錯誤、肯定成就，以作為未來改革開放發展上思想統一的主要動力。該文繼續強調中國共產黨建國開始的七年，所具有的改革成就。在強調此一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踐策略時，該文使用「歷史的必然性」的說法來解釋當時歷史發展的動態過程。這也是一種辯證唯物論的用語。辯證唯物論極為強調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同時使用，亦即在不斷積累相對真理時，必然會產生一個絕對真理，必然會產生歷史的必然性。雖然絕對真理可能是歷史階段性的，因為在不同歷史時期，絕對真理可能會變成相對真理。總之，「歷史的必然性」說法，突顯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論使用。

《決議》文亦強調在該過渡時期，「黨已經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此一說法也蘊含辯證唯物論對於特殊性的重視，亦即根據實際客觀條件的限制，根據所處的質的情境不同，而採用特殊的方法與策略，因而產生中國特色。那麼在方法論導引上，中共集權領導的發展路線，不可能依據西方發展路線模式進行複製，而是依照中國自身內在矛盾，進行理論建立與實踐。《決議》文提及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國共產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經指出：

「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臺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而鬥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

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本文第一章提及，中國社會主義動力邏輯就在於辯證唯物論導引上對社會經濟兩個根本的動力能源，即生產力與階級鬥爭進行辯證推動。中國共產黨在經歷文化大革命一再左傾而激化階級鬥爭過後，使得中國共產黨必須反思歷史，透過辯證唯物論的認識方式，轉過來強調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性，畢竟就辯證唯物論的認識方式而言，至一九八〇年代為止，中國主要內在矛盾是經濟文化發展需要的不足。

然後《決議》文開始針對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建設進行論述，於論述過程中又提到：

「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接著，他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上述話語仍彰顯中國共產黨是以辯證唯物論的內在矛盾思考方式，進行國家發展建設。最後，該文在十年建設論述中強調，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八〇年代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該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與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

的，當然也提及黨的工作錯誤。《決議》文特別說明一九五八年以毛澤東爲主的中央與地方領導官員的錯誤：

「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爲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此外還有“反右傾”的錯誤，使得當時中國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不過中國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的發展過程裡，該文強調雖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有對運動中的錯誤進行糾正，使得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但“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徹底糾正。《決議》文提及：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爲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爲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爲“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

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因為同時期中國共產黨仍有執行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並且於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布：「要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爲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號召由於“文化大革命”而沒有得到實行。」因此，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之初所強調的四個現代化，其實早在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已經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提及出來，文化大革命阻礙了這個進程的發展。

《決議》文很關鍵的一部分是針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過程以及毛澤東個人崇拜現象，進行反思與檢討。《決議》文點出毛澤東過去領導十年文革的基本論點：

「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決議》文接著論理說明：

「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於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

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決議不多加論列。」

因此，該文有意的立論，就是企圖把毛澤東的錯誤與毛澤東的思想區別開來。從馬列主義普遍性，透過中國具體實踐的特殊性，進而建立普遍性立論的毛澤東思想，這是辯證唯物論從一般到特殊，再從特殊到一般的理論與實踐的導引過程。該文把毛澤東左傾錯誤視為脫離辯證唯物論導引所產生的必然錯誤，因為該錯誤就是沒有重視實際階級形勢、客觀政治狀況的影響。這同時表示，《決議》文是對文革否定運動的否定，進一步持續中國共產黨的動態歷史辯證過程；也表示文革所扮演的否定，其實是錯誤的否定前期工作的成就，產生錯誤的否定。

雖然這份《決議》文多少是為劉少奇、以及鄧小平自身進行平反，即如《決議》文強調：「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過如果以中國共產黨集體領導必須確立與統一未來的思想路線而言，鄧小平在指導這份《決議》文上，其實樹立某種典範，因為《決議》文把毛澤東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做出明確的劃分，並把中國發展重新立基於方法論導引上頭。

此後，該文開始對文革進行批判，以三個階段文革歷史過程，說明文革其實是給中國共產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內亂，並且評比黨內人員的成就與錯誤，不過最重要的是強調毛澤東應對文革負有主要責任，卻仍承認毛澤東的關鍵重要成就。然後《決議》文開始立論說明文革產生的社會歷史原因：

「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

「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

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

「同時，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係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鬥爭政策；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內鬥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此外，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制毛澤東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

《決議》文於探討文革起因時，主要立論中國共產黨在面對社會內部新起的內在矛盾，仍舊以既有階級鬥爭手段進行改善，沒有根據不同質的問題，採用不同質的方法；並且還利用馬列教條擴大與激化文革災難；同時也有外部因素條

件對文革產生的影響。只不過，文革的起因還包括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

「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複雜現象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那麼《決議》文在探討文革起因的第二點上，是強調中國長時段政治思想的遺毒所造成的偶像崇拜，以及無法藉由法律抑制這種偶像崇拜，也是造成文革的起因之一。則在《決議》文對文革的社會歷史起因的探討上，也突顯辯證唯物法對於歷史問題的認識，就是以總體性方式來探討歷史與社會動態過程中的內、外關係，方能對文革進行統一性理解，而不是只局限於對個人錯誤的批判。

在該文，除反對繼續以馬列教條施行政策之外，也反對因毛澤東個人崇拜

所形成的教條：「兩個凡是」。⁸《決議》文於是提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總之，《決議》文先對一九七八年的共黨作為建立起自信心，認為思想的活化是首要，卻也必須持續四個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其實這四個基本原則是蘊含於毛澤東所強調的辯證唯物論之中的。共產黨的集權領導是執行辯證唯物論的主體，因而呈現一種緊張性質；而社會主義則是辯證唯物論的根本基礎，其開端就是促使受壓迫階級的覺醒；至於馬列思想與毛澤東思想，則展現於辯證唯物論從一般到特殊，再從特殊到一般的理論與實踐循環過程，亦即透過馬列思想進行實踐，然後形成毛澤東思想，再進行實踐。

⁸ 亦即《決議》文強調中國共產黨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必須改變。

隨後，該文又持續強調一九七八年經濟改革後的兩年所具有的成效，包括主要的經濟與政治層面，以及其他各個方面。在《決議》文後半段，則突顯毛澤東思想重要性，這也是該文作為強調方法論導引範例的重要原因之一。《決議》文提及：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论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該文其實一再地反應出以辯證唯物論導引的理論與實踐辯證循環過程，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也說明馬列教條化、神聖化的錯誤。首先在中國共產黨革命時期，《決議》文便提及：

「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律，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思想，創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這表示唯有在方法論層次上，亦即藉由方法論導引，去研究長時段歷史與進行田野調查，才能建立理論以進行實踐，而能把武裝鬥爭與農民主體結合起來，進行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路線。《決議》文持續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黨的建設等角度，以大篇幅論述毛澤東的立論思想與相關著作；不過我們可以從該文最後對毛澤東思想總的認識，來看出我為什麼要強調應從方法論導引層次來看共產黨的內部變革。《決議》文說明：

「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串於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毛澤東同志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的長期艱苦鬥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們不僅表現在《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全部科學著作中，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活動中」；

亦即《決議》文內容本身便論述毛澤東思想背後是以辯證唯物論作為方法論導引，來進行理論與實踐循環的。所謂「實事求是」，《決議》文強調：

「就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就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

「毛澤東同志著重闡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特別強調充分發揚根據和符合客觀實際的自覺的能動性」；

「毛澤東同志闡述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他指出不僅要研究客觀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對於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因此，不能把辯證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須把它同實踐、同調查研究密切結合，加以靈活運用」；

「毛澤東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線，我們黨必須永遠堅持」。

這一段說明無疑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持續堅持毛澤東一再說明的辯證唯物論，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方法論導引。所謂的『群眾路線』，《決議》文說明：

「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毛澤東同志經常強調，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敵人最終都壓不倒我們，而只能被我們所壓倒。他還指出，領導群眾進行一切實際工作時，要取得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

「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

那麼毛澤東思想、甚至是中國共產黨所強調的群眾路線，基本上也是在方法論導引的層次上逐漸摸索出來的。所謂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決議》文說明：

「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必然結論。無產階級革命是國際性的事業，需要各國無產階級互相支援。但是完成這個事業，首先需要各國無產階級立足於本國，依靠本國革命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努力，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把本國的革命事業做好。毛澤東同志一貫強調，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自己找出適合我國情況的前進道路。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尤其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

就這點而言，毛澤東思想反應出辯證唯物論強調從內在原因著手的態勢；亦即國際性無產階級革命，也必須立足於掌握內在矛盾的發展，進而改變外部條件，或可進一步取得外在援助，但關鍵點仍在於內生動力與發展，這不代表要否定外部動力，而是首先著眼於內部。從《決議》文對毛澤東思想的說明，足以彰顯辯證唯物論作為方法論導引所具有的動力，而《決議》文本身亦是如此。《決議》文說明：

「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許多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寫的，但仍然是我們必須經常學習的。這不但因為歷史不能割斷，如果不了解過去，就會妨礙我們對當前問題的了解；而且因為這些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後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這表示《決議》文本身就是歷史動態辯證過程的產物，它持續彰顯中國社會主義的世界觀，並總體性的針對文化大革命的激化進行否定，轉化思想路線形成同一性；並要求根據客觀現實，以發現主要內在矛盾，從毛澤東思想進行實踐與

理論再創造的可能，形成持續動力於指向未來的發展上。該文在最後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奮鬥目標，並持續堅定社會主義路線，以及面對當時階段的主要矛盾，以階段性的方式逐步達成目標。該文除強調要建設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建立高度精神文明、加強民族團結、強化國防建設、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等指向未來的宣誓之外，最主要的是指出一九八〇年代的主要矛盾，《決議》文提及：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後，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於生產力的狀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必須實行適合於各種經濟成分的具體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並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於繼續前進的生產關係的具體形式」；

則該篇《決議》文，就是以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轉化為一種動力，確立同一思想路線，以指導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七八年後的改革開放事業；這是辯證唯物法作為動態歷史過程方法論導引的展現，如《決議》文結語所強調：

「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全黨的團結，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十一屆六中全會相信，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

因此《決議》文也彰顯中國共產黨首先必須有歷史過程上的否定與發展，以產生內部變革，才有日後的經濟發展可言。《決議》文作為一個關鍵政治文本，也最終彰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正是引導中國整體社會經濟動態發展的、關鍵的法則。亦即，在論理層次進行對過往歷史錯誤的否定，特別是對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否定，然後產生論理轉化，並建立起階段性論斷同一性，以面對中國當時客觀現實條件，再進行指向未來的實踐，就是四個現代化建設運動，方能持續理論與實踐的循環過程，以面對未來的持續發展。這也就是「思想解放」的意義。

肆、中國共產黨以方法論導引思想與長時段結構撞擊

本文已針對中共以辯證唯物論作為方法論導引的面向上，將其視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持續變革與進步的主要動力邏輯源頭。然而倘若對中國關懷的視野拉長，那麼在中國長時段小農社會經濟結構底下，生活處境相對較差的，就是大多數農民。中國共產黨的發跡與持續推動社會經濟的進步，首先必須在思想改革上面對中國長時段結構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與思想的靜止狀態。

毛澤東在《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提到，必須否定既有中國思想束縛，並著重依據客觀現實所進行的動態過程發展；同時在辯證唯物論世界觀體現上，也必須抓牢佔多數受壓迫階級，這使得中共開始朝工農優先性的態度上發展；這也符應研究者必須從長時段視野來看出中國共產黨變化的重要性！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一書裡，特地用一個章節來說明西歐與東亞在西元一八〇〇年以前都面對共同的生態限制。他強調在十八世紀晚期，西歐與東亞能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早已所剩無幾，西歐與中國都面對土地增產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老問題，亦即人口與土地消長所產生的生產不足問題（彭慕蘭，2004：310）。彭慕蘭（2004：381）並強調，西歐之所以後來能取得有效運用工業技術的成就，在很大成份上要歸功對美洲新大陸的開發與剝削。然而中國真的面臨人口與土地消長的生產不足問題嗎？

翁之鏞（1952：93）所著《中國經濟問題探原》一書，便從中國自身生態環境限制來解釋中國特殊的治亂循環發展。他認為中國兩千餘年所經歷各個朝代的興衰類型，不過是歷史徵象，並非原因，實則無法解釋中國長時段治亂循環；他透過對中國地理環境、人口、糧食作物的總體考察，認為中國治亂循環、朝代更迭的總原因，還是在人口與土地關係的消長：

「當人口少而土地多的時代，土地的生產足以供人口的消費，且富有繼續供給的彈性，就是治世，治世也能較為久長。一到人口增加已達飽和點，或超過了土地負擔能力之外時，即使未即曾成大亂，也將醞釀亂源而變久亂」（翁之鏞，1952：94）。

翁之鏞於是提出中國人口與土地在時間上的客觀演變規律，並因此造成朝代更迭的治亂循環。在中國自身生態限制的獨特基礎與治亂循環規律下，翁之鏞強調中國逐漸形成一個靜態的社會經濟結構。他以「有國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用」一句話，來說明與解釋中國由土地生財，財復入土的自然循環，而這個循環在中國兩千餘年時間中，不斷循環，形成土地周轉的自我束縛，安於農村經濟活動範疇，導致資本只能依附土地，而不能積累轉化；同時受到宗法社會家庭諸子析產制度影響，使資本不易集中，農場越分越小，小農制度得以定型。而中國小農制度誕生了服膺於該結構的中國傳統思想，亦即翁之鏞所強調的求均不求足的重農主義，同時政治觀念也隨小農經濟演變揉合儒表法裏揉雜黃老的治道，聽民自生自長，並孕育家長政治的發展。儘管重農，但農民未受益，並且忽略流通經濟的動態價值；同時憑藉政治力量轉變經濟行為的片面思想，也缺乏順適經濟潮流的政治方術（翁之鏞，1952：132-136；153-154）。

於是，中國長時段獨特的社會經濟結構，所孕育的經濟思想，翁之鏞（1952：144）認為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於是使得生產環境束縛思想，使其無法超脫既定藩籬。在這種長時段社會經濟結構底下，生活處境最慘的，就是大多數農民。翁之鏞（1952：100）強調：

「歷代變亂的農民暴動，除秦元末季之外，俱未發生決定性的作用，不過為人所裹脅供作號召的工具。農民在每一變亂中，無不是被犧牲者。到了新朝或對峙之局，祇要暫時安定下來，農民依然為統治者剝削的對象。」

那麼，中國共產黨的發跡，首先必須在思想上面對中國長時段結構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與思想上的靜止狀態。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討論農民問題，強調：「中國三萬萬的農民，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⁹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制定黨的歷史上第一個農民問題決議案，並明確指出：「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與，也很難成功」。¹⁰共產黨的革命組織形式，基本上就是把傳統小農社會結構中分散的個體農民組織團結起來。

經前文論述，可知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後，使中國共產黨轉化為從鄉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其實毛澤東早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就基於革命理論必須由實踐取得的方法論導引上，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在報告的開頭強調：

「我這回到湖南，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裡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

毛澤東之所以要進行考察，主要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部分中國共產黨人，因嚴格奉行共產國際所指令的「國共合作」方針，而堅持維護與國民黨合作，力主迴避農民運動所帶來的矛盾以遷就國民黨，故而也對土地革命及農民運動產生了極大的質疑與責難。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為解釋與回擊來自黨內的質疑，毛

⁹ 資料來源為一九九二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 冊，第 113 頁。

¹⁰ 同上引文，第 139 頁。

澤東便以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回到農民運動發展的湖南省進行實地考察。

因此〈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的出現，基本上就是一種方法論導引的彰顯。該文展現馬列思想的世界觀，連結受壓迫階級以進行運動，並透過實踐與理論的動態辯證過程，否定既有中國的宗法制度、土地佃租制度、也否定馬列教條；而在每一次運動導引下，便會相互轉化，使農民接受黨的引導，並加強黨的地位與黨的內部團結，產生革命運動的同一性。

於是共產黨基層政權的開創階段，也就是革命時期，最早是從農民協會發展起來。農民協會的建立，開始把鄉村中的政治權力由「內紳士夫豪之手，而移至農會」（王立勝，2009：105）；則「每一次行動都是群眾與黨組織的互動，每一次行動都是人們接受黨組織的領導並重新體驗黨的領導之必不可少…在黨的引導下形成自覺接受黨的領導的態度，因此革命的過程同時是不斷加強黨的領導地位的過程」（謝遐齡，2005：29）；而且，農民作為一個被動員起來並被灌輸了階級意識的群體，獲得一種在傳統農業社會結構中未曾有過的有組織的自治（陳明明，2002：239）。

在初期共產黨與農民辯證過程中，孕育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動員方式，使之產生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進而產生階級歸屬感，並直接產生具一致行動能力的機制。「訴苦」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

「將農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經歷和感受的苦難，歸結提升為『階級苦』的過程，不僅成為日後與之相伴的階級鬥爭的基礎，而且是在農民的內心世界中塑造農民與國家關係的基礎」（郭于華、孫立平，2005：22）。

農民被賦予階級意識，也感受共產黨作為一種力量，正在執行超出個人常規性生活的手段。而「土地改革」的成功，就是賦予農民階級意識所產生的結果，

也是中國共產黨與農民集體相互辯證過程的展現。然後從人民公社時期，隨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特別是在趕超戰略下，中國共產黨必須儘可能大程度地從農村提取資源，以支持重工業優先的經濟發展路線。在此前提下，所謂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以及戶籍制度應運而生。然而陳雲（1953）在一九五三年執行糧食統購統銷任務時還是強調：

「在糧食問題上，有四種關係要處理好。這就是：國家跟農民的關係；國家跟消費者的關係；國家跟商人的關係；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關係。這四種關係中，難處理的是頭兩種，而最難的又是第一種。處理好了第一種關係，天下事就好辦了。」

這句話顯示中國共產黨與底層農民的辯證關係仍然持續。從前文論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文中可知，中國共產黨在歷史動態過程發展的反思上，開始論理強調：先前著重趕超策略而造成浮濫建造基礎建設的負面影響，必須進行否定。同時也對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進行否定，提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物質消費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其實仍是面對中國長時段結構因人口增長而帶來的生產不足的問題。

隨中國改革開放之發展，以及中國加入東亞出口生產體系後，中國的貧困人口逐漸減少。中共國務院扶貧辦主任範小建（2009）強調，至二〇〇九年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一九七八年的 2.5 億減少到 2,148 萬，但貧困人口規模依然很大；到二〇〇六年底，全國農村絕對貧困和低收入人口總數 5,700 萬，占農村人口 6%。

貧困人口雖然減少，但城鄉差距日漸增大，而中國主要內在矛盾其實已經從生產不足，轉向耐久品生產過剩問題。問題的轉向，並不意謂共產黨與農民的辯證過程消失，因為在唯物辯證法世界觀底下，中國共產黨勢必要與弱勢階級產生

聯繫，因此三農問題成爲持續關注的焦點。

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共產黨的辯證轉向於農民消費、以及如何改革戶籍制度與背後的福利保障問題。亦即如何使農民擴大消費、如何解決農民工問題，還是首要的問題；同時中國共產黨在面對戶籍制度、城鎮化、社會福利保障等社會變革時，總是會先進行局部性、區域性試點，持續的進行理論與實踐的循環，推行強調動態發展的各項計畫型運動，以展現指向未來的轉化過程，這些實例都說明方法論導引對中國共產黨如何進行改革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在《一號文件與中國農村改革》（鄭有貴、李成貴，2008：1）一書裡的第一章，前兩句話是這麼說的：

「一九七八年，中國拉開了改革的序幕。這一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和普通農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改革」。

這句話無疑點出改革開放的開始，還是共產黨與工農辯證的持續。中國共產黨每年公佈的「一號文件」在年度工作中，具有綱領性和指導性地位，也顯示出最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鄧聿文，2010）。透過表二可知，中國改革開放起自一九七八年到二〇一〇年爲止，以三農爲基調的一號文件有十二份，占三分之一。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主要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定理論說明，以提高農民生產動機，給予農民土地使用權，並擴張國內市場流通領域經濟。從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三年，共產黨改革重點開始轉向城市，並企圖解決城市低效率的國有與集體企業經營問題（鄭風田，2010），因此並沒有針對三農的一號文件出台。這一段時間，也正是中國自一九九二年納入東亞出口生產體系後，而經濟高度成長的期間，於是城鄉差距擴大導致新的內在矛盾開始擴張。因此，從二〇〇四年一直到二〇一〇年，連續出台關於三農「一號文件」，展開共產黨與「農民」之間進一步的辯證。其中針對農民收入提昇、三農現代化基礎建設、農業稅取消、

擴大內需焦點於農村、以及協調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的建立等提出指導意見。

因此從十二個一號文件出台時間年份上，可看出中國經濟發展出現內在矛盾時，其指導文件就是以共黨與農工的核心辯證為主軸，建立政治理論與實踐循環的深化與發展。從社會事實來解釋社會事實，也可以說明為什麼鄧小平所領導的改革開放首先出現於農業，以及為什麼後期胡錦濤強調健康、財富、教育的擴張，以使農村區域受益，而舉起『新社會主義農村』的大旗。

由於辯證唯物論重視實際物質結構的歷史動態發展過程，因此中國共產黨會以發現內在矛盾為前提，陸續面對中國長期、緩慢、遲滯的靜態結構以從中解決問題，而不是完全複製西方世界、蘇聯的現代化模式。其中包括首先賦予農民階級意識以推翻宗法制度、租佃制度，再到否定階級鬥爭的手段以面對生產力不足的問題，以及否定傳統中國思想僵化的問題，然後憑藉理論與實踐的反覆循環，逐步改善與發展中國的社會經濟變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看到中國共產黨與農民的持續辯證過程，因為這是基於毛澤東思想、基於辯證唯物論所建立的中國特色的世界觀，如果不從方法論導引的層次來看，將不足以說明其變革的發展緣由，並且從論證的說明也可以看到方法論導引對中國改革發展的重要。

表 2、1978- 2010 年中國以三農為基調的 12 份「一號文件」¹¹

年度	文件名稱	主要內容
1978-1981		
1982	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或大包幹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
1983	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	從理論上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84	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	延長土地承包期，鼓勵農民增加對土地的投資，規定給農民土地承包期十五年以上。
1985	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	取消維持三十年的統購統銷制度，對糧、棉等重要產品採取國家計畫合同收購，農業稅由實物稅改為現金稅；是對流通領域的改革。還給農民的生產、銷售權利。
1986	關於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	強調進一步擺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1987-2003		
2004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	聚焦「三農」問題，因為城鄉差距拉大，農民收入增幅低速徘徊，農村社會矛盾突出；糧食供應出現局部緊張。
2005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	把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

¹¹製表參考：鄭風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2010 年 1 月 14 日)。「一號文件」十二份一號檔有什麼變化規律？。鄭風田部落格。2010 年 1 月 14 日，取自：

<http://blog.10jqka.com.cn/account/5458/65535458/posts/3297044.shtml>

	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	務。
2006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面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消農業稅，農村改革也轉入以鄉鎮機構改革、農村義務教育改革、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為主。
2007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促成農村現代化。
2008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	加快構建強化農業基礎的長效機制;切實保障主要農產品基本供給;抓好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強化農業科技和服務體系基本支撐;提高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和深化農村改革;紮實推進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
2009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 2009 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	擴大國內需求,最大潛力在農村;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基礎支撐在農業;保障和改善民生,重點難點在農民。要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穩定發展農業生產;強化現代農業物質支撐和服務體系;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
2010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	城鎮化作為農業農村發展的戰略，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並且強調城鄉改革聯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再來，我們應從方法論導引層次來看待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轉型。亦即，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是在辯證唯物論層次上對馬列思想的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教條進行辯證，中國也無法加入既有東亞出口生產體系，也就無法在日後逐漸成爲東亞出口生產體系的核心，也無法改變原先既有的封閉結構。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以及其結合東亞資本家島國的出口生產體系，而形成的轉型結果，無疑的呈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雜交的現象。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個雜交過程？我認爲仍必須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看待整個轉型的發展現象。從方法論導引的層次來看，中國改革開放是以中國自身內在矛盾爲依據的。亦即，以解決中國主要內在矛盾爲依歸，衡量外部有利條件，以進行內在矛盾轉化。

從《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文，可知道一九八〇年代中國共產黨針對的內部主要矛盾，是生產力不足的問題。於是中國共產黨必須針對當時的主要矛盾進行發展，就必須結合有利的外部條件，這是辯證唯物論的重要導引原則。我們先看看當時領導人鄧小平的一些說法。

鄧小平（1979）於一九七九年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中強調：

「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醜惡頹廢的東西。如果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資本主義制度，它們的經濟文化肯定還會有更大的進步。所以資本主義國家中一切要求社會進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努力為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不公道、不合理現象直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則鄧小平點出，要解決中國主要內在矛盾，必須借鏡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也就是援用外部有利條件來解決中國自身內部問題。那麼，關鍵不在於學習西方制度，關鍵在於解除中國自身內在矛盾，因複製西方制度不一定能解決中國

自身內在矛盾，中國自身內在矛盾必須在中國自身動態歷史發展中轉化；況且，所謂內在矛盾觀，就是社會主義辯證唯物法的導引法則，根本就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觀。同年，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1979）又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說明：

「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於同世界隔絕的狀態。這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不是我們自己的原因，國際上反對中國的勢力，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勢力，迫使我们處於隔絕、孤立狀態。六十年代我們有了同國際上加強交往合作的條件，但是我們自己孤立自己。現在我們算是學會利用這個國際條件了」；

「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開放的對外政策。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但是，離開了國際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則面對中國當時的主要矛盾，要實現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經確立的四個現代化政策，鄧小平首先就是在方法論導引層次，帶動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這個發展前提，就是在理論上否定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並且將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

義發展的手段、方法。列寧說過：「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凡在有小企業和交換自由的地方，資本主義便應運而生」（布勞岱爾，2000：3：567）。馬列教條所強調的意識形態，無疑把資本主義等同於市場經濟，這也是布勞岱爾要澄清的地方，亦即資本主義不等同於市場經濟，鄧小平無疑的也在辯證過程中，宣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差異，並且把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手段。

再把時間往後一點，鄧小平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的過程中說：

「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如果我們還記得翁之鏞提及中國舊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話，那麼更可以看出鄧小平追求富裕社會主義的決心，中國拒絕資本主義的富裕，也拒絕社會主義的貧窮，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所追求的是均富，但是必須有著歷史階段性過程的轉變，亦即「讓一部分人先富有起來」，然後在進一步內在矛盾激化當中，不斷朝向均富道路邁進。

從鄧小平談話當中，可看出中國共產黨就是以方法論導引的內在矛盾原理，從內部進行理論與實踐循環過程，並援引外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資源條件，進行動態過程發展。於是造成中國轉型時期的獨特現象，即同時具有中國社會主義變革與東亞資本主義體系出口生產導向的辯證發展，產生相互交織的過程。方法論引導成為一股動力，成為對內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以及對外拉動資本投資以生產出口到北美市場的雙重交織動力。

林毅夫（2008：147）指出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九〇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 9%，但到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七年平均每年增長速度變成

10.5%，國內生產總值增加 5.4 倍。而中國起自一九九〇年代增長速度加快的原因，有一定程度上是外貿成長帶動，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七年中國外貿方面年均增長 18.8%。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八年中國內部消費成長速度大約只維持年均成長 7% 左右（林義夫，2009：309）。則從數據上可顯現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確藉由東亞出口生產體系此一外部條件取得，加速經濟成長，並以此帶動部份富裕人口的成長，卻也拉大中國貧富差距，並加速中國內部結構的改變。關於中國改革開放與東亞出口生產體系之間的關聯與進一步說明，會在下一章節加以探討。

除鄧小平的談話之外，我們也必須回歸中國的政策文本，以看待中國內部經濟體制改革的辯證過程。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該文反應出中國共產黨內部在改革開放初期，如何進行方法論導引上的理論與實踐循環過程，同時也印證上述鄧小平的談話。

《決定》文一開始就強調：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分析了我國當前的經濟和政治形勢，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這幾年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一致認為：必須按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要求，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以利於更好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亦即該文的說法，就是以辯證唯物論引導原則為依歸進行撰寫，強調根據頭幾年實踐經驗，進行正反論理辯證，持續執行改革開放目標，但階段性任務則把農村經驗轉移到城市。該文內容也說明一九七八年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驗

具有重要性，而該經驗可以成爲城市發展條件，而以城市爲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正在進行不斷地試驗與探索。亦即改革開放的過程必須重視內部理論與實踐不斷循環的過程。另外《決定》文亦強調：

「正在世界範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體制，具有吸收當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動科技進步，創造新的生產力的更加強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爲迫切」；

「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必須認真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認真研究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發展要求，同時必須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法」；

於是《決定》一文回應鄧小平談法，就是吸收資本主義先進技術與經營管理方式，而不是吸收資本主義制度，重點是擺在「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亦即強調中國內部經濟體制變革，強調內部動態發展過程，而外部激勵只是協助內部發展的條件。因此，該文也強調必須改變中國內部僵化模式。《決定》一文的重點在於提出：

「改革計畫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就是說在頭幾年改革開放過程的經驗上，中國共產黨認知到計劃經濟與市場

經濟可以並行，無須產生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這是透過實踐而形成的新立論。因此《決定》文強調，可以根據歷史經驗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對中國計畫體制基本點作出概括的論理解釋：

「第一、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畫經濟，即有計畫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第二、完全由市場調節的生產和交換，主要是部分農副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它們在國民經濟中起輔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實行計畫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畫為主，指令性計畫和指導性計畫都是計畫經濟的具體形式；第四、指導性計畫主要依靠運用經濟槓桿的作用來實現，指令性計畫則是必須執行的，但也必須運用價值規律。按照以上要點改革的計畫體制，就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畫的範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畫的範圍」；

那麼《決定》文其實涵蓋前幾年經濟改革實踐後的論理過程，首先區別中國的計畫商品經濟，並不等同市場可以自行調節的西方理論，並將計畫經濟執行方式加以區分，強調要擴大指導性，降低指令性，這些都是政策文本的理論建構，而且是根據動態過程的實踐產生出來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就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進行理論、政策不斷修正的動作，《決定》文就強調必須承認多種經濟形式的發展：

「全民所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主導力量，對於保證社會主義方向和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決不應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發展為條件。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領域的生產建設事業都可以放手依靠集體來興辦。我國現在的個體經濟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聯繫的，不同於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聯

繫的個體經濟，它對於發展社會生產、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勞動就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是從屬於社會主義經濟的」；

則這種對於多種經濟形式發展的強調，其實突顯社會主義發展辯證動態過程，亦即中國社會主義已不是馬列教條裡虛幻的社會主義，而是不斷以方法論引導所具有開放改革能力的社會主義發展態勢。林義夫（2008：152）探討中國、越南的轉型成功，認為是得益於它們推行一種漸進式、雙軌制的經濟改革。所謂的雙軌制就是存在計畫體制干預與扭曲經濟，但也有市場的存在；然後在過程中，市場接軌越來越大，國家掌握資源越來越多，原來扭曲也就越來越小，進而達成漸進式改革目的。然而雙軌制改革，不是一蹴可幾的發明，它是中國在辯證唯物論導引下的產物，是在反覆理論與實踐循環過程下的產物，它有著歷史動態過程演變，它不是奇蹟，而是在馬列思想世界觀底下，根據自身內在矛盾與外部條件客觀現實，所做出的轉化與發展。

因此可以把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視為一個個理論與實踐循環的運動，它不是根據一個單一理論所做出的變革；像俄羅斯與東歐國家就是依據單一華盛頓共識理論而進行「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它們便沒有動態歷史過程的彰顯，因為它們缺少方法論導引。

總的來說，本章企圖說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彰顯了怎樣的重要性；其重要性就在於一黨專政的方法論導引。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78/ 2010：7- 8）在面對理論與實踐相關議題時，他便強調在理論與實踐關係的背後，其實有一種「指導認識的興趣」在回應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當主體依照某種邏輯結構的旨趣來認識客體的發展與運用時，便會形成理論用以面對社會經濟結構的型塑、及其如何運用發展的實踐，形成理論與實踐互動關係的過程，而這個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過程，便被哈貝馬斯認為是一種方法論的內在表現。而且我們知道唯物辯證法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要的邏輯結構（陳明，2008：22）。因

此，當田辰山（2008：9）讚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觀點，認為他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作為理論建設工程而實現、是為了解決「農民中國」革命問題而實現時，我們應該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目前需要的正是更深入的從方法論層次來看「中國一黨專政如何面對長時段社會經濟結構的問題」。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在於它是一種方法論導引的、活化的社會主義，它仍是辯證唯物論的社會主義，也正因為它是辯證唯物論的，於是中國社會主義會依據內在矛盾與外部條件的客觀現實，不斷進行否定、立論、經驗、實踐、轉化的發展過程，而產生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持續的社會主義發展態勢。也由於方法論引導的作用力，就必須將中國市場經濟運作視為一個一個方法論引導的重要運動，這些運動將會展示一黨專政如何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如何將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手段以進行整體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

是故，於本章我強調一黨專政與中國底層小農社會的歷史辯證過程，因為中國小農社會結構的特殊性，使得共產黨在方法論引導上產生與農民持續辯證的歷史過程。當中國在東亞出口生產體系扮演重要角色之後，原先在改革開放前因戶籍制度所產生的中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因為對外貿易擴張，而加深中國內部城鄉差距問題、農民工問題，使得新內在矛盾產生開來，於是產生進一步的思想與結構的撞擊；也就是在方法論導引下，去面對結構轉型問題，而展開進一步的歷史辯證過程動力。

為了進行更好的總體性認識，我將繼續探討中國一黨專政如何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導引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建構出一套核心的動力發展系統，以導引中國市場經濟運動的發展，並能面對整體社會經濟的轉型議題。

伍、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

前文論述中共如何在方法論層次導引思想對長時段結構的撞擊，但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前，也同時面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條所帶來的沈重包袱。如果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歷程中讓世人有目共睹、刮目相看，那麼從動力學研究角度，一定有一些新的社會動力元素產生，其中一些元素可能在大部分層面上可以與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傳統和平相處，但可能有些新元素（當然包括外來元素的融入而有著內生的變化）冒了出來，讓舊有社會主義社會感到懼怕：似乎擔心，這些新社會元素不是在傳統社會基礎上拉抬整個社會以朝向現代化發展；反之，是把整個傳統社會給吸進不見天日的黑洞（如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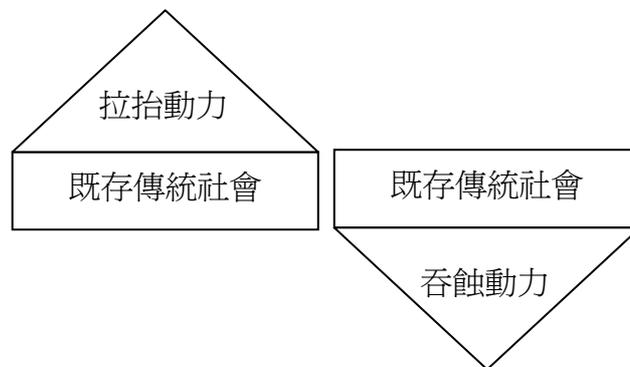


圖 1、一個社會的內生型轉變示意圖

一個社會從內在轉變，不管形成吞蝕動力、或拉抬動力，就行動層面而言，可能是一個人（例如：先知、英雄）、或是一個團體與組織（例如：政黨）、更可能是一個整合的系統機制。就歷史社會學所具有的旨趣而言，在動力學研究的探討上，應當發覺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是否具有一個整合的系統以面對其相應

產生的動力結構。

P G M Dickson (1967) 在探討英國金融革命六十年發展的歷程時，便使用過「系統」(system) 這個詞，解釋英國如何形成具改變傳統社會的拉抬動力。我認為，可以將「系統」稱作是一種制度單位建立並彼此相互聯繫的實踐動態過程；而系統的建立，首先必須對既有傳統社會的各種可能偏見，進行除魅的過程，這也是在方法論層次上，對理論與實踐不斷進行發展的過程。¹²中共官方文章《關

¹² 社會學者常使用「系統」概念。古典三大家之一的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2002: 24) 便曾強調，當我們注意到某種社會事實獨立於個體之外時，我們就確認了一個社會世界。這個社會世界，是一群相互關聯的個體，通過統一在一起，於是形成系統，並成為社會生活的基礎。涂爾幹 (2002: 17) 又強調，一旦相連動態系統成為穩定，將使得「相同的運動系統可以服務於迥然不同的觀念而不必做出相應的更正，此再現的觀念也總是最普遍的類型」。我認為這樣一種對動態系統的功能性、社會事實的陳述，容易忽略動態系統之所以誕生的核心思維邏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後的美國學者帕深思 (Talcott Parsons) 進一步演繹，把社會當作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層面的次系統所形成的一個總系統，又把個人放置在這個社會系統的不同領域中去進行分析。在帕深思看來，社會中的行動會構成一種行動系統；一個系統就是一系列的行動所組成的，在這些行動之間存在著各種因果性獨立的相互關係；一個社會系統是由兩個或更多相互交叉和相互關連的角色組成的。這也使得所謂的社會，在帕深思看來，就是一種「總體社會系統」(total social system) (高宣揚, 1998: 599、615-617)。那麼，透過涂爾幹、帕深思兩位學者的見解，社會學者的確可以透過「系統」的概念來說明某種社會事實的彰顯。依照涂爾幹的說法，系統可以對應於不同的理論概念，因此他認為首先認識社會事實是重要的。不過我企圖要說明的是，「系統」此一事實，是如何被一種方法論給導引出來的，亦即其動力因素是拉抬到對於方法論層次的說明，我們才能更瞭解社會變遷的特殊性。亦即我們應關注社會變遷現象所可能採取的系統形式，及其背後所指涉的發展邏輯。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一黨專政施為，便是以「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作為方法論基礎，並開始在方法論層次進行一種合理化機制的行動取向，以促發：1、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動力機制的持續發展；2、微觀（企業）主體動力的持續發展；3、包含短至長時期的試驗與規劃循環機制；4、一黨專政持續可能的宏觀調控。故而，在面對中國所做出的系統定義，是依據辯證唯物論作為其背後的行動思維邏輯而體現的實際現象——就是四個系統的誕生，分別是：「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宏觀調控管理系統」、「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而這四個系統我統稱為「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用以使我們更能夠理解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過程。那麼我所謂的「系統」，就不是一種絕對系統功能理論下的意義，也無法用帕深思的 AGIL 典範來詮釋中國的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關鍵仍是我提出的問題：中國到底是以一個怎樣地「系統」來拉抬社會？我認為中國就是在方法論導引機制的系統化之後，使得各部門之間的制度創新與連結能不斷鞏固一黨專政的發展性與可能性。

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文作為一種範例，正是面對中國社會主義過去三十年的傳統所進行的除魅，它糾正中國共產黨自身一些既有的鬼魅意識形態。

但我們又不能否認中國社會主義傳統確實對改革開放仍有重大影響。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並不是建立在完全覆滅舊有傳統思想與制度的環節上才開始進行的；其中，本文論述的核心概念，亦即中國一黨專政的方法論導引的特殊範式，一種針對中國長時段小農社會結構特殊性所具有的辯證唯物論範式，仍舊扮演重要潛藏動力，敦促中國現代化發展。

那麼，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階段，我們是否能繼續以方法論層次來看待中國共產黨究竟產生怎樣新的系統性元素以面對一個新的轉型發展結構呢？也就是說，我們是否能說明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時期、在發展市場經濟時期所建立的相應社會經濟動力系統？並提供一個新穎、暫時、卻仍待深入探究的圖像？

田辰山（2008：22）始終強調，自毛澤東以後成熟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確與中國的互系性思維有關，亦即主體能透過互系性的方法論旨趣，將每一個事件按照類比關係納入到一種機制中，然後再冥思和採取行動，而這些行動正是由於方法論層次所建構的關係所喻義的。那麼，我認為從宏觀角度可形成一預設的猜想：中國共產黨倘若根據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來進行理論與實踐的引導過程，便可能形成一種機制的發展，並使中國的一種整合的社會經濟發展系統能夠誕生。

根據此一思考脈絡，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歷史中，透過對改革開放時期相關歷史資料的蒐集與閱讀，我對幾個重要制度的建立與變革展開注意，包括：宏觀調控、分稅制、混合所有制、以及國家發展計畫。本文試著以「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此一名詞概念，說明中國在改革發展三十年所創建的一種特殊、隸屬於方法論層次的動力系統，以及其相應的轉型經濟發展結構，當然這樣動力系統的建立仍是建基於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導引之下。首先，必須從具有中國特殊性

的宏觀調控管理系統加以說明。

一、宏觀調控管理系統

二〇〇二年，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2002）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提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經濟進一步壯大，國有企業改革穩步推進。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較快發展。市場體系建設全面展開，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政府職能轉變步伐加快。財稅、金融、流通、住房和政府機構等改革繼續深化」。

如果將此官方報告，與早在一九八四年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放在一起進行解讀，將會發現中共中央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始終堅信不移，依然保有此一核心意識形態。但相對而言，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外顯形式，它隨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近程而逐漸形成與持續變化。不過面對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所形成的現代化社會經濟增長結構而言，「體制」的說法仍屬於靜態強調，它象徵中國在轉型過程因應結構調整而陸續誕生的外顯形式。在這樣的說法下，我們是否可以觀照出一個具整合的動力發展與調節系統，是能凌駕中共官方所稱之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呢？

於是我注意到江澤民在報告中所提出的「宏觀調控體系」。或許能從宏觀調控體系作為一切入點，說明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下所產生的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相應的社會經濟制度聯繫系統，如何在宏觀方法論導引下產生重要意義、以及說明其圖像。

首先須強調，中國相對歐美已開發國家，仍是一發展中、尚未定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中共一黨專政所進行的市場經濟與現代化發展的動態情況底下，將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議題作為一個背景，是作為研究者時刻都必須關注的。在這樣背景因素下，所謂宏觀調控系統之所以可能，就在於它不只是面對如同西方的短期經濟波動而已，反之，它還必須面對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特殊經濟增長結構所做出的調整與創新。

如果將現今中國轉型放在長時段觀看，則中共以方法論導引理論發展與長時段結構進行撞擊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其思維動力邏輯，同樣可運用於目前中國社會的轉型議題上，因為發覺社會經濟結構內在矛盾、以及持續進行變革，本來就是中國政府不論在政治文本、或是實踐層面都會關懷的一部份。

從實踐層面看，如同中國山東財政學院副教授王靜（2008：2、40、41）所強調的，中國在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二年期間共經歷四輪以治理經濟過熱為目的的收縮性宏觀調控、和一輪以治理通貨緊縮為目的的擴張性宏觀調控。這顯示中國經濟運行的短期波動矛盾更多地體現為經濟過熱，與西方政府以凱恩斯主義為首的干預經濟理論所應用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上大不相同。

因此，要理解中國宏觀調控體系，必須關注中國現實情況，找出內生性觀點，而非強行以西方干預經濟理論做出強行解釋。王靜（2008：94）強調：

「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在研究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和宏觀調控的經濟學者看來，宏觀波動本身就是經濟總量的波動，與經濟結構沒有關係，與經濟體制轉型沒有關係，或者說，在研究短期經濟波動時，經濟學家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經濟構成各部分的同質性」。

這種假定市場是同質、將研究定位於總量層面、卻不考慮結構性問題的經濟理論，無法完全解釋中國現代化發展所產生的動力系統的特殊性。因此，若從社

會經濟結構層面來探討，就如同本文第一章強調的，凱因斯主義只能作為西方意義發展下的理論導引，並不能解釋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特殊性。我們必須關注中國自身在理論與實踐辯證過程中的歷史脈絡，因此不能以西方理論典範詮釋中國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觀調控系統，必須對應於中國現實情況的結構才行，方能夠提出內生性的見解。

(一)、一位經濟學家的觀察：從具體宏觀調控事件看起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一文中，首先提出「宏觀調節」幾個關鍵字，並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開始發展宏觀調控系統。這可以理解。當一個完全強調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逐步轉型、並納入市場經濟體制之後，就必須更加掌握經濟動態運行，而且要掌握對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槓桿的綜合運用技術。

中國在二〇〇三年下半年開始啟動緊縮性的宏觀調控措施，並且持續到二〇〇五年。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2005），在〈從這次宏觀調控的實踐看我們黨駕馭全域領導發展的能力〉一文中，認為當時宏觀調控產生成效有四個主要原因，即展現出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方針：主動調控、區別對待與有保有壓、多種手段與綜合配套、以及改革結構。從該篇文章所論述出來的宏觀調控具體方針，很容易發現中國辯證唯物論導引範式所帶來的影響。

亦即中國宏觀調控動態運作系統，首先是彰顯政府主體思維能動性，並試圖調整社會經濟結構的矛盾與對立，同時把經濟槓桿、法律、行政措施作為一種方法與手段，在方法論導引下進行技術性調控，最後就是促使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內部因應外在條件的發展而進行轉變。只是光從文字詮釋並不能詳細說明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與宏觀調控系統之間的內在關聯，必須進行更細緻的關於現象與結構的討論。

首先，必須從具體宏觀調控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看起。王靜（2008）對於從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五年中國政府所從事的宏觀調控發展階段、手段、特點與結果做出細緻的鋪陳與描述。這可以作為認識中國宏觀調控系統的起始點。王靜（2008，145- 150）將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三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文件（央行 121 號文件）作為該次宏觀調控的起始點，直到二〇〇四年第一季度視為該次宏觀調控發展的第一階段。在該階段中，中國政府相關部門一共提出十七項調控措施；宏觀調控從起初個別政府部門各自實行相關措施，轉變到多個政府部門開始進行聯合行動。該階段的宏觀調控措施有貨幣政策形式的經濟手段、以及行政式的手段，但總體而言，該階段的調控手段相較於下一階段而言，是屬於柔性的；同時其宏觀調控的結果並沒有完全抑制投資過熱的勢頭。

爾後王靜（2008，150- 152）將二〇〇四年四月至五月的宏觀調控措施視為第二階段，一共有九項宏觀調控措施提出。顯然，該階段宏觀調控措施密集性較高，並以行政性手段為主，進行力度大、針對性的重點調控。王靜（2008，151）特別點出中國政府在四月六日對「鐵本事件」的查處，作為「政府對於抑制部分過熱行業行為的決心，成為本輪宏觀調控的一個鮮明標誌」。「鐵本事件」是指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歷時兩個多月，對江蘇鐵本鋼鐵有限公司及其關聯企業進行專案檢查，並延伸檢查七家物資回收企業；此過程查清涉案企業的涉稅違法問題，認定江蘇鐵本公司等三家企業偷稅 2.94 億元人民幣（陳二厚，2004 年）。這樣一種雷厲風行的行政手段，其實彰顯中國政府企圖達到的一種「遏制」效果。而透過王靜的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在第二階段的調控措施，確實使投資過熱勢頭得到「遏制」，展現中國強政府的形象。

王靜（2008，152- 154）將二〇〇四年六月至二〇〇五年的宏觀調控措施視為第三階段。由於強力宏觀調控措施逐漸生效，從二〇〇四年第三季度開始，宏觀調控措施轉變，並提出十項具體改革措施。從十項具體措施可知，行政手段逐

漸退出，換之以短期貨幣政策；更重要的是提出一系列經濟體制的改革措施，著重於投資體制的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這些體制變革都與二〇〇三年以來的經濟過熱直接相關。

上述王靜對於從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五年中國政府所從事的宏觀調控發展三階段敘述，其實包含詳細數據與歷史文獻資料，在本文只點出中國政府在宏觀調控三階段的發展重點，便不再重複引用王靜的數據內容。但經過認識此一具體宏觀調控事件的發展過程，可知中國宏觀調控並不是一個各自為政的操作方式，而是多部門有共識的進行集體行動的一種動態系統。此系統不只是一種西方意義底下對於總量的調控，還包括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發展，展現出一種持續穩定與拉抬社會發展的系統機制；基本上在實際運作過程也彰顯政府運用多種手段以面對內在社會經濟矛盾並進行結構調整的意圖，服膺馬凱所提出的中國宏觀調控特殊方針的見解。

王靜在論述該次宏觀調控事件時，一個關鍵貢獻，就是透過種種詳細數據資料進行抽絲剝繭之後，發現經濟體制轉型過程才是導致中國必須進行宏觀調控的最根本因素，她形容其他發生的現象「只不過屬於點燃結構性矛盾的導火索而已」（王靜，2008：94）。這位經濟學家展現出一種社會學旨趣，亦即關鍵是中國特殊的社會結構問題。

所以，二〇〇三年前後的經濟失衡有著結構性問題，不單只是經濟總量上的景氣循環問題；那麼，從總量上判斷宏觀經濟增長狀態的一般宏觀經濟學方法就會出現失靈，中國經濟問題必須從結構方面進行考察。因此，在面對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五年中國政府宏觀調控措施時，必須關注中國改革開放後，特別是起自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的社會經濟增長轉型結構究竟為何。

（二）、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與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內在關聯

齊莫爾（Georg Simmel，1990：436）強調貨幣作為一種在交換領域客觀存在的媒介，正是由於其去除主觀價值的客觀性，而能夠不斷創造出更多人際關係間的意義聯繫。則在經濟全球化外在條件底下，欲探討中國經濟增長結構，吾人便可透過金融層面的資金流動，看出中國社會經濟元素間的相互關係，進而瞭解中國轉型模式所產生的深層結構。

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主要由三大面向組成，包括國內消費、資本投資、以及淨出口；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政府企圖平衡出口、投資、消費三個主要增長動力的原因。如圖二、〈三大需求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所示，相較另兩個經濟增長結構組成部分（投資與消費）的相對穩定，每年度淨出口對 GDP 貢獻率的短期變化則比較大，但這不能說淨出口的影響層面較小。畢竟淨出口短期變化其實與經濟結構的長期調整沒有必然聯繫（伍戈，2010）。然而中國經濟增長結構的三個部份卻相互影響，甚至與全球化有密切聯繫。

長時段而言，從西元一八二〇年到二〇〇三年，世界出口依存度從 1% 上升到 20.8%，呈現上升趨勢。劉力（2004）認為世界貿易依存度之所以不斷上升，是因為世界各國貿易增長速度始終快於生產增長速度：

「從一九六〇——二〇〇三年，世界貨物貿易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 9.9%，比世界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高 2 個百分點；同期世界貨物貿易規模擴大 57 倍，而世界經濟總量只增長 26 倍」。

因此，全球化貿易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自一九七八年後的「改革」發展，會與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的「開放」結合在一起。中國經濟增長其實源自一個逐漸發展擴大的全球化貿易結構中，否則中國不可能創造經濟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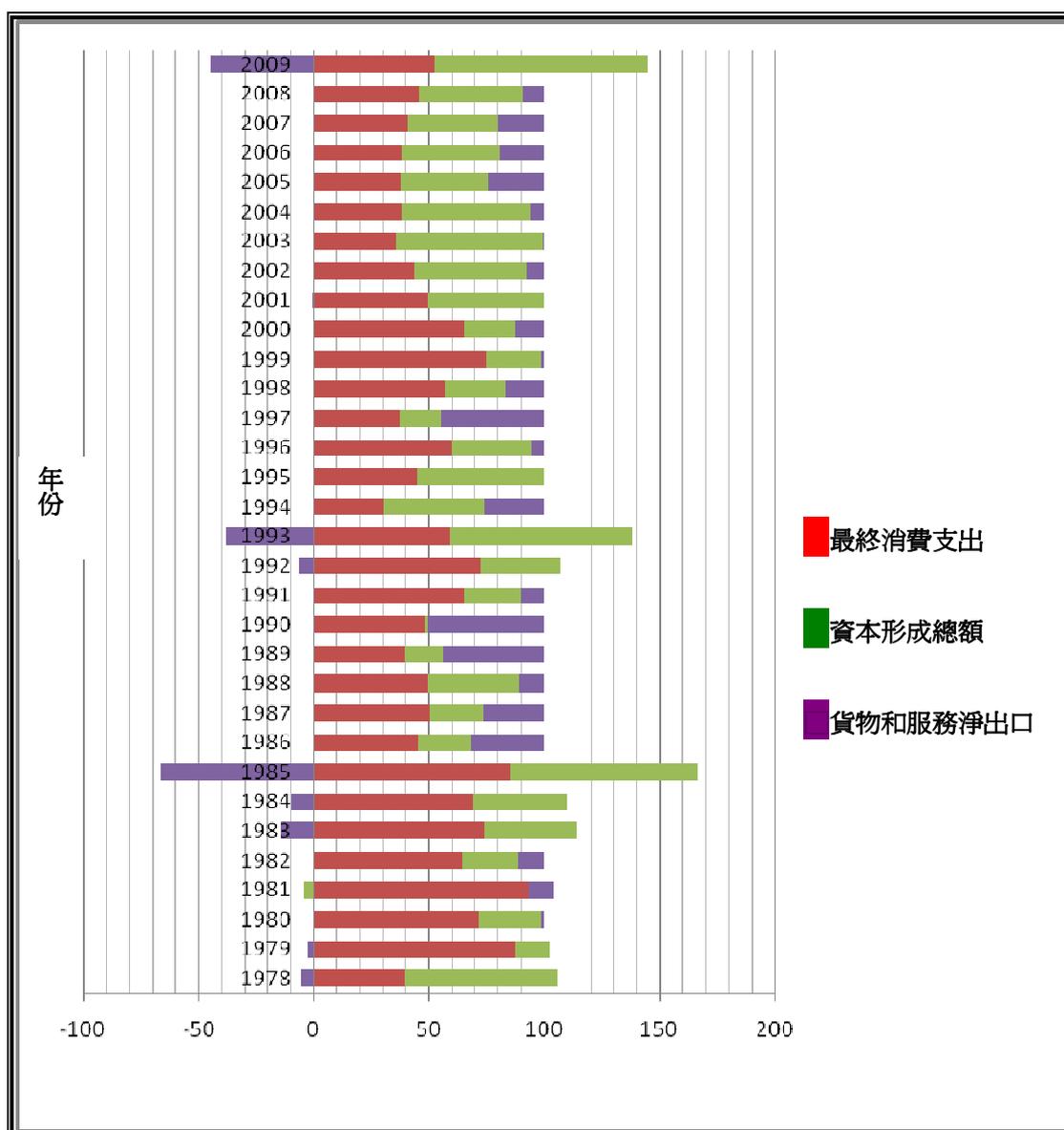


圖 2、三大需求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2009》，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註：三大需求指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大構成項目，即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淨出口。貢獻率是指三大需求增量與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增量之比。

或許無法從圖二管窺中國經濟增長結構是多麼依靠外需，但可透過「外貿依存度」加以解釋。如圖三、〈中國外貿依存度和外匯儲備情況〉所示，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一路攀升，由二〇〇一年之 43.4%、二〇〇二年之 49%、二〇〇三

年之 60.4%，於二〇〇四年更高達 70%（經濟部國貿局雙邊貿易一組，2005）。中國到現在為止仍自稱是「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依賴程度高也是無可厚非。由於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較低，國內需求有限，產品銷售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就會比較高；同時為實現現代化，也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先進技術和技術裝備，其進口依存度也自然大大提高。

所以同比二〇〇四年，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外貿依存度分別只有 23.7% 和 23.5%，這兩國家（美日）甚至低於世界平均水準（李麗，2007）。但中國倘若相比於香港及新加坡，則香港與新加坡貿易依存度均在二〇〇四年已逾 320%，台灣外貿依存度也在二〇〇四年首度突破 100% 以上（經濟部國貿局雙邊貿易一組，2005），那麼中國的 70% 似乎也不算特別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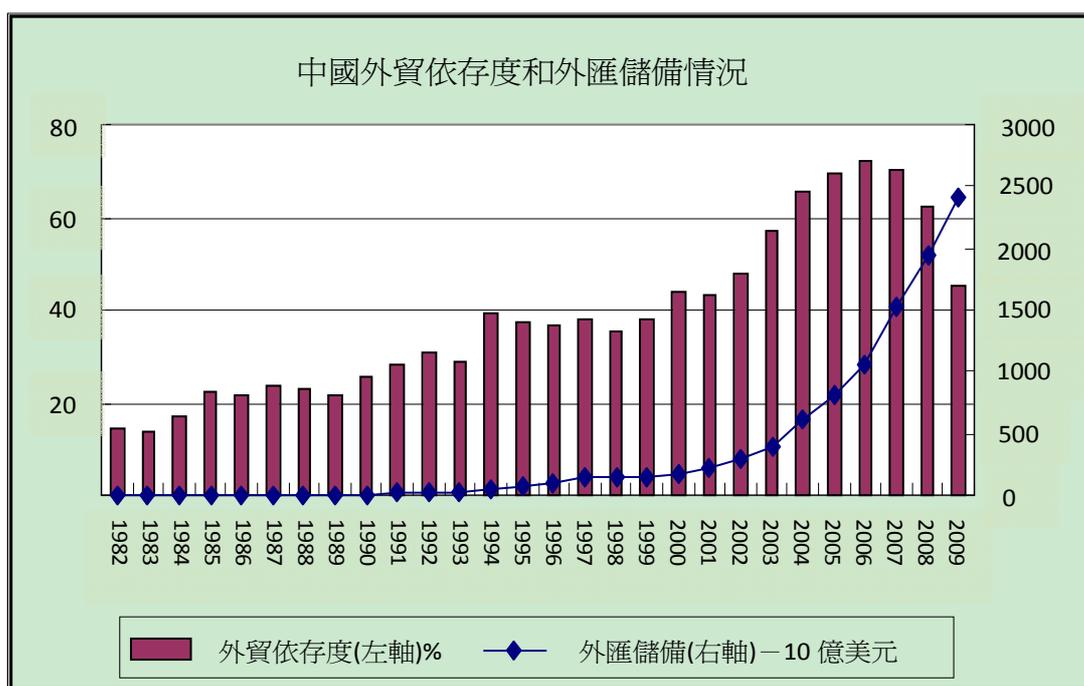


圖 3

資料來源：伍戈(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三大需求對我國(中國)GDP 增長的貢獻率問題簡析，中國統計，2010 年第三期，圖 5。

不過香港、新加坡、台灣都是內需較小的島嶼型經濟，香港與新加坡甚至扮演轉口港角色，無法與中國相比。如果與同為開發中國家、且屬大陸型經濟的印度、巴西及俄羅斯三國相比，二〇〇四年三國貿易依存度分別為 26.4%、22.8% 及 47.8%（經濟部國貿局雙邊貿易一組，2005），則中國二〇〇四年貿易依存度為 70% 就明顯高於印度、巴西、俄羅斯三國，如此便可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相對較為依賴外貿。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中國加入 WTO，開始更為受惠於全球性貿易活動，進而不斷提高貿易依存度。到二〇〇八年為止，貿易依存度都維持在 60% 以上。二〇〇八年中後期，自美國起始的金融危機開始擴散全球，全球資本主義百年趨勢跌入谷底，才使中國外貿依存度下滑，並正視內需發展的重要性。那麼首先，我們應正視：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整體貿易結構，是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主要基石。圖四則為中國 2005 年至 2009 年的進出口額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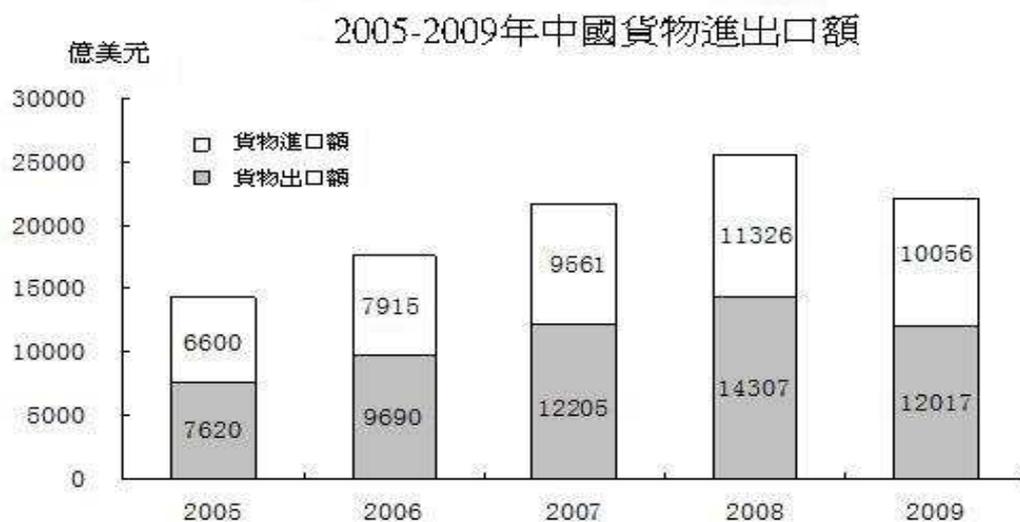


圖 4

資料來源：《200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國家統計局

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2010：61）指出各國經濟發展的催化劑無非有兩種來

源：內生型和外生型。前者主要是靠內需增加來刺激經濟增長引擎；而外生型增長模式，其發展是由外部市場需求帶動，日本、中國以及「亞洲四小龍」走的就是這條路。外生型模式的好處，就是發展初期不一定要進行大的體制改革，而且見效很快。陳志武的觀點，是將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歸因於結構條件的限制上。

該位學者把中國與俄羅斯進行比較，認為中國之所以在一九七八年後能選擇外生型模式，是由於中國自身人口、勞動力成本以及基本成型的工業基礎決定的。可是俄羅斯沒法選擇外生型增長模式。俄羅斯當時有兩億人口，一九八〇年人均 GDP 有 8,000 美元，差不多是當時中國的 20 倍。一九九〇年人均 GDP 大約是 9,000 美元，而中國在一九九〇年有 10 億人，人均 GDP 為 1,300 美元。所以，「中國可以選擇成為世界工廠，而俄羅斯則不可能，因為它沒有中國那樣的人口稟賦，勞動力成本也太高了」（陳志武，2010：62）；因此俄羅斯也就不能選擇中國漸進式的改革路徑。

陳志武的說明有幾點可以繼續延伸討論。首先，我認為他過於強調結構限制，忽略中國共產黨自身的主觀能動性。近代中國面對西方列強入侵，使得從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中國必須面對民族富強的核心目標，而走上至今仍舊持續的現代化發展過程（蕭功秦，2009：53）。在現代化發展歷程中，中國勢必要配合客觀條件變化，而進行不同政治載體的抉擇。中國共產黨便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成為中國的政治載體，以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方式進行全方位地滲透、並控制社會每一單位，進行有效地政治動員，以此實現政黨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黨的政治運作於是成為一種「全能主義」式的發展模式（蕭功秦，2009：84），而中國社會也被改造成一種典型的「總體性社會」（王立勝，2009：83）。亦即，從一九四九年至文化大革命這段時間，中國就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以共產黨的政治力強行進行社會經濟的資源分配與發展，而形成一種強大組織化的「反市場社會經濟發展模式」。這段時期，中國根本不可能從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外部結構獲益。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的反市場經濟意識形態。

但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外部客觀條件隨著主觀能動性的改變而改變。蕭功秦（2009：109）對鄧小平領導的共產黨政治載體建立一個理論概念：「後全能型的新權威主義」，強調共產黨具有巨大剛性處理問題的能力、以及強力的國家資源，並具有更強的組織動員力與應付突發事件能力，從而能維持「低政治參與下的高資本投入」式經濟發展，比起拉美型、東南亞型、南亞型權威主義，具有更強的督導能力與動員能力。而正是在高度組織化傳統下，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融入新元素，即「市場經濟」，進而加速發展中國現代化進程、與追求民族富強的進一步轉型過程。蕭功秦的說法值得肯定，畢竟不能忽略中國共產黨的主觀能動性，否則無法完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的可能性。只是，我認為在探討中國共產黨的主觀能動性時，並不是企圖說明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以何種權威體制形式來主導發展，而是應該注視共產黨所屬行動者所共享的方法論原則。

其次，陳志武單純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結構視為外生型增長模式，其論述顯得過於粗放。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餘雲輝（2009）在探討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的就業問題時，曾說：

「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國內（中國）的出口危機、外匯儲備貶值危機和房地產危機，從而把中國經濟嚴重依賴外資、外貿和房地產推動的『小國增長模式』或『港式殖民地型增長模式』拋在退潮之後的沙灘上，並陷入裸泳者的尷尬。」

雖然中國在二〇〇九年之前的歷史發展，是與日本、亞洲四小龍的外生型經濟發展模式相同，但社會主義中國仍與資本家島國的政治社會屬性有極大不同，此外人口數量都沒有中國來得巨大，於是中國所產生的後續矛盾問題，也不完全相同於資本家島國。

最後，既然要談結構，就應該談東亞本身結構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影響。陳志武卻忽略了。在冷戰時期架構下，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是與美國有著關鍵

的政治經濟共生關係，因而形成一個東亞獨特的外生型貿易出口模式，即以美國為宗主國，把美國內需市場視為標的的出口增長模式。鄰近中國的東亞出口增長模式結構所具有的優勢，相對於中國自身在改革開放起步時的弱勢，自然會成為中國的重要學習對象，以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外在良好條件。俄羅斯本身便沒有這樣的優勢與環境存在。因此長時段資本主義全球化整體貿易結構，是中國崛起的主要基石；而起自一九五〇年代長達一甲子的中程東亞經濟增長結構發展，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鋼樑。這使中國與日本、南韓、台灣等區塊的島嶼國產生更為密切的交織。特別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之後更是如此。

根據日本財政部公佈的資料，二〇一〇年一月份日本出口額同比增長 40.9%，達到三十年來最大增幅，對其主要市場亞洲的出口額同比增長 68.1%，對其最大交易夥伴中國的出口額同比增長則高達 79.9%。日本出口大增實得益於中國經濟強勁復蘇帶來的巨大需求。二〇一〇年一月，日本汽車、汽車零配件、化學品和機械對中國出口額同比增長分別為 342.8%、156.6%、107.5%和 68.8%（中國貿易促進網，2010）。

南韓中央銀行「韓國銀行」和關稅廳的數據則顯示，二〇〇九年南韓進出口貿易對中國的依賴度達 20.53%（十一年前只有 2.9%），對美國的依賴度卻僅 9.71%（十一年前是 24.2%），呈現懸殊對比。南韓對中國依賴度如此迅速上升，主要是對中國出口額的增加。十一年前南韓對中國的出口規模為 10 億美元，二〇〇九年增加到 867 億美元，在南韓的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從 1.39% 上升到 23.85%（姜遠珍，2010）；總之，二〇〇九年後，中國已成為韓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國家（文匯網，2010）。

台灣對中國的出口金額從一九九〇年的 86 億美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 358 億美元，再到二〇〇八年的 999 億美元，比重已達台灣總出口金額的 39.1%，台灣的最大出口地區是中國。根據台灣財政部分分析，二〇一〇年一月份出口到中國的金額佔出口總額的 43.9%，創下二〇〇七年十月以來最高紀錄，僅次於二〇〇

七年九月的 44.1% (美國之音, 2010)。而台灣因二〇一〇年完成與中國簽署 ECFA 所帶來的效應, 使得台灣政府主計處保守估計台灣經濟成長率最起碼有 8.24%, 是二十年來第一次可以超越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 (戴瑞芬, 2010)。凡此變化, 都足以看見以中國發展為軸心所呈現的共變現象。表三為二〇〇九年主要國家和地區貨物進出口額, 可以看出中國與日本、南韓、台灣的關係密切。

表 3、2009 年中國對主要國家和地區貨物進出口額

國家和地區	出口額(億美元)	進口額(億美元)
歐盟	2363	1278
美國	2208	774
中國香港	1662	87
東盟	1063	1067
日本	979	1309
韓國	537	1026
印度	297	137
中國臺灣	205	857
俄羅斯	175	213

資料來源：《200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國家統計局

全球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後, 世界經濟發展呈現一個既存事實: 以西方為首的發達國家整體增長速度較慢, 大約是 2%、2.2%、2.3% 左右, 但發展中國家等新興經濟體, 增長規模達到 6.5%, 甚至是 7%、8% 左右。所以全球層次經濟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發達經濟和新型經濟處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周期, 一個是在往下走, 一個是在往上走」(朱民, 2010)。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組織編寫的

《2009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中，更具體提出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經濟表現差異很大。而其中亞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二〇〇九年保持6.5%的經濟增速，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其中，中國實際GDP比上年增長8.7%；印度實際GDP比上年增長5.6%。但據IMF資料，非洲、中東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二〇〇九年實際GDP分別增長1.9%和2.2%，獨聯體、中東歐和西半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實際GDP分別下降7.5%、4.3%和2.3%。其中，俄羅斯實際GDP比二〇〇八年大幅下滑9%，巴西實際GDP略降0.4%。二〇〇九年，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著短期資本流入和資產價格上漲過快的問題，但在一些中東歐和獨聯體國家，仍遭受外部融資困難的困擾（中國人民銀行，2010）。由整個世界在二〇〇八年至二〇〇九年的變化軌跡來看，也可顯現中國所具有的強大動能。中國不只得利於全球化的貿易結構環境，更得利於全球的資金到位，取得世界資本以進行經濟增長。圖五為中國歷年實際使用外資額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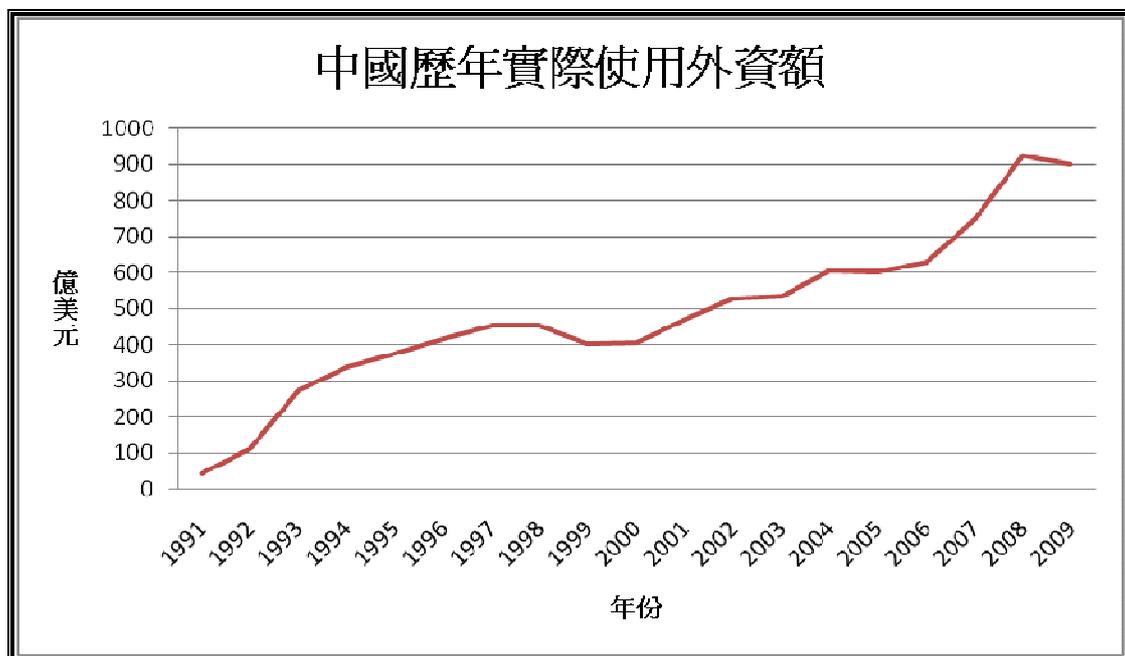


圖 5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2009》、中國商務部網站

註：本圖主要以《中國統計年鑑 2009》—〈利用外資概況表〉中的「實際使用外資」數據為主，

不包括合同利用外資額。所謂「利用外資」，是指中國各級政府、部門、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通過對外借款、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以及用其他方式籌措的境外現匯、設備、技術等。不過從 2000 年起，該表數據就不含對外借款數，遂以外商直接投資為主。2009 年外商直接投資數據取自中國商務部網站。

從圖五可發現，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分三個區段。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九年為第一段發展期，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六年又為另一段發展期，到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又呈現另一波走勢，直到二〇〇九年出現轉折。本文已論述淨出口對歷史上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如果再以二〇〇四年的數據來看，亦可見外資的重大影響：中國大陸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 606 億美元，其中約有 70% 投入製造業領域；全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 3,386 億美元，占出口總額比重達 57.1%，進口 3,246 億美元，占進口總額比重達 57.8%。則透過二〇〇四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結構中的「淨出口」與「資本形成」成為互相輔助的犄角，其中又以外資扮演至為關鍵角色。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六年間，中國 GDP 的年均增長率達到 10%。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速度超過總的經濟增長速度。外貿總額從二〇〇一年的 5,096.5 億美元增加到二〇〇六年的 17,604 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 28.2%。毫無疑問，中國經濟已經從入世（WTO）中獲益，「特別是從一個更加開放和自由化的國際貿易和 FDI 體系中獲益」（陳春來，2007：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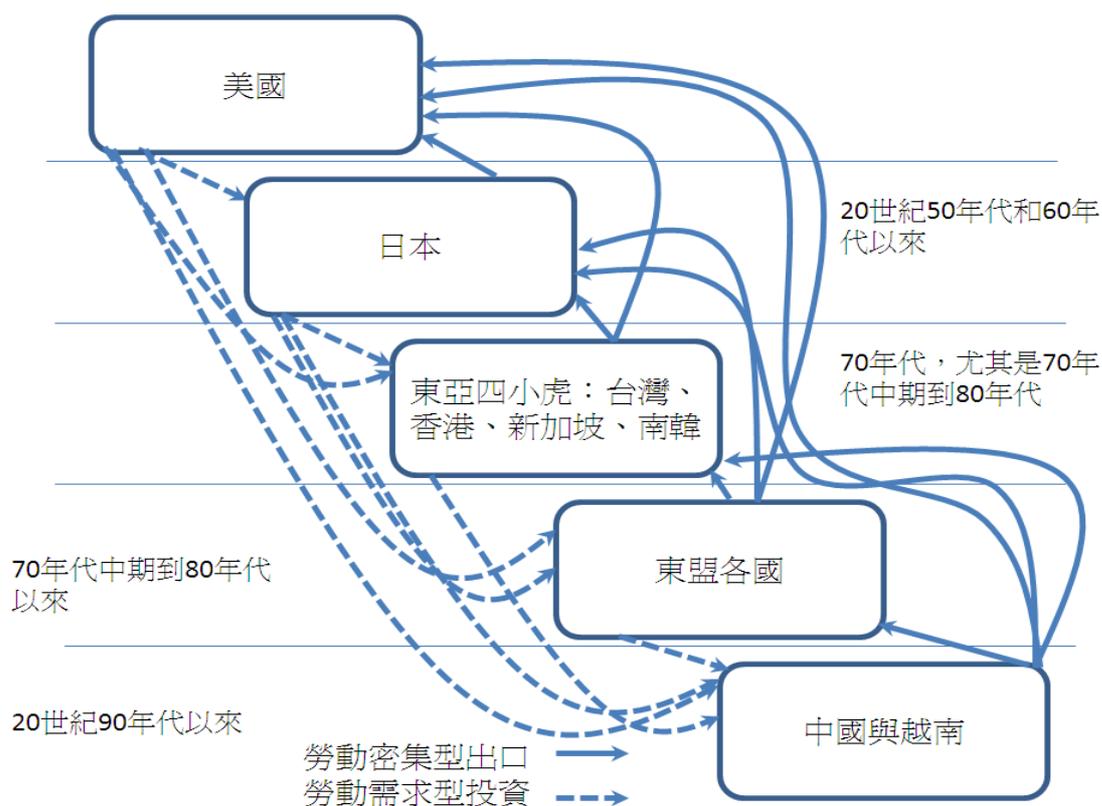


圖 6 東亞崛起中的滾雪球效應

資料來源：Giovanni Arrighi、Mark Selden 等學者（2006：386）¹³

若將歷史視角延伸為一甲子，則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實則攀附東亞崛起所產生的滾雪球效應（如圖六所示）。即一種勞動力帶動投資從高收入向低收入地區流動的階段發展，以及勞動密集型出口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的流動階段發展趨勢。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馬克·賽爾登（Mark Selden）、許寶強、孫誥烽等學者（2006：387）認為：

「在這個地區性的流動空間中，勞動力帶動的投資需求使得低收入地區更廉價、更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成為高收入地區降低生活和消費成本的『制動器』，同時由於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收入地區的出口，導致後者購買力更強、更加龐大的

¹³ Giovanni Arrighi、Mark Selden、許寶強、孫誥烽等學者在〈資本主義的歷史：東方和西方〉一文中，引用小澤智輝（1993：143）的圖示，本文則重新繪製。

市場需求帶動了前者產品價格的提升」。

這些學者突顯出如何看待「資本流動」的問題。他們不只關注資本流動的來去方向，而是關注資本流動與勞動力轉移的相互關係。同時彰顯東亞外生型出口模式的特殊動態結構，即勞動力帶動投資的轉移模式。這樣一種特殊的外生型出口模式，既有延續性，也產生進一步變化。最核心的議題是，這樣一種外生型出口模式經過六十年發展，在遇到中國特殊社會結構之後產生出成熟的矛盾激化，會在本文後續論及。目前應只談資本流動部份。

至二〇〇一年，中國 FDI 絕大多數來自發展中國家，大約占 FDI 累計總量的 73.8%，而來自發達國家的僅占 26.2%。從單個投資地來看，主要有四大投資地區：香港、美國、日本和台灣，分別占到累計 FDI 總量的 48%、8.7%、8.2%和 7.3%。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五年，來自三個避稅樂園經濟體—維爾京、開曼和西薩摩亞群島的 FDI 大幅上升，主要是香港和台灣的「過境」投資繞道這些島國，以降低或者取消納稅。這表明實際來自香港和台灣的 FDI 要高於官方統計數據。總之，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 FDI 增幅大大高於已工業化國家（陳春來，2007：170）。圖七則顯示二〇〇九年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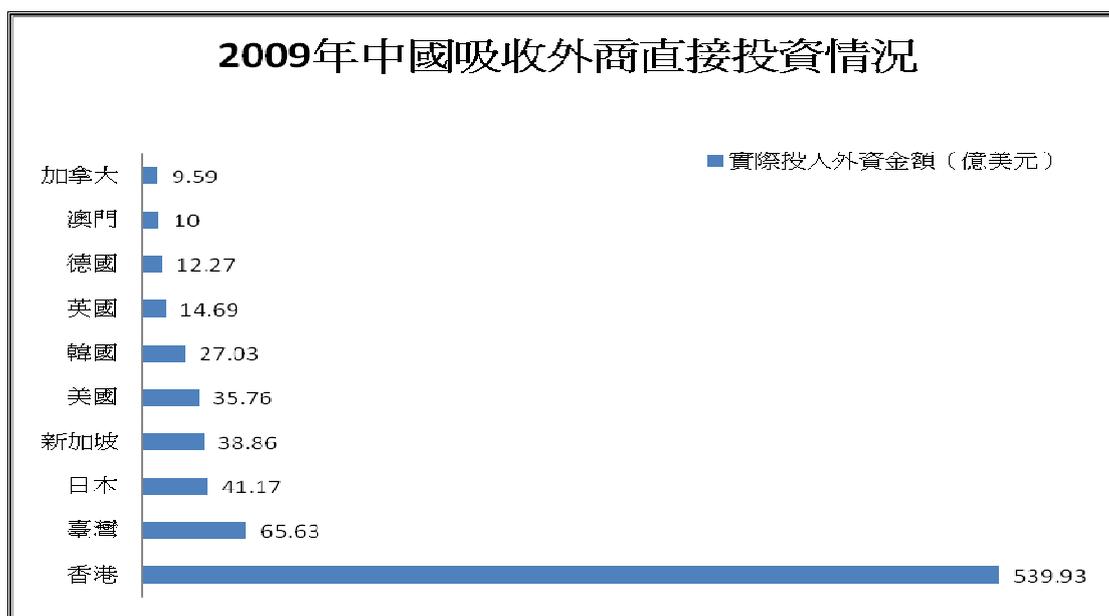


圖 7¹⁴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網站

從二〇〇〇年之後的數據觀之，東盟各國對中國的資金流動似乎沒有如同圖六顯示的這樣具有重要性，儘管美國仍是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重要成員，但是台灣、香港、日本、南韓等地與中國的關係則更為密切。二十一世紀初的發展態勢已經不太如同圖六的層級化資金流動圖像，而是類似同心圓似的圍繞東亞核心（中國）的一種資金流動圖像。中國於是形成將外資與出口緊密扣連的經濟增長結構。陸暘（2010）在探討 FDI 與污染之間的關聯時，便分別對中國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全部企業除去外資企業）中每類行業的「工業出口交貨值／工業銷售產值」進行計算，發現外資企業的這一指標普遍大於國內企業，於是可以看出中國 FDI 與出口導向之間的聯繫。

這樣的經濟增長結構，促使中國社會內部的生產與消費分離。從一九九二年

¹⁴ 前十位國家／地區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 88.3%。上述國家／地區對華投資資料包括這些國家／地區通過維爾京、開曼群島、薩摩亞、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對華進行的投資。

開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高速成長，但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八年間中國內部消費成長的速度基本和過去相同，只大約維持年均成長 7% 左右（林義夫，2009：309）。如圖二所示，最終消費成爲中國經濟增長穩定結構中的一部分，是因爲最終消費體的量本來就很大（13 億人口），而且穩定成長，但中國整體經濟增長結構直到二〇〇八年爲止，仍是以出口導向爲主。吾人或許可以稱這種起自九〇年代從東亞學習而來的中國經濟增長結構，那種重視外資與出口互動並利用低廉勞動力、抑制內需消費的經濟增長結構，稱爲「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

自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七年，全球 FDI 始終保持較快增長態勢，二〇〇七年達到歷史高點的 19,790 億美元。二〇〇八年全球 FDI 下降 14% 至歷史次高點的 16,970 億美元。至二〇〇九年，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佈《2009 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的推估，全球 FDI 流入將下降至略高於 1 兆美元的水準（中國人民銀行，2010）。從表四〈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 FDI 流入〉可得知，全球在經歷金融危機後，FDI 流入均普遍下降，但以中國下降的幅度最低，仍持續吸引全球 FDI 的流入。

表 4¹⁵

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 FDI 流入			
地區/經濟體	2008 (10 億美元)	2009 (10 億美元)	增長率 (%)
世界	1697.4	1040.3	-38.7
發達經濟體	962.3	565.5	-41.2
歐盟	503.5	356.7	-29.2
美國	316.1	135.9	-57
日本	24.4	11.4	-53.4
發展中經濟體	620.7	405.5	-34.7
巴西	45.1	22.8	-49.5
中國	92.4	90	-2.6
印度	41.6	33.6	-19
東南歐和獨聯體	114.4	69.3	-39.4
俄羅斯	70.3	41.4	-41.1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發佈《2009 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

由於中國在執行改革開放過程後，特別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必須與全球市場接軌，因此在探討中國經濟增長結構時，必須以全球化視野角度來進行詮釋與理解。而在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的背景認識之下，也才能進一步詮釋中國的宏觀調控系統。

王靜（2008：107、111、113）指出，從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一九九二年中十四大報告之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總體格局

¹⁵ 2009 年是估計數。

未變的態勢下進行，基本上屬於「體制外市場化階段」；但從一九九二年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目標和框架以後，從一九九二年到二〇〇一年期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開，使得現代化發展下的政府控制方式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轉變，亦即政府退出微觀領域，並朝宏觀調控方向邁進。然後直到二〇〇二年，一個屬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動力系統搭建工作方才有了基本雛型。因此，我認為中國政府從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因應全球化貿易體系而逐步發展開來的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與二十一世紀初期逐步建立起的宏觀調控系統，有著重要的關聯性。

王靜（2008：116、123）認為中國宏觀調控是因為要處理經濟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諸如市場結構發展不均衡、¹⁶城鄉差別、地區市場化程度差異等等結構性因素；這些結構性因素，其實都來自我所強調的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所造成的結果。吾人可透過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的分佈，看出一些端倪。

中國 FDI 的地區分佈，實際上非常不平衡。進入中國的 FDI 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差異不斷拉大。截至二〇〇一年底，東部地區吸引中國 FDI 總量的 87.8%，而中西部地區分別為 9%和 3.3%。中國加入 WTO 後，FDI 流入繼續集中在東部地區。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四年間增長迅猛，從 398 億美元增加到 480 億美元。（陳春來，2007）

根據二〇〇八年、二〇〇九年各省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統計製成圖八。之所以採用此兩年相關數據，乃是為關注全球金融危機前後之間的差異。中國政府早在一九九八年便提出西部開發戰略（陳春來，2007），但透過圖八可以顯見，中國東部與中西部的開發差異仍然偏大。但二〇〇九年，四川、重慶一帶的外商直接投資擴增較快，也可顯見金融危機後，中國要開發中西部的壓力。總之，中國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在長達三十年發展過程中，促使中國地

¹⁶例如勞動力市場化程度高於土地市場化。

區經濟增長發展被硬生生切成兩半，促成東部與中西部發展上的內在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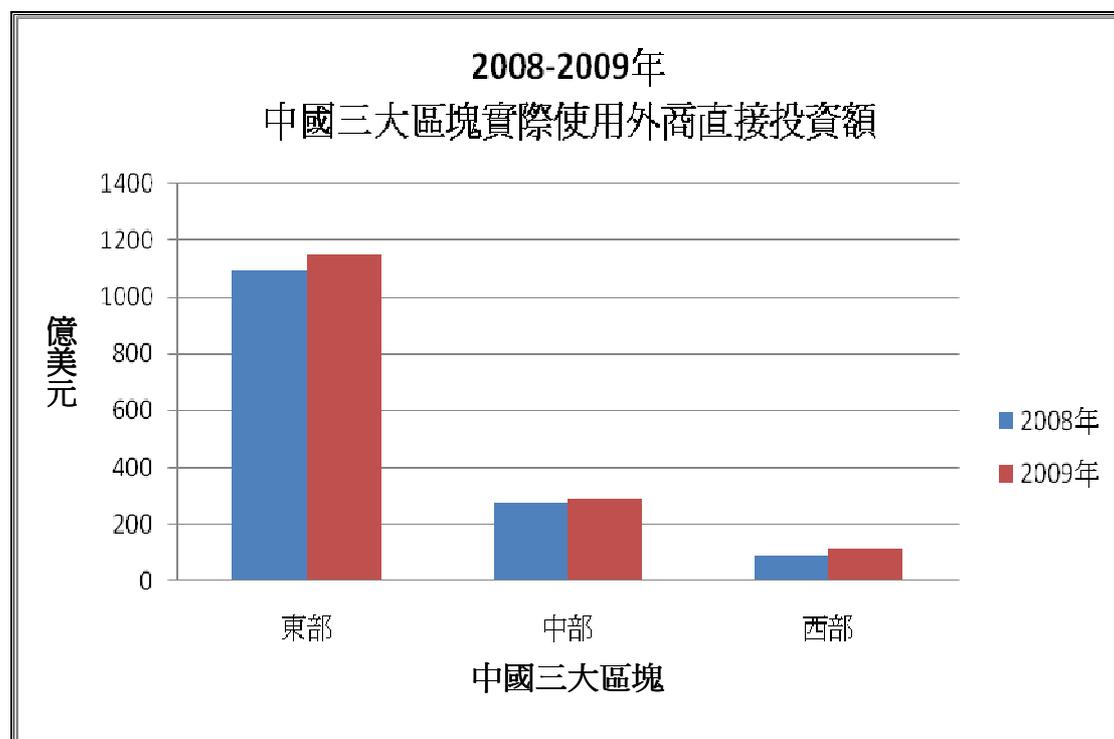


圖 8

資料來源：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年中國各省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一些學者以「一體化」概念試圖說明中國地區間的不平等，如 Jane Golley 以及 Nicolass Groenewold (2007: 151) 便強調，中國與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進展很快，然而中國地區之間的一體化進展卻十分緩慢；於是中國沿海地區與全球經濟的一體化，與內地進展緩慢的一體化便可加以對照。這是中國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所造成的內部矛盾。

透過 Jane Golley 以及 Nicolass Groenewold 的實證研究可知 (2007: 159)，中國核心工業地區具有傳導、輻射作用，使得較發達地區更為發達且互為影響，進而造成開放程度高的發達地區與封閉的欠發達地區。「這不是國家穩定、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一個最佳安排，最為關鍵的是，這不利於政權的穩固」，這兩位學者點出一個關鍵議題，即對於中國政權合法性的威脅。

透過圖六描述，可知東亞外向型出口生產體系不只造成資金由上游往下遊移動，更會造成勞動力移轉；這樣的演變過程轉變到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時，便造成一種呈現同心圓擴散式的資金移動，亦即都往核心中國跑，然後再進而造成中國內部勞動力從中西部往東部移動的遷移過程。

本來中國早期發展一定會面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因此將貿易擴張與中國有利的人口結構聯繫在一起，也無可厚非。然而中國移動的勞動力卻有著東亞島嶼國所沒有的制度所束縛：戶籍制度。

就中國改革開放之前而言，戶籍制度的誕生是為糧食統購統銷制度服務。這兩個制度均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下的產物，是配合中國內部結構與當時國際情勢，運用強力政治手段直接介入經濟發展的產物。它們讓中國在抗美援朝的國際局勢下，讓毛澤東聲稱的第三世界中國，這個經濟落後、資金基礎薄弱的中國，完成工業化原始資金積累，建立工業基礎和工業體系；並由國家對全社會實行管理，保持城市、農村的相對穩定，從而實現國家政治穩定（傅宏波，2005）。

因此戶籍制度是社會主義的產物，並因此建立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一九八四年後，戶籍制度開始有條件放寬，中國持續近三十年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歷史宣告結束，並開始第一波勞動力轉移（王立勝，2009：89）。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一年間，轉移約 1.3 億農村勞動力，在鄉鎮企業就業超過 0.8 億人。此時期，農村勞動力轉移特點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當時農民多選擇在迅速發展的鄉鎮企業就業（韓俊、崔傳義、秦中春，2009）。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迅速增長，造成第二波勞動力轉移。一九九二年起，中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數量開始絕對下降（王立勝，2009：89）。一九九二年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已達 3,500 多萬人，而一九九三年開始又進入一個飛速發展時期，該年外出農村勞動力估計在 500 萬至 600 萬人。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間，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 4,122 萬，平均每年 824 萬，轉移勞動力總量平均每年增長 7.9%（劉懷廉，2004：47-48）。農民進城務工勢

頭越來越猛，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呈現「離土又離鄉」態勢，又配合中國對外開放擴大，出口貿易快速增長，加上大部分出口企業是勞動密集型，需要大量低成本勞動力，對農民工產生巨大需求（韓俊、崔傳義、秦中春，2009）。

第二波大規模勞動力轉移，是在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成型之時，造成中西部農民大規模轉移東部城市的現象。然而由於戶籍制度仍然存在，且中國戶籍制度又與社會保障緊密相連，使得移轉至東部的中西部農民並未受益，反而在戶籍制度影響下，勞動工資遭受壓低，並抑制遷移勞動力的消費成長，於是造成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得以持續，並促成此一結構的優勢性、以及在全球製造分工上具有國際競爭力。

那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起自全球化下的東亞資本主義出口導向生產體系，轉型成中國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然後再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傳統的二元社會結構，進而形成具中國特色的、轉型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

中國是以這樣的態勢，面對資本主義百年危機的到來（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外部資金流動的當下，還包括內部低成本勞動力供給，中國二元社會結構顯然提供最大、最穩定的勞動力供給：農民工。此雜交過程，產生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機制與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混合，而促使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2009）以一種「低人權優勢」概念來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態勢，並強調無法以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加以解釋（如無法以交易成本理論來解釋）。

秦暉（2009）又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奇蹟，正是因為「低人權優勢」而造成，並且進一步促成全世界的社會矛盾與動亂。我認為這種說法其實忽略原先資本主義的全球性發展，本就會對世界各區域造成政治、經濟、社會的騷亂（Giovanni Arrighi, 2007: 94）。如同布勞岱爾（2000, 2: 195）強調，資本主義發展就是為了資本再生產，這使得資本主義會找尋對它最有利的地方，進而結合該地區的生產，這也就是中國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會與中國傳統二元社會結構相結

合的外部原因，也就是戶籍制度能屹立不搖的外部條件，進而直到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才對中國這樣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一次撞擊，讓中國政府不得不進行進一步的試點改革。

由於農民工缺少政府保障，因此其就業與工資主要由市場決定。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以來，農民工已經成爲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勞動力流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地區之間勞動力流動則反映一個事實，即農民工對於市場信號是敏感的，農民工最集中的地區往往是增長速度很快和勞動力需求很旺盛的地區，因此蔡昉、都陽、以及趙長保等研究者（2007：125）便從農民工工資趨同分析表明：「中國勞動力市場確實在向一體化邁進」。然而應強調，這種逐漸的一體化，卻奠基於中國的不平等社會結構。則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促成一種只具「臨時性的勞動力遷移」，並維持與擴大內部社會結構的二元對立矛盾。諾大中國，開始製造內在分裂，即區域差距與城鄉差距的關鍵內在矛盾。

那麼王靜所提出中國宏觀調控管理系統必須面對的結構性因素，其實就是源自於以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與二元社會結構所共譜而成的中國特殊社會經濟結構所產生的影響，這使得區域差距與城鄉差距的內在矛盾顯現，同時也使得勞動力市場化程度高於土地市場化，因爲中國不斷顯現臨時性的勞動力遷移，但是土地進入市場環節卻沒有實行市場化，而是實行嚴格的行政式徵地管理制度，其管理重點就是實行嚴格土地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畢竟不要忘記，即便中共已經放棄過去的一些社會主義教條，但以辯證唯物論作爲方法論引導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容易在忽視中國特殊的社會經濟結構背景下，以爲中國的經濟波動節奏表象其實如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經濟節奏一般，只是單純的出現通貨緊縮與經濟過熱的交替循環。比方有效需求不足也會在中國出現，但主要是城鄉、區域差距的特殊社會結構所造成的問題，這往往需要國家長期社會經濟發展計畫來加以變革。中國已經建立一種以五年爲基準的長期社會經濟發展計畫與實驗系統，我稱

之為：「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

其次，中國出現的經濟過熱也有特殊原因，由於中國必須產生相應拉抬社會的動力系統，以持續促進經濟增長結構的發展與轉變，這使得相應的動力機制也會促成經濟過熱的經濟循環。比方混合所有制所造成的結果：「二〇〇三年前後的經濟過熱是由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企業共同推動的，其中港澳台及外商投資企業、股份制企業的推動作用尤其明顯」（王靜，2008：133）；但是中國純粹國有經濟投資額雖然占全社會投資額比重逐年下降，不過國有控股企業仍極為強勢，他們可以利用各種資源優勢較為方便地獲得土地與貸款，進而形成過度投資所造成的經濟過熱現象（王靜，2008：135）。這種推動微觀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我稱之為：「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

再來，一九九四年以來對中央和地方分權化所進行的「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一方面作為企業投資旺盛的推動者，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通過地方公共建設項目的投資成為投資行為主體（王靜：2008：136），這也促成中國特殊的經濟過熱現象的主要原因。這種推動地方政府產生發展動力的系統，我稱之為：「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

因此我認為「宏觀調控管理系統」是作為一個主要的核心系統，它分別聯繫「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以及「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所帶來經濟發展的同時所產生的內在矛盾；並且也要配合國家對於未來的整體社會經濟建設計畫，亦即配合「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的運作。這四個系統統合成為一個拉抬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系統：「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

那麼以二〇〇二年中國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那時起，以「宏觀調控管理系統」作為最後整合的系統的那一刻起，便使得中國一黨專政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與特殊的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種內在關聯性，而這個內在關聯性就在於前文一直強調的方法論導引，亦即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所促成的內在關聯性，一種真正始終存在於中國傳統社會主義的運作邏輯。

若是將中國政府主觀能動性的面向加入一併討論，亦即將前文對中共內部在辯證唯物層次上的論理過程加入進來，那麼共產黨在提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文開始，以及對應於實踐上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富有起來開始，就已經在依照方法論的導引，逐步依照本身的內在矛盾與外在條件，產生改革開放時期的特殊社會經濟結構！

可以說，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與社會二元結構結合的中國特殊社會經濟結構，本身就是方法論導引下的宏觀產物，本身就是一種辯證的內在矛盾顯現，而相對應結構的動力發展與管控系統，其延伸而出的制度間聯繫，就是我所謂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

中國從一九七八年從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發展，歷經十餘年至一九九二年為止，開始形成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在此同時，相應屬於政治經濟層面、拉抬整體社會發展動力的系統也開始逐步形成。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官方文件，正是一個關鍵的佐證。該文於第四部份開頭標題就是：「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我們可以著重在該文第四部份第十七條提及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

「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宏觀調控主要採取經濟辦法，近期要在財稅、金融、投資和計畫體制的改革方面邁出重大步伐，建立計畫、金融、財政之間相互配合和制約的機制，加強對經濟運行的綜合協調。計畫提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以及需要配套實施的經濟政策；中央銀行以穩定幣值為首要目標，調節貨幣供應總量，並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財政運用預算和稅收手段，著重調節經濟結構和社會分配。運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並與產業政策相配合，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可以發現中國宏觀調控的意義並不是西方宏觀調控所強調的只是經濟總量的調節；反之，是針對總體政治經濟發展所企圖建立的一個動力發展系統，以面對中國當時已發展出的特殊社會經濟轉型結構。蕭功秦指出（2009：6）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暗合演化經濟學的理论解釋，因此他認為中國政治轉型採取的路徑也暗合政治演化理論揭示的試錯路徑與邏輯；我認為這只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一部份；又或是黃宗智（2005）所謂的實踐認識論，那種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踐的不斷循環過程，其實也只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一個部份。而且兩位學者對於中國轉型發展的方法論描述也僅只於此，他們並未指出中國社會主義的傳統與當今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在連結，同時也未表明中國當今的結構與相應的系統是方法論引導下所對應的主體、也是其引導下的歷史發展結果、一個具體化圖像。本文就是將方法論層次與社會經濟結構、以及制度聯繫的系統做出連結，並進行初步探索。

容再做說明的是，若只單純著眼於中國「宏觀調控管理系統」此一系統的發展而言，也顯現辯證唯物論範式對該系統的影響。王靜（2008，196）提及當中國引入市場經濟後，中國政府干預宏觀經濟會產生兩個基本原則，一個是「市場法則」，另一個是「必要法則」。所謂市場法則應該很容易理解，就是政府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應該注意那些因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所導致的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亦即從總量進行管理與調節。關鍵是她所提的「必要法則」，王靜（2008，196）說明：

「市場經濟下調節宏觀經濟必須遵循的第二個重要原則是『必要法則』：任何經濟理論或制度從來都不是在真空或恆定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而總是在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環境中，它必須首先直面於當時社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和基本矛盾，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理論就是在對這些問題或矛盾的規律性進行把握的基礎上產生的。」

這位經濟學家根據中國宏觀調控事實發展狀況所總結出的經濟學理論，一種她所稱爲的「必要法則」，若擺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之下進行探討，將發現她所提的理論概念確實點出中國宏觀調控的特殊性，但並沒有什麼新意。因爲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導引下，是極爲重視政府作爲主體的思維能動性必須與外在客觀社會條件的限制進行持續性的辯證過程，同時要一再地關注社會運動中所產生的內在矛盾；亦即，在面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與轉型時，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往往是隱藏在實體操作工具與技術背後的那隻看不見的手。

以下，將以方法論導引作爲內在連結性說明，對「公有制爲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與「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做出說明。

二、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

（一）、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分稅制改革的歷史脈絡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初，中國中央政府財政陷入危機，趙憶甯（2003）指出，由於財政收入占 GDP 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狀態。如果中央財力薄弱，各項建設資金都將嚴重缺乏。這可以從一些重要數據資料發現其嚴重性。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〇年期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率爲 9.5%，經濟高速增長卻沒有帶動國家財力同步增長；當時政府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由一九七八年的 31%，下降到一九九二年的 14%，中央財政收入下降許多（趙憶甯，2003）。這是怎樣的一個時空背景所造成？

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首先呈現一種包幹體制。從一九八〇年起，原先由中央統一決定的「統收統支」財政體制發生改變，開始實行「劃分

收支、分級包幹」的「財政承包制」。原則上就是劃分中央與地方收入和支出的範圍，然後按照各省情況確定上交中央比例或接受中央定額補助比例。如果地方政府超額完成計畫、或是有預算外自籌增加的收入，可以自行使用財政盈餘，無須上報中央批准，於是促使地方產生改革發展的積極性（陳華昇，2009）。透過陳華昇（2009）的說明，可知道中國中央與地方的緊張關係，是一種相對量上的比較所產生的後果。當實施財政包幹制長達十餘年後，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都在絕對量上產生成長，不過各級地方政府總收入增加比例，卻大幅超過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所增加的量。亦即，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在相對量（收入比例）上不斷萎縮。

以廣東為例，將會呈現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的前期正逐漸呈現「強地方」態勢。在財政包幹體制下，加上八〇年代配合中共推動「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又特別給與廣東（以及福建）優惠於其他地方的財政政策，並且放鬆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控制，使包括廣東等沿海各省大力加強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工作，以促使廣東努力發展外向型經濟，但同時也鼓勵東南沿海地區的地方主義（陳華昇，2009）。

從中國大陸自給自足的十一個省份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三年的經濟成長率來看，廣東省經濟成長率平均高達 21.32%，全國排名第二；一九七九年的 GDP 排名全國第六；一九九三年躍居第一，是經濟和財政情況甚佳的省份。一個經濟與財政情況最佳的省份，卻無須負擔太多上繳中央稅收的任務。相對而言，江蘇、浙江等上繳任務雖屬合理，但負擔遠超過廣東、福建（陳華昇，2009）。這裡表明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地方的一種競爭發展的不公平性。

繼續以廣東作為最鮮明的例子，可顯現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沿海地區各省自主性因為政經實力增強而逐漸提高，形成「弱幹強枝」的中央與地方緊張局面。我認為這樣緊張局面的由來，跟中國以辯證唯物論範式所進行方法論導引下的理論與實踐循環過程有關。高新指出（1999：224- 225），當時中共中央強調讓一部

分人富有起來的發展策略，所對應而生的特殊財政政策，使廣東被賦與重大經濟特權，因而造成沿海地區和內陸區域差距擴大。本文已在第四章說明所謂讓一部分人富有起來所具有的辯證唯物論範式的背景。於是，在理論與實踐的循環過程中，進一步產生激化內在矛盾的社會運動，促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建立一個拉抬整體社會經濟的動力發展系統（就是這裡談及的分稅制），以促成社會進一步發展與促成新的內在矛盾社會運動的產生。

在財政包幹體制下，中國各地方呈現不公平競爭、國家財力分散、而且中央財政收入無法滿足財政支出需要，並且弱化中央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同時也造成中央財政無法從富裕省、市汲取資源，建設貧窮省、區（陳華昇，2009）。那麼，進一步建立動力系統的時刻即將來臨。我認為，在改革開放時期進行的中國現代化發展，特別是九〇年代初逐漸發展形成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結構之後，使得傳統中國社會為之一變，於是導致其相應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於二〇〇二年逐漸初步成形，其中分稅制度的建立，就扮演重要角色，並促成制度間聯繫所產生的綜效。

在分稅制改革前，所謂財政包幹體制，並非是一個全國統一的體制。當時全中國財政體制大體上分為收入遞增包幹、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幹、定額上解、定額補助、另外還有五五分成的分稅制試點（趙憶甯，2003）。這種狀況，便是因為要強調重視地方政府的動力發展，於是導致財政體制紛亂的現象。同時，一旦社會主義傳統國家要接受與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面對市場上總量調節的問題，同時也必須面對結構調整的問題。在市場經濟發展情況下，無法使用過去那種全能式控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使得國家在進行總量與結構調整與發展時，必須擁有足夠的資本以面對改革開放的經濟戰爭，亦即中央政府必須擁有發展的資本以進行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本錢，那如何打仗？因此在面對上述種種的不利情況，包幹制必須去除，分稅制也勢在必行。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報告，提到要「在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範圍的前提下實行分稅制」(劉仲藜，2008)。一九八九年江澤民上台後不久，即意識到廣東等沿海地區所享有的政策優惠導致東西部差距拉大，可能危及中國大陸社會穩定(陳華昇，2009)。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後，分稅制被再次提出。一九九二年黨的十四大報告遂提出「要逐步實行稅利分流和分稅制」，同年以天津等九個地區進行分稅制試點(趙憶甯，2003)。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官方文件，在第四部份第十八條將分稅制改革納入宏觀調控體系必須建立的一項關鍵性制度變革。一九九四年中國開始實行分稅財政體制(李愛鴿，2009：40)。

從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全中國中央財政收入每年增加將近1,000億人民幣。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二年，中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5%，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一九九三年的12.6%，提高到二〇〇二年的18.5%；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5%，比改革前的一九九三年提高33個百分點；二〇〇二年除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外，中央性地方轉移支付高達4,019億元人民幣，是一九九五年的8.6倍，年均增長36%(趙憶甯，2003)。因此，二〇〇二年成爲一個標誌，當中共中央政府擁有較爲充裕的發展資本後，便促使宏觀調控系統的發展成爲可能！並開始一再增強其運用能力！

中國分稅制改革必須同時兼顧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其中增值稅的收入劃分是分稅制改革的關鍵內容。有三個理由：第一，增值稅是稅制改革後最大的稅種，占整個稅收比重的43.7%，占流轉稅的75%；第二，增值稅是穩定稅種，所以要拿到中央；第三，在中央與地方形成分稅制之前，僅流轉稅就有幾百個，十幾種稅率，因此必須調整。分稅制改革最終確定中央與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分享增長增值稅(趙憶甯，2003)。

此外，針對增值稅還有定下係數，以激勵地方的積極性。首先，以一個基期

年為基點，將上繳中央的 $\frac{3}{4}$ 地方稅收全部返還給地方；其次，在下一年給定一個返還地方的係數。以朱鎔基為首所進行的分稅制改革，最後確定增值稅反還地方的係數為 $1:0.3$ 。即在 $1:0.3$ 係數中，中央拿增量的 0.7 係數，地方拿增量的 0.3 係數，形成分稅制上繳的模型；如此能提高中央財力要求，並兼顧地方的積極性（趙憶甯，2003）。隨著分稅制建立時間越長，地方拿的越少，按照公式計算，最後將趨於無限小，但永遠不相交。分稅制實施十年後，地方已經拿不到 $1:0.3$ ，大概只有 0.1 左右（趙憶甯，2003）。

分稅制改革過後，形成一個以中共中央整體宏觀調控為主、又能促使地方政府持續展現發展動力的「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作為總體「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系統之一，並體現出具體意義。

（二）、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的意義

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導引下，所謂讓一部分人富有起來的發展理論戰略，使得在實踐過程中產生中央與地方主體權力不對等的內在矛盾現象，接著使中共中央必須基於實踐過程的內在矛盾而做出政治文本的修改與制度性變革，進而促使中央財力集中，再次展現中央主體性，而達成在一黨專政下的理論與實踐循環過程，並促使歷史經驗產生為我（中央政府）所用的正向發展，這使得地方發展的動力能持續受到中央政府的管控與調節，讓中國社會主義在引入市場經濟體制後，能鞏固既有社會主義的強國家、強中央發展態勢，鞏固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亦即讓中央政府有關鍵力量持續堅持基本社會主義制度，也才能進一步介入包含社會經濟的總體生產資料社會化過程，亦即透過掌握發展資本以控制與掌握市場經濟發展，使得市場經濟成為手段，而不是目的。

分稅制基本上是現代化國家使用的一套財政制度，但如果從中國分稅制的改革過程，特別是增值稅的改革過程來看，的確如趙憶甯（2003）所強調，具有中

國國情特點。如果再將其擺入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戰略、及其相應經濟增長結構來看，並以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導引角度來進行詮釋，則更能體現分稅制的重要意義，它代表中國一黨專政方法論導引的一個具體化制度變革，以及展現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具有的系統動力。

熊文釗（2005，24）指出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同時也是表現中央與地方實際權力的關係。中國分稅制改革後，形成強中央，方能促成以龐大稅收為基數所進行的地區間差距的調節、亦即區域間內在矛盾的調節。中共一黨專政能憑藉此一動力系統，持續掌握與關注社會內在矛盾運動；進而不僅維持各地方政府的發展動力，同時又能維持中央政府的引導性，顯現中共中央與地方的辯證唯物論範式的辯證關係。

王紹光、胡鞍鋼（1992：6-7）則指出早先實行的財政包幹制度，使中央財政收入偏低，以致中央政府無法滿足財政支出需要，弱化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及其對社會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在分稅制度建立之後，開始強化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以及對社會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陳華昇，2009）。因此，這也說明「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與「宏觀調控管理系統」兩個系統之間有著明顯的橫向聯繫作用，而且能發揮綜效，加大中共中央對總體社會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中央政府轉變成以宏觀調控措施作為導引地方政府發展的基礎，也使得「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圖像更為鮮明起來。不過，還需要再針對另外兩個系統加以討論。

最後還需提及的是，由於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嚴重，一些內地學者便紛紛將矛頭指向分稅制是一個錯誤的制度建立。中國地方債的規模到底有多大？中國國家審計署聲稱，地方政府性債務總額約為 10.7 萬億元（約合 1.65 萬億美元）。這相當於二〇一〇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27%、財政收入的 1.3 倍，而且 80%來自銀行貸款；而穆迪則是以中國央行二〇一〇年末人民幣貸款餘額 47.92 萬億元人民幣的 30%，計算出其規模上限在 14.4 萬億元人民幣左右，並得

出中國低估約 3.5 萬億元人民幣地方債務規模的結論（張茉楠，2011）。不管確切的數字究竟如何，一些學者強調中國地方政府長期面對資金缺口，主要是在一九九四年分稅制改革後，國家稅收收入的大部分歸入中央財政，儘管中國現行《預算法》等有關法律嚴格禁止地方財政出現赤字和地方政府舉債，但事實上各級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顧自身償債能力擴大赤字，且這些債務大多處於隱性狀態（張茉楠，2011）。

然而如果站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角度來看，制度的創新與發展必須重視具體的理論與實踐的不斷循環，以面對現實條件限制所造成的錯誤，亦即重視主體思維能動性與客觀社會條件限制的相互作用。那麼在某種程度而言，中國地方債務是全球金融危機中刺激計畫的嚴重後遺症，亦即中國地方融資平臺是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後實施的「四萬億」刺激計畫而產生的。在四萬億元經濟刺激計畫中，中共中央承擔 1.2 萬億元，餘下的 2.8 萬億人民幣由地方政府承擔，而有關信貸和地方融資的政策也相應放寬，成為各級地方政府擴大融資、投資的重要機遇期，無論是地方債務的規模、超常規的增長速度都史無前例（張茉楠，2011）。

那麼可以說，分稅制已經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成為歷史產物，然而在辯證唯物論範式導引下，新的內在矛盾將會不斷出現，因而需要做出更多的制度變革與創新，而不是將新生的問題歸咎於既存、且並非專門解決該問題的制度上。朱鎔基對於分稅制導致地方政府財政匱乏的回應，充分體現出中共中央對於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語彙使用。

朱鎔基批駁他當年制定分稅制卻令地方財政陷入困難的說法。他強調二〇一〇年稅收八萬三千億，地方收四萬億，中央返還三萬多億。中央自己才一萬多億，因此不能說中央把稅都收上去了（江迅，2011）。此外房地產占中國 GDP 的 30% 以上，朱鎔基更強調目前房地產的稅收都給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絕對不是分稅制的錯誤，地方並沒少收錢。是故，朱鎔基的說法，可以使吾人更進一步確認分稅制的歷史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分稅制的確幫助強化中央權力，但分

稅制並無法面對地方政府當前的進一步負債問題，也是一個事實。

三、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

(一)、承包制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意義

要瞭解中國混合所有制發展的特殊性，便要從國有企業改革作為起始。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指出（2010：1、28），中國政府在一九八四年以來一直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轉軌的中心環節，所以要瞭解為何中國出現混合所有制以及為何出現如此普遍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就必須把國有企業改革當作一個關注焦點。

一九七九年，由於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企業主群體自然是國有企業，依照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佔當年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 78.5%，集體企業所占比重為 21.5%；但到二〇〇八年，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僅僅為 29.9%，並且絕大部分國有獨資企業已經成為含有非國有股份的國有控股企業（張文魁，2010：2）。即使二〇〇八年仍有大型國有獨資企業存在，但絕大部分已經實行所有權改造，就是母公司保持國有獨資，變成一個控股機構，大部分生產經營活動都由子公司、孫公司進行，這些子公司和孫公司幾乎全部改造為同時含有國有股和非國有股的股份制企業（張文魁，2010：2）。當然從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後半期之後，也有許多國有全資企業被改造為含有一部分國有股但由非國有股東控股的股份制企業，以及不含任何國有股的私有制企業（張文魁，2010：30）。因此，從國有企業的歷史變革過程中，可以發現中國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萌生，而且並不是西方意義下的大規模私有化。

張文魁（2010：2-3）舉出一些實例：如聯想集團公司母公司，就是由國有

全資改造為混合所有制的企業，國有股占 65%的比例，而其餘 35%的股份為管理層和核心員工所持有；又如萬通集團公司是一個純民營的房地產企業，但它在二〇〇四年引入天津一個國有企業股份而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又或是銀泰集團本來是民營企業，但二〇〇七年通過併購湖北省一個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鄂武商 18%以上的股份，而政府在這個鄂武商仍然保持 17%的持股，因此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還有波導集團，它起步時是鄉鎮集體企業，後來改制成民營資本控股的企業，之後又引進一個國有企業——寧波電子集團作為戰略投資者，由寧波電子集團控股，成為含國有、集體、民營資本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張文魁，2010：13）。

鑑於張文魁（2010）在《中國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興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一書中對混合所有制產生的歷史脈絡與文獻資料有詳細的介紹與說明，因此本文便列舉該書重點作為本文探討「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關鍵文本。張文魁（2010：10）在整理相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獻資料時發現二個關鍵的具體事實。一方面他認為對於混合所有制的文獻探討顯然是不足的，還有太多有關混合所有制的歷史經驗資料有待吾人發覺。一方面這也證明混合所有制的發展是實踐早於理論，是在實踐中出現混合所有制企業，然後理論界、政府單位才開始加以關注。這樣的關鍵事實發現，無疑補充我所強調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亦即混合所有制呈現實踐先行、以及理論與實踐不斷循環的過程，更使得中國共產黨能根據混合所有制發展歷史經驗過程，仔細琢磨如何為「我」所用的一套屬於中國特色的動力系統。

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國有企業自己的請求下，四川省政府對四川化工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甯江機床廠等六家國有企業實行放權讓利，給與企業更多生產經營權，並根據企業完成生產計畫情況和經濟核算情況給與企業留存部分利潤。留存利潤用於給職工發獎金或進行再投資（賈存斗，2011），這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開端，並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一部份。

接著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三日由中共同務院頒布《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

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內文強調應進一步調動企業積極性，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福建省國有骨幹企業的五十五位廠長與經理聯名發表一份呼籲書——〈請給我們鬆綁〉，並在《福建日報》上全文刊登，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等媒體紛紛轉發，引起中國國企全面的放權運動（葉檀，2008）。這使得中共中央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頒布《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內文仍是針對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若干問題進行說明。

不久中央政府又作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決定》；兩年後，國務院發文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責任制」，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是企業法人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吳曉波，2008：38）。那麼可以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八〇年代過程中看出，中共中央是如何進行權力的釋放，以促成微觀國有主體企業能成爲一個進一步拉抬社會的發展動力，促成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遷。

國有企業改革在八〇年代過程中並沒有涉及產權議題，而是強調微觀動力主體的自主權伸張。其關鍵激勵制度，除上述所提及給與企業家管理經營權之外，就是承包責任制度。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每日經濟新聞》經濟評論人葉檀（2008）女士指出：「一個包字，涵蓋上世紀八〇年代從農村到城市改革的要義：包字的實質是將部分使用權與管理權讓度給農民與企業，通過稍有區別的利益激勵機制，調動企業與農民的積極性」。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是一個長時段積累下來的小農社會狀態，即便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立基在中國這片土地之上；這使得拉抬傳統社會的改革勢必是從農村開始，進而產生擴大效應，也能服膺前文所提及的，中共中央首先必須進行以思想面對長時段中國小農社會結構的撞擊，方能拉抬整個傳統社會，進而在促發微觀主體進行實踐的過程中，不斷進行理論與實踐的循環過程，發展新的社會經濟系統以供共產黨所用，並進而面對轉型中的社會經濟發展結構。因此，在探討「公有制爲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成型議題時，必須以一個中國整體的發展

角度優先看待承包制度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一九七七年在華國峰授意下所提出的「兩個凡是」，顯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極為偏向翹翹板的另一邊。而在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啓動之後，一篇由胡耀邦審閱定稿的文章，稱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則先後在中央黨校辦的《理論動態》、以及《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刊載（鄒東濤、歐陽日輝，2008：69）。該篇文章象徵翹翹板往另一邊進行傾斜，強調社會實踐的重要性。

不管是「兩個凡是」、亦或強調社會實踐，基本上都是以毛澤東思想作爲一個根本依歸。只是透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說明，可以知道「兩個凡是」是建立在毛澤東書寫的「條文」上，但社會實踐則把毛澤東當作一位革命「導師」，或者是本文所提及的，將毛澤東作爲一個社會主義積極行動者的原型，關注於毛澤東所創建的方法論範式，亦即所謂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因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該文章才會出現這句話：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於它是經過實踐檢驗了的客觀真理，正是由於它高度概括了實踐經驗，使之上升為理論，並用來指導實踐」（光明日報，1978）。

這樣的說明不能只用意識形態角度進行詮釋，在改革開放實踐歷程中，它彰顯的無疑是一種方法論運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所說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基本上應該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著共通精神，只是鄧小平更爲強調必須首先在政治層面進行思想解放，才能夠面對未來的社會實踐。在這份講話中，鄧小平還提及針對經濟管理的權力必須下放的說明，他認爲要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積極性，就必須將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進行下放。

同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其公報內容中便指出，必須在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使中國經濟管理體制的權力進行下放，提高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勞動者的自主權，使四者獲得更大主動性與積極性。公報甚至對農業生產的管理也提出看法，認為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所有權和自主權都必須受到國家法律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佔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此外，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那麼從改革開放初期，中共中央對於解放思想、社會實踐的論述中，可以發現中共中央在進行改革開放時，在思想上的腦力激盪，便在於促成各個微觀主體動力的萌生。

歷史機緣是奇妙的。兩個鄰近發生事件，會從無關係轉換成一種重要聯繫。中國扶貧基金會名譽會長王鬱昭，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在安徽滁縣地委主持工作，期間親歷所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大包幹」事件，¹⁷也就是影響中共在日後建立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重要事件。

王郁昭（2009）強調，當時安徽滁縣地區在一九七七年有組織 300 多名幹部，深入到 400 多個生產隊進行調查，¹⁸並向省委上交報告，最後形成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決定》，並於十一月下旬公佈，在全省貫徹執行。其中主要內容就包括：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情況建立不同形式生產責任制，只需個人幹的活可以責任到人；允許和鼓勵社員自主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王郁昭（2009）強調這些規定在當時尚屬「禁區」，但卻深受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歡迎。

當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央主動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進而引發持續性的大討論之時，安徽滁縣地區地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王郁昭（2009）憶

¹⁷又稱包幹到戶，農戶承包集體的基本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自主經營，除了國家和集體應得的各項費款，其餘產品或收入歸承包戶所有。

¹⁸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隊，並規定生產隊範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

及許多公社幹部提出一個尖銳問題：農業長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裡？不過奇怪的是，其他縣有幾個公社在該縣普遍減產的情況下，他們卻全面增產。王郁昭才發現有些生產隊已經偷偷實行包產到組，甚至有的已實行包產到戶。會後，安徽省對這些社隊進行調查、寫出報告，並立即組織試點。在試點過程，進行包產到組的發展，甚至一部分生產隊暗中開始「包產到戶」，其中就有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王郁昭（2009）提及三十多年前的小崗村，只是一個擁有 20 戶、115 人的生產隊，而且大多數村民都曾出門討過飯。但經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那段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事件，就是小崗村十八位農民紛紛蓋上鮮紅手印、立下生死狀、實行「包產到戶」的舉措，¹⁹這種在當時來說可能還是被認為屬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使得小崗生產隊在第二年創造奇跡，亦即自一九五七年起，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和油料任務，分別超額 6 倍和 80 倍。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所進行的思想解放，以及以地方政府與生產隊的政治互動所進行的社會實踐，基本上是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的範式中，產生理論與實踐的撞擊，使得這兩個事件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同時達到一個引爆點，進而形成一種內在關聯，因此不能說二者是沒有關聯的。

一九七八年陸續對「真理標準」所進行的大討論，有人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陳曉萍，2008），這樣的說法不禁使人想起五四運動的意義。沃馬克（2006：17）認為：

「五四運動的意義不能被化約為反日運動或『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它充當著一種社會催化劑的角色，因為這個社會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政治表達形式和一幅新的政治發展藍圖」。

那麼，一九七八年當時社會輿論對於思想解放、真理標準的探討，對於社會

¹⁹ 又可稱為包幹到戶、分田到戶。

發展而言，無疑是一種催化劑，我認爲它使得各種底層的、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動力能夠衝破過去社會主義僵化教條的約束，而探出頭來。我所說的日常生活動力，一種觀照日常生活節奏所產生動力的重要性，基本上可以從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趙樹凱（2008）對一九七八年時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的萬里的評論上彰顯出來。

一九七八年安徽之所以啓動農村改革，就趙樹凱的說法，是因為有危機。一方面來自文化大革命影響下的政策路線受到日益強烈的質疑；一方面來自於安徽內部的全省大旱（趙樹凱，2008）。面對危機，萬里認爲，不管是集體還是個體，只要把可以種麥種菜的土地都種上就行，總比拋荒好。趙樹凱認爲「這裡沒什麼大道理，只是生活常識而已，讓政策回到常識。而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荒唐，就在於已經扭曲了常識，或者無視常識。實際上，萬里正是以生活常識進行了改革最初的政治動員」（趙樹凱，2008）。

那麼，一種在思想解放過程所產生的包容氛圍，基本上在中央引導的論辯過程中，首先開了一個縫隙，讓底層人民爲了面對基於自然環境、或所屬社會經濟環境的日常生活節奏，而必須產生的生活動力有了發展空間。這其實是一個更爲重要的大道理，就是政治始終必須跟生活結合與實踐結合，並且政治與經濟、社會著實密不可分，理論與實踐也著實密不可分。

而且我認同趙樹凱（2008）的說法：「家庭承包經營本身屬於經濟領域的制度創新，但是，這個創新的過程顯然是個政治過程」。這樣的政治過程，其實可以看到中央與地方政治出現兩條平行的發展線，卻相互互別苗頭的進行辯證的過程。當然在前文對於「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的說明，則更加突顯中共中央如何隨著改革開放所產生的新社會經濟結構，建立起一個協同中央與地方政府持續進行動力發展辯證過程的系統。

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導引下，中央自身因爲地方創新，而產生在理論思辨上的進一步碰撞，似乎對於「真理判準」大辯論還是昨天的事，但卻因爲地方「包

產到戶」的問題，而讓中央的思想辯論塵煙再起。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提名為張浩的來信：《“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²⁰該信內容強調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趙樹凱，2008）。這封信象徵中央高層仍有持反對意見者。甚至在執行伊始，華國鋒與鄧小平也是抱持觀望態度。例如鄧小平曾強調，對於包產到戶這樣大的問題，在思想上毫無準備，不好回答，不過他還是強調一個大決策，就是到二十世紀末實現溫飽，二十一世紀初實現小康（柏晶偉，2007：225）。

然而，對於中央因為地方改革所帶來的衝擊還未完全適應之時，其實已經代表中央開始接受一種從既有封閉系統所產生的內在分裂，讓地方政治過程能進行一種創新與衝突，以撞擊中央的傳統既定意識型態。

在中央的說法上，地方又如何回應呢？當省農委主任周曰禮回到安徽並將中央的訊息向萬里作了彙報，最後請示該如何傳達貫徹時，萬里的決定是：不傳達（趙樹凱，2008）。王郁昭（2009）強調，在一九八〇年初，安徽省委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時，他要求給「大包幹」報個戶口，承認它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生產責任形式，因為他認為透過實踐已經證明這樣的生產關係提高了生產力。但即便安徽省先承認這樣的生產責任制，卻不代表其他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員能夠認同這樣的生產責任制。

我認為，萬里做出不傳達、以及持續實踐的舉措，這只是證明針對一件創新的事物，不管是中央與地方、或是地方與地方中的政治人物，在政治意識的鬥爭上還是一個現在進行式。危機所產生的創新、進而延伸衝突，並進一步有產生鬥爭的可能。但這樣的政治人物鬥爭，卻是在鄧小平領導下，具有在確定國家方向、原則之下，才能進行的鬥爭。亦即必須在國家從事現代化發展、以及讓農民求得溫飽的必要條件底下的鬥爭。誰要是獲得更多在實踐上的認同，誰就可以進一步

²⁰「三級所有」指的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隊，並規定生產隊範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

勝出。萬里便曾經對一些當時的中央官員產生批評：「他們腦子裡只有抽象的農民，哪怕農民餓肚子也不理」（萬里，1996：114）。很顯然，萬里知道自己做得是對的。

一九八〇年上半年，王郁昭在省委地市委書記會議上，看到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內部談話稿，這個是意見稿，不准抄錄和傳達（柏晶偉，2007：230）。鄧小平說：

「『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趙樹凱，2007）。

趙樹凱（2007）就認為，中共內部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能夠成功，是因為一種「上級領導和下級改革者建立起來的非正式政治網路」、一種「政治庇護關係」，²¹才使得政策主流發生轉變、甚至瓦解正式政治結構。當然趙樹凱後來還是有提及「回歸制度」的重要性。或許可以說這樣的政治庇護關係、或者是非正式網絡，是中國長時段下來的傳統，一種「關係」的正向發展；或許也可以說萬里、鄧小平等「政治家」，就如同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 2005：181）所強調的「企業家」一樣，正在「實現新的組合」。但我認為，雖然不能小看傳統、以及個人因素的重要性，但更應該知道中國發展動力的宏觀面，絕對不是只有個人關係、政治家的志向所能全然說明的，關鍵是找出以及如何詮釋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所建立起的動力系統。

之後，在萬里成為中共中央國務院副總理並親自主持之下，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布該年一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以簡稱《紀

²¹ 依照趙樹凱（2008）的說法，鄧小平早就與萬里有過接觸，並且欣賞、認同萬里的作為。

要》)。在該文中，使得我們知道當時全中國農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產隊建立各種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那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樣的一種生產責任制，是一個開端，開始一步步讓中共必須面對所有制的根本意識型態問題、以及如何開始建立起一個拉抬社會發展的根本關鍵系統。

〈紀要〉強調，中國農村的主體經濟形式，是組織規模不等、經營方式不同的集體經濟；然後國營農場和作為輔助的家庭經濟，則與集體經濟並存。該文強調一種「多樣化的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結構」，等於是在陳述中共在政治運作工程中所呈現的包容性，畢竟不同的承包模式都表示某一地點和條件下的適應性和局限性。〈紀要〉繼續強調，當時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因為這些生產責任制始終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而不是土地還家的、分田單幹的、私有的個人經濟。

於是〈紀要〉表述了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下的社會主義世界觀的最後底限，承包給社員的土地不准買賣、不准出租、不准轉讓、不准荒廢；社員無力經營或轉營他業時，也應退還集體。總之，這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步，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式載入中國的憲法之中。這樣的承包體系，開始迅速擴展到前文提到的地方政府（分稅制改革前）、以及國有企業的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前）之中。

中國在承包體制下，其所彰顯的意義就是讓各種微觀主體發展其自身的自主性動力，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導引的說法詮釋下，就是能在既有社會客觀條件下，發揮各個思維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同時另一層面的意義在於，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畢竟與一般農民不同，它們有著更為龐大的動力運作機制，一旦獲得自主權動力，變會幻化成食肉的猛獸。

本文在探討「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時已經指出，地方政府在分稅制改革前，其自身利益正不斷增加，但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卻無法相對擴張，以至於造成「強枝弱幹」的局面，進而抑制住「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整體發展。

在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上，我們也能看到相似情況。

改革開放初期，企業利潤不斷增加，但國家財政收入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一卻一直沒有產生相對性增長；相反，企業留利和職工收入卻不但攀升。一九八一年國務院頒發《關於實行工業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其經濟責任制就是企業上繳利潤的責任制，規定通過利潤包幹和分成等辦法，以保證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數額；之後在一九八三年又頒布《關於國營企業利改稅試行辦法》，規定實施所得稅制度和利潤調節稅制度；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共國務院頒布《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決定廢止利改稅試行辦法，又重新全面推行企業承包經營制度，並對規模較小的企業實行租賃經營制度。承包制核心仍是規定國有企業利潤上繳辦法，基本做法是「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收多留、歉收自補，同時相應強化企業自主權」（張文魁，2010：33）。

不過，以承包制為主和小規模租賃制為輔的局面，是中共中央政府企圖在發揮企業積極性的同時，一面想要挽救中央財政收入下滑的一種嘗試，但實際上「促進企業積極性」與「提昇國家財政收入」在承包體制下有其在一黨專政方法論引導下的內在矛盾。張文魁指出（2010：33）中央政府在全國範圍推行放權讓利以促進企業生產積極性時，並沒有預料到「國有企業經濟剩餘如何進行動態分配」將會成爲一個問題，「國家無法接受經濟剩餘的分配過多流向企業內部人而國家財政收入停滯不前的事實」。

張文魁進一步強調（2010：34），中央政府在與企業內部人進行不斷重新談判過程中，並沒有占到任何便宜，內部人談判地位反而不斷上升。此外，中央政府在面對國有企業改革時，還必須負擔改革成本。張文魁根據所取得文獻資料指出（2010：40）：「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成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組成本，即減輕企業包袱和債務負擔的成本；二是民營化成本，即實行民營化必須要由國家支付的費用，儘管這兩類成本有時難以準確區分」。就張文魁列舉出中央政府所負擔的國企改革成本來看，並不是小數目；因此，在承包體系上，中央政府始終在相

對而言無法從國有企業取得足夠增長的財政收入。

國有企業的承包體系，同時也助長國有企業著重當期生產、輕視長期投入的弊病，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共執行國家財政和稅收體制改革，承包制才全面終止，國有企業必須按 33% 的稅率上繳所得稅，而不再上繳稅後利潤（張文魁，2010：33）。於是國家財政收入與國有企業發展積極性的內在矛盾，才得以解除。如前文所述，一九九三年正是中共中央政府宣佈要建立中央與地方分稅制的一年，企業依法納稅，並理順國家和國有企業利潤分配關係的作為，也被相應的置於國家的財稅體制改革過程之中。一九九三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文件，明確的指出二者之間的關聯與共時性。這表示，在中共一黨專政的辯證唯物論範式導引下，相對應於自一九九二年起逐步發展形成的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而言，「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以及「宏觀調控管理系統」三者間，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其重要的關聯性，也形成系統間綜效的可能。

「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的建立，除持續彰顯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動力發展上的辯證過程，最主要的是促成後期「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成熟成為可能；而在發展中的「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也促使中央政府能有更充足的資本來達成「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成熟。只是，「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還有著進一步的發展，進而才能促成中央政府對於微觀行動主體的滲透，以及該系統動力的全面釋放，也才能更使得「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成為可能。

（二）、「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建立與系統發展

在中國形成「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過程中，已經等於間

接說明中國不可能出現西方意義下的私有化過程。張文魁（2010：31）指出，由於私有化需要企業財產分配技術、產權交易技術、以及相應的資金和市場，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在發展的短期內，根本無法提供這些條件。不過，這也牽扯到以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社會主義世界觀所產生的制約。

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對私營企業採取的方針是「看一看」（吳曉波，2008：26-27）。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知識青年返城、與城鎮積壓待業人員達到 700 至 800 萬人數，使得中共中央必須考量增加就業的問題，使得個體經濟開始誕生，然而共產黨於當時並沒有承認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至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才指出：必須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其他所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白曉玉，2009）。那麼，我們必須始終以混合所有制的發展歷程角度來觀看各項所有制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應該首先從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中看出「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是如何誕生的，而不是從是否執行、偏離私有化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對於所有權制度的發展。

當回到混合所有制發展脈絡來進行詮釋時，張文魁（2010：9）曾經指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無法脫離意識形態，一項改革舉措如果與社會主義的距離更近，就可以更快地得到推行，如果與資本主義的距離更近，各方面就會顯示出謹慎甚至躲避的態度」；但張文魁（2010：30）又弔詭的強調：「中國混合所有制的興起顯然不能完全用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來解釋」。這表示當我們企圖要詮釋中國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發展時，必須審慎注意「意識形態」這個名詞的使用。倘若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說法，會呈現一種較為靜態的說明，似乎彰顯一種明文規定的教條，且無法更改，一碰即死。然而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發展現實情況在於，社會主義本身已經不僅是一個目的，它還成爲一種工具。

正如 W·Brus 與 K·Laski（2010：35）所強調的，起自蘇聯發展的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不僅造成一種革命在前、現代化在後的時序顛倒狀態，也意味認知路線的基本偏移：「社會主義將不是『趕超其他國家』的結果，而是趕超的重要工

具」。只是蘇聯垮台了，那麼難道中國仍是以蘇聯灌輸的意識形態教條作為依據嗎？那麼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主體在改革開放實踐過程中所展現的能動性，必須回到更根本的方法論詮釋才能加以說明。

如前文第二章曾對「毛澤東思想」以社會主義行動者的角度進行切入時所強調的，毛澤東創建的並不是一種理論、不是一種社會主義理論所建立起的意識形態教條，反之，是一種中國辯證唯物論的範式。辯證唯物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它包含針對實踐方法所具有的認識論邏輯規則，以及行動者主體如何看待世界的本體論世界觀；二者缺一不可。那麼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用「社會主義世界觀」的說法，或許更能彰顯中國共產黨在實踐與理論循環過程的制約意義，顯現一種更為動態的詮釋說明。

如果我們再一次確認辯證唯物論是方法論，而不是方法，那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開業，就能被合理的詮釋為：是中國共產黨基於辯證唯物論導引下，運用西方股票市場制度作為一種方法，以面對新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誕生。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一日深圳證券交易所也相繼成立。這使得從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開始，兩大股市代替中央財政成為向國有企業輸送資本的工具，國有企業在上市過程中，使得國家財政及銀行對企業的撥款或貸款，先變成債權，再變成股權，然後通過股票發行賣給股民，同時解決居民儲蓄增長過快的問題（吳曉波，2008：71、80）。這樣的作為也因此降低中央財政改革國有企業的成本，並進而使得中央財政有著更充分的宏觀調控資本的可能。

債轉股以增加流動性（liquidity）的方式並不新鮮。早在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的英國金融革命過程中，就已出現。當時英國政府便透過股份公司，將國家金融與個體金融連結，同時也連結到股票市場。這當中，英格蘭銀行扮演重要角色，就是把英國政府的短期負債轉換成長期負債，以壓低政府負債成本（Bruce G Carruthers，1999）。只不過「債轉股」卻成為中國政府以國企改革為主軸所進行的混合所有制形成過程中的一個方法而已，時空脈絡完全不同，所對應的社會

經濟結構也截然不同；當然，背後的方法論也完全不同。總之，實際情況是，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肯定股份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獲得突破，證券交易市場也快速發展（張文魁，2010：36）。

正如吳曉波（2008：59）所強調，一九九二年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只不過他認為的分水嶺在於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不信任迷霧逐漸散去，跨國公司再次加快進軍中國的步伐；然而我認為一九九二年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分水嶺，是在於中國已經形成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的持續發展態勢，同時為因應此一新的轉型增長結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也在九〇年代的發展中相應成型、並確立成為中國發展的戰略動力系統之一。

一九九二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確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江澤民並在十四大報告中指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各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至一九九三年共產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提出國有企業改革是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張文魁（2010：36）指出，雖然現代企業制度包含產權明晰的內容，但正式所有權改革並沒有被明確提及。直到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1997）在報告中強調：

「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

用；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在江澤民的報告中，可認知中國的所有權改革起自一九九七年的發展，並非是西方意義下的私有化，並不是把私有化當作目的本身；反之，是在辯證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體現下，仍將公有制視為主體，並借用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為共產黨所用，進行包含私有經濟的混合所有制的發展。江澤民（1997）在報告中也對傳統公有制理論作出重大修正，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含義。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資產佔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對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品質。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於是，從該政策文本中可知，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所有制發展，已經不能將公有制視為馬列思想理論的意識形態，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動態發展的系統工具，使得公有制成為具戰略意義、具支配性、具操縱性、具引導國家社會經濟整體發展、以促發持續拉抬社會動力的系統。「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就是

中國一黨專政主導下，將逐步發展的市場經濟進行社會化過程的一個關鍵動力系統，以促成社會經濟的總體發展。

二〇〇一年中國國家統計局設管司提出《關於統計上劃分經濟成分的規定》，在第一條明確指出：「爲了反映我國經濟中所有製成分的構成情況，爲宏觀決策和管理提供依據，特制定本規定」。這表示，以公有制爲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作爲拉抬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存在於市場經濟之中，基本上受制於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控制，也顯現出中國政府在制度聯繫上所彰顯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關鍵意義，即中國政府不斷進行工具合理化的發展，以促成制度間的聯繫來面對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以具宏觀戰略意義的前提下進行社會經濟的轉型任務。

圖九則標示出混合所有制的分類結構，其中公有經濟是指資產歸國家或公民集體所有的經濟成分，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而非公有經濟是指資產歸中國內地公民私人所有或歸外商、港澳臺商所有的經濟成分，包括私有經濟、港澳臺經濟和外商經濟。這類統計相關的工具合理化發展其實一直持續進行。

一九九八年國家統計局設管司面對混合所有制之下的股份制運用，便提出《關於統計上國有經濟控股情況的分類辦法》，至二〇〇六年面對非公有控股的發展，又提出《公有和非公有控股經濟的分類辦法》。

代 碼	分 類 及 構 成
1	公有經濟
11	國有經濟
12	集體經濟
2	非公有經濟
21	私有經濟
22	港澳臺經濟
23	外商經濟

圖 9 經濟成分分類與代碼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設管司〈關於統計上劃分經濟成分的規定〉

在這種具戰略意義、有別西方私有化過程、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主軸所進行的混合所有制發展，使中國共產黨在十五大之後提出「抓大放小」戰略，並對股份合作制度表達適度肯定。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朱鎔基，面對國有企業改革，首先注意山東諸城縣的國企改革實踐。當地政府針對效益低下的國有中小企業的改革實踐，就是想盡一切方法把它們賣出去，於是地方政府通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無償轉讓產權、破產等七種形式，將全市 272 家鄉鎮辦以上國營或集體企業都出售給個人(吳曉波，2008：70、72)。

中共中央採取的「抓大放小」戰略中的「放小」，就是借鑒「諸城經驗」；而所謂「抓大」就是全力扶持那些從市場中衝殺出來的具國有資本的企業，把它們儘快送進「世界 500 強」(吳曉波，2008：80、81)。的確，隨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的發展，中國勢必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產生連結，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也必須運用所有制的操作系統去面對全球性競爭。

一九九六年，中國國家經貿委宣佈將支持寶鋼、海爾、江南造船廠、北大方正、長虹和華北制藥廠在二〇一〇年進入世界 500 強（吳曉波，2009）。之後國家經貿委便持續注意中國大型國有企業與世界 500 強的對比分析，例如國家經貿委經濟資訊中心在二〇〇一年發布〈一九九九年我國國家重點企業與世界 500 強對比分析〉文件。

在中央政府確定「抓大」戰略之後，各地方政府（省）應聲而動，紛紛開出地方政府的扶持名單，宣佈將在若干年內將它們送進「中國 500 強」，而各縣市則相應地提出打造「省級百強企業」（吳曉波，2008：81）。於是「抓大放小」戰略，基本上顯現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理論與實踐循環過程，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動力發展上的辯證過程，進而持續引導國有企業改革、與促成各種不同所有制微觀主體動力的、隸屬於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發展。這基本上也符合吳曉波（2009）的看法，即中國是少有的以所有制性質來分配公共資源和政策資源的國家；所以中國所有制改革彰顯的是一種整合式的系統運作。

在「放小」戰略上，中國共產黨在十五大之後開始促進所有權改革。張文魁（2010：36）依據中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中小企業司在一九九九年提供的資料指出，就中國 2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統計資料來看，到一九九八年八月，「獨立核算國有中小企業改制數量達到 47,631 家，占應改制企業的 64%，其中江西省國有小企業改制面達到 87%，安徽省國有小企業改制面達到 93%。在這 47,631 家改制企業中，採取股份合作制形式的 10,769 家，占 22.6%；採取整體出售形式在 3,893 家，占 8.2%；採取租賃形式的 3,470 家，占 7.3%；採取股份制形式的 2,928 家，占 6.2%；採取承包形式的 2,197 家，占 4.6%；採取兼併形式的 2,098 家，占 4.4%；採取破產形式的 1,340 家，占 2.8%；其他形式如合資嫁接等形式的 20,931 家，占 43.9%」。

而在「抓大」戰略上，吳曉波指出（2009）在一九九八年後國有企業改革產生進一步轉變，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中撤出，大量聚集到上游能源、資源型領

域，中國產業經濟由輕型化向重型化轉移，與國有企業改革形成配套。這種轉折所形成的戰略稱為「國退民進」，國有企業從 164 個競爭性行業撤出，同時在上游能源性行業強勢形成壟斷，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汽車、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軍工等（吳曉波，2008：90）。

在中國政府所推行的各項戰略上，我認為可以將其視為一種混合所有制系統的發展動態過程、一種產權持續變革的過程，而不能將所謂的「國退民進」、或是「抓大放小」戰略定義為一種靜態的特殊模式，特別是以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動態發展邏輯法則來看的話。

像「蘇南模式」也是一個例子。亦即不能將蘇南模式視為一個靜態發展的成就、神話。提及「蘇南模式」首先要提及「鄉鎮企業」。中國的改革起自農村，使得所謂鄉鎮企業的發展有其歷史必然性。依照本文曾指出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下，我們知道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國農民流動在改革開放初始並不是走城市工業化的道路，而是從農村工業化開始。可是談到本土化流動，就不能不說鄉鎮企業（林斐，2008：39）。

林斐（2008：40）指出，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下，八〇年代初期的城市工業發展封閉，不能接受大量農民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使得農產品和勞動力都留在農村，造成鄉鎮企業在此基礎上創立。在當時經濟短缺背景下，產品銷路不愁，使得全中國湧現一批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各種「模式」，如以集體經濟為主體的「蘇南模式」，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的「溫州模式」等等，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鄉鎮企業。然而，一個起初受人稱道的「蘇南模式」，到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間，其企業效益跌到谷底。江蘇省社科院農村研究所所長包宗順便認為，蘇南模式有其發展的歷史條件，之後產生諸如產權模糊、政企不分等等的弊端（包永輝，2008）。我認為蘇南模式所產生的弊端，是必須與起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的發展產生關聯，才能稱其為是一種弊端；亦即八〇年代的發展模式無法適應新起的轉型結構。

吳曉波(2008:88)便指出,九〇年代後許多地方領導仍抱住蘇南模式不放,反而阻礙經濟發展。到二〇〇二年底,蘇南地區 93%的鄉鎮集體企業通過各種方式轉成私營企業,於此顯示為中國九〇年代後期所有制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部份。因此,一味地探討靜態的各種特殊發展模式,其實並不能借此對中國的動力系統做出進一步探討。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下,其模式的發展只是系統整合過程中的初步實踐,必須基於思維能動性與客觀社會條件限制的思維邏輯原則,才能理解中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發展系統。

張文魁(2010:37)指出,一九九九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命題,提出要大力發展股份制,並將放活範圍首次從小型擴大到中型國有企業;會議首次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可以改為股份制企業,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表示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後期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已經將股份制作為一種手段,運用在以國有企業持續性改革為基礎而產生的混合所有制發展過程上。

這個過程顯現中央政府如何運用西方傳承的股份制度,滲透到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的市場機制中的各個關鍵動力主體之中。同時也如同上述對待各種經濟發展模式的態度,所謂的「國退民進」或是「國進民退」都不是一個僵化模式,而是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下,一種根據「主體思維能動性與客觀社會條件限制」、以及「關注社會運動的內在矛盾」等的思維認識邏輯原則下,所進行的以混合所有制性質來分配公共與政策資源的整合性系統運作。

同時「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與「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產生了制度間的聯繫。例如在二〇〇八年之後的宏觀調控之中,中共中央政府四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計劃以及巨額新增貸款,是投入到國有企業聚集的領域(吳曉波,2009),這種有別於先前「國退民進」歷史的「國進民退」現象,只是「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面對當時時空條件所產生的系統操作表象,如果只是以靜態的「模式」論調進行考察,將只是成為一種限於表象的論述與詮釋!

亦即，例如當中國發生「國進民退」的現象時，若有人認為「國進民退」是在「國退民進」現象之後的一種倒退、負面的發展，基本上就是過於採取靜態的比較，而忽略中共方法論導引下的歷史辯證過程。此外必須再次說明，本人並不是以一種為中國政策做出辯護的立場來撰寫論文；反之，是以中國一黨專政發展下，其歷史脈絡意義的內部詮釋作為出發點。

至二〇〇三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主要實行形式；至此，發展混合所有制正式在實踐當中得到大力的貫徹推行（張文魁，2010：37）。歷史發展至此，形成本文在一開始探討「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時所呈現的、中國獨特的混合所有制現象，也顯現該系統已步入一種較為成熟的運作時期。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後期，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與實踐早已有著初步的雛型，這使得以二〇〇二年為基線而初步統合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成為可能。

（三）、「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意義

針對「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形成，還有一些地方需要進行探討與說明。首先，張文魁（2010：37）指出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後期中國所有權的變革，還包括職工身份的制度改革，形成產權置換與職工身份置換的有機結合。亦即，國有企業在面對所有權改革時，也面臨國有職工身份的轉換，進而產生政府支付經濟補償金的具大成本。因此當國有全資企業在調整國有股份比例、甚至轉變為非國有企業時，政府必須將職工在國有企業終身就業、養老的身份，盡量改為合約化就業、並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身份（張文魁，2010：38）。因此，稱混合所有制的變革是一套系統形成，一點都不為過。當然，最主要的是我們能從張文魁對混合所有制探討的論述中，發現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詮釋的力度，其

實更能夠解釋這套動力系統所具有的意義，有以下四點。

1、微觀企業主體交織，形成相互輔助的推進動力

「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成型，將使得市場內部的微觀企業主體藉由股份比例的分配，形成橫向聯繫，讓微觀主體相互交織，擴張發展動力。張文魁（2010：66）舉例，像鄉鎮集體企業在內的非國有企業，由於受到國家計畫管制和行政約束的影響較少，所以在經營機制上比較靈活，這使得國有企業往往願意與非國有企業進行聯合；反之，國有企業在設備、技術以及獲得資金方面具有優勢，並且國有企業更能得到客戶和銀行信任，這也使得非國有企業也願意與國有企業進行聯合。

然而關鍵是中國民營企業難以全面享有國有企業一樣的待遇。例如中國房地產企業龍頭——萬科股份有限公司，在一九九八年有機會成為純私人企業，但萬科管理經營層離不開國有單位（因為國有單位能獲得國家在軟資產的支持、以及政策優惠），於是納入一定成份的國有股份（張文魁，2010：68、75）。因此，「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成型，無疑促成微觀主體的交織，而擴大發展動力，強化微觀主體拉抬總體社會經濟的力量。只是微觀主體交織產生的動力，始終必須妥協在一黨專政的引導下。亦即在中國一黨專政的辯證唯物論範式引導下，可顯見混合所有制最能符合各個微觀主體的利益。

2、中國共產黨與微觀主體在制度變革運動中的內在矛盾與辯證關係

中國內地學者在探討所有制改革時，容易著重在實踐的概念層次來說明改革的各個階段發展；這其實忽略中國是在理論與實踐循環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引導下所產生的現象。張文魁（2010：38）便使用「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等名

詞詮釋，說明中國政府的改革往往局限於當前困局，而顧不上根除國有企業的深層弊病，「因而每一階段的改革都帶來後遺症並需要新一輪改革來應付，使改革陷入疲於應付的境地」。這說穿了，其實是彰顯辯證唯物論的邏輯原則，就是持續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矛盾中開展辯證關係。

張文魁對於現實的描述，幾乎都能彰顯這種起自內在矛盾運動而證成的持續性辯證關係。張文魁（2010：34）強調：

「在迄今為止的國有企業改革的全部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一個難以辨清的矛盾，即企業從來沒有停止抱怨政府放權不夠，而政府卻常認為企業已經失去控制」。

這其實彰顯出中國共產黨與微觀企業主體因改革運動所產生的內在矛盾與辯證關係。比方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為解決國有企業初期矛盾而進行控制權改革的時期，似乎微觀企業開始獲得絕大部分正式權力，使政府正式控制逐漸式微；但政府還是增加對國有企業的非正式控制，例如掌握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選擇權、以及政治前途的決定權（張文魁，2010：34）。這使得微觀國有企業仍被中國共產黨導引，並從中展現制度變革下的持續性辯證關係，即中國共產黨既要下放權力、又要掌握權力，而企業既要獲得權力、又要服從政府意志的弔詭發展。

3、微觀主體作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計畫的動力元素

關於上述第二點提及中國共產黨與微觀企業控制權的辯證關係，其實說明中國共產黨仍在所有權下放的同時，具有在宏觀調控上的控制權。亦即雖然微觀企業已經從過去純粹計劃經濟的體制中鬆綁，而有著進一步融入市場機制的發展動力，但正如張文魁（2010：73）所強調的，混合所有制仍使得政府能夠迫使企業

貫徹政府發展社會經濟的總體戰略安排。

例如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提出十大振興計畫之一的《電子資訊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就特別強調應該加大國家投入 TD-SCDMA 第三代移動通信產業。國有行動電話通路運營商——中國移動，它本身算是已上市、且具國有控股身份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該企業成爲主導中國 TD-SCDMA 標準進行擴張的一家公司（曾晶鈺，2008）。我們可以從二〇〇九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看出，中國移動不只是遵照市場機制來運作，它更是依附中共國家發展計畫下的產物，因而呈現超常規運動的發展。中國移動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將 TD-SCDMA 從局部性實驗網發展爲覆蓋全國 70%地市的 3G 商用網路；在網路建設方面，完成二、三期工程建設，網路覆蓋擴展至 238 個城市。中國移動作爲數位通路運營商，其實是配合政府的政策來運作。例如針對地方政府而言，二〇〇九年四月初江西省政府與中國移動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強調在五年內，中國移動將在江西投資近 200 億元人民幣，雙方將在 TD-SCDMA、綠色江西建設、加快新型工業化進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國民經濟和社會資訊化、電子政務暢通和民生工程、移動電子商務等七大領域開展深度合作（郭遠明、塗娟，2009）。這不僅顯示「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²²與「公有制爲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在橫向制度間的聯繫，也顯示一黨專政對於微觀企業의 交織與運作。

4、降低私有化風險以穩定微觀主體的發展動力

張文魁（2010：72）強調中國各地的經濟發展程度會決定官員的升遷速度，因此地方政府會希望國有企業在所有權改革之後，不要遷往外地、不要消滅原品牌、並投入更多資金加快發展、以及保持原管理層和職工職位以維持社會穩定。就上述這些方面而言，地方政府對於非國有企業並不完全放心，政府仍企圖掌控

²² 於下文說明。

微觀企業，這使得混合所有制也具有防止民營企業違約的風險。因此混合所有制系統基本上對於國有企業改革起到保護作用，以避免立即私有化所造成的危害，並穩定微觀主體的發展動力。

經過上述四點觀察，我認為有必要提出張文魁（2010：81）在探討中國混合所有制興起時，他所表達的一個觀點。他認為中國混合所有制的發展其實是與中國文化的「變通」、「中庸」等哲學觀因素產生一定關係。也就是說，中國混合所有制作為一個特殊制度產物，它完全不能與西方私有化劃上絕對等號；反之，它是根據中國強調「變通」的實事求是精神，逐步在實踐中發展而來。張文魁這種強調「變通」的影響，其實與田辰山（2008）在探討「中國辯證法有著中國『變通』思想傳統」之間，產生關聯性。

這表示，張文魁其實也意識到中國混合所有制的興起，其背後具有方法論原則的導引。只是，一旦要探討中國一黨專政如何成就一個核心動力發展系統時，我們還是不能把所謂的「變通」哲學觀進行無止盡的放大；反之，應該順著中國共產黨自身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來加以詮釋，亦即那種起自「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詮釋」、再到「中國共產黨在政策文本上的反思」、最終「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建立動力發展系統」的這樣一個過程，說明清楚，如此才能把中國一黨專政從方法論至實際系統誕生的過程加以統合的說明，產生論述的連貫性。那麼，為完善本文觀點，將進一步說明「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

四、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

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初步理論依據，很顯然必須從馬克思理論開始。W·Brus 與 K·Laski（2010：5、6）兩位學者指出，根據馬克思理論，社會主義必須建立且主動設計一更為合理組織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調節體系；亦即在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的基礎上，把互相分離的經濟活動單位一體化為一個社會整體來

進行調節。兩位學者接著採用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的看法，說明社會主義從事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屬性，便是一種從個體轉到社會規模、或是指從微觀水準轉到宏觀水準的合理化行動模式，這樣從理論上能使得社會主義的發展效率更優於資本主義，也就是說能去除宏觀範圍的無效率狀態，即便從微觀經濟角度而言是合理的目標。那麼，典型社會主義經濟層級制的結構定理，就是一種將各個系統（地區、部門、企業）所達成的低層目標轉化為一種手段，以達到整體社會系統所欲達成的高層目標。這樣的理論推導出一種對經濟活動進行事先在宏觀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制度，就是中央計畫制度，以促成馬克思所強調的社會人（Homo socialis）與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和諧狀態。

然而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從一開始便沒有依照馬克思決定論方向邁進，它們顛倒社會主義發展路徑，首先在資本主義發展不成熟的社會經濟條件底下進行革命，然後才開始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使得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目標，是消除經濟、社會、文化上的落後狀態，並且進行對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趕超。W·Brus 與 K·Laski（2010，30、31）兩位學者舉出列寧提出的公式——「共產主義 = 蘇維埃政權 + 全國電氣化」——作為例子，強調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便是企圖運用國家機器，以同時完成經濟現代化與趕超任務。而國家機器所使用的最初手段，卻仍依附於國家計畫體制的實施，亦即主要是指所謂的「五年計畫」作為國家基礎的發展戰略，或稱之為一種現代化發展戰略。

W·Brus 與 K·Laski（2010，32- 34）兩位學者指出蘇聯式經濟現代化戰略包含三大重點，首先是通過大量投資建設新工業生產能力，並以消費份額降低為代價，以實現工業增長。而就當時相對極度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蘇聯而言，消費降低以使得儲蓄積累所增加的負擔，當然是轉嫁給農民。其次是有選擇的進行不平衡增長，把資源集中到需要立即增長的部門和活動中去。最後是強調以最大限度地使用資本和勞動資源，而無視常規成本計算，特別是在微觀層次上。

兩位學者繼續說明，這種以五年計畫為主體的國家發展戰略，是二十世紀二

○年代在蘇聯首先出現的，雖然反應蘇聯當時的特殊情況，但社會主義國家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而把蘇聯發展戰略提高到通用模式高度，這其中就包括中國，即便兩位學者認為在某些方面中國對計畫體制的修改是更大了一些。不過，蘇聯東歐直到二十世紀五○年代中期、或中國直到二十世紀五○年代後期，基本上都採取這樣的國家發展戰略，亦即所謂的五年計劃經濟體制（W·Brus、K·Laski，2010：31、34）。

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到二十世紀八○年代中期，大約在計劃經濟第一次制定出來的三十年之後，包括蘇聯和中國領導人，都認為現實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需要徹底改變（W·Brus、K·Laski，2010：35），畢竟計畫體制無法細緻的管控到每一個從生產至消費的層層連結的複雜關係。不過五年計劃制度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傳統，仍出現在日後進行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其中關於發展宏觀戰略的計畫制度屬性，仍舊存在，只是與中國所進行的市場機制發展產生進一步的辯證過程，進而促成計畫制度的變革與創新。

同時，我們仍不能過於忽略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特殊性，即便兩位學者強調中國採用蘇聯五年計劃而成為一種通用模式，但仍應試圖發現中國五年計劃體制背後特殊的引導屬性，特別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基於不同的歷史脈絡而產生的進一步變革。

其次我們還應該注意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在早期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意義。W·Brus與K·Laski（2010：35）兩位學者一再強調，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產生顛倒的發展時序時，亦即在實踐上不同於馬克思與熊彼得的理論（先成熟，再向社會主義過渡）所預期的發展時序時，也意味認知路線也產生基本偏移：

「社會主義將不是『趕超其他國家』的結果，而是趕超的重要工具」。

這句話，可以做出進一步的詮釋。如果社會主義是一個「工具」，就表示社

會主義應該能指出另一種發展社會經濟過程的可能性，也就需要一種能不侷限在既有制度框架下以進行變革的認識論基礎，卻同時又能服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本體論基礎。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以一種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待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在後期經濟制度的改革過程。

畢竟，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發展，已經距離馬克思決定論越來越遠，一種基於既有理論、或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發展角度，顯然越來越不可行。這樣的詮釋，有助於回歸本文主題，亦即在中國一黨專政的方法論導引下，改革開放後究竟變革出一個怎樣的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計畫系統，而且又與先前所提的三個系統有何關聯，又是否能以中國的辯證唯物論範式詮釋出一個內在關聯的整體性說明呢？這是需要進一步說明與論證的。

（一）、國家計畫編制程序

管漢暉、林智賢（2011）兩位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各個「五年計劃」歷史背景及其成果有著細緻說明。正如同兩位學者所提出，自史達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時說出：「社會主義是按計劃進行的」，並在一九二九年四月通過社會主義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中國也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制定並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到二〇一〇年結束已經完成十一個五年計劃；這說明五年計劃在一甲子的歲月裡與中國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性。中國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五年所經歷的四個五年計劃中，基本上實現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並運用蘇聯模式的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但結果卻是經濟發展水準很低，人均財富增長有限（管漢暉、林智賢，2011）。

不過，需要更加關注的是中國起自一九七六年第五個五年計劃之後的歷史發展。自一九九五年第八個五年計劃為止，中國的經濟增長結構如前文所述，已轉成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並使得外資進入、市場機制成型、多種所有制

逐步發展，而且促成中共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這樣的時空條件下，中國五年計畫制度也開始轉變。

管漢暉、林智賢（2011）兩位學者強調，從第五個到第八個五年計劃之中，中國政府的整體戰略計畫制定，就不只包含經濟發展，同時也包含社會發展。亦即五年計劃開始成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雙重規劃，形成五年計劃制度發展的重要轉變。那麼，具有拉抬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系統將可能成型，畢竟中國計畫體制的演變，並沒有只侷限在經濟發展部門的推動上而已。

兩位學者又提到，隨中國內部市場機制逐漸成為經濟中資源配置的基礎，使得計畫手段被逐漸削弱，政府經濟職能由微觀計畫向宏觀調控進行轉變。這裡可以做出進一步的說明。W·Brus 與 K·Laski（2010：37、53-55、57-58）兩位學者指出，過去蘇聯模式的計畫經濟體制，是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作用下，企圖讓國家機器把包羅萬象的一切生產與消費關係都納入國家控制之中，也就是說，越是國有化、集權化，就越是社會主義。則國家就不得不介入包含宏觀與微觀層次的所有經濟活動。這種企圖達成一切經濟過程完全可控性的結果，反而促成一種「計畫的自相矛盾」，亦即產生經濟計畫中顧此失彼的負面結果，使得集中計畫雖然可能是可行的，但在蘇聯與中國早期經濟發展過程中，卻很難找到真正完成的具體計畫，不僅整個指標體系從來沒有完成，甚至預期的產量增長指標也是如此。

然而，當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期鄧小平南巡後，本文所論述的「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以及「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正逐漸成型，於是形成兩種主要拉抬社會的發展動力主體，亦即地方政府與混合所有制之下的微觀企業主體，因此能讓過去中國政府的全包式計畫體制進行轉變。

在一諾大計畫體制逐漸撤出那種瑣碎管控微觀主體的同時，五年計畫開始更能輔助「宏觀調控管理系統」，進而規劃拉抬社會的宏觀發展戰略。同時如前文

所述，地方政府與混合所有制的微觀企業主體能被納入「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掌控範圍中，卻又能持續發揮各自的發展動力。那麼，管漢暉、林智賢（2011）認為中國起自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中期經濟改革的特點是「計畫與市場的力量倒置」的說法，我便認為有待商榷。

如果從方法論層次來看，或是從所謂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來理解，不如說五年計畫制度與市場機制的發展，其實就是一種動態的互為辯證過程，計畫制度並未完全撤離，卻在市場機制引入的脈絡下，產生相互辯證與融入過程，於是使得中國計畫體制產生進一步變革。這一變革的主要現象，就在於計畫體制與市場機制的分層，亦即，中國一黨專政的計畫體制成份仍然牢牢地掌握與導引重要經濟領域部門的發展。若依據前文所強調的，中國國有企業仍然聚集於上游能源、資源型領域，這些領域仍然牢牢地受到中國一黨專政的掌控，並成為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的一部份。如果以這種現象來看，可以發現計畫制度不僅未完全撤離，反而更為重要！

接著從二〇〇五年十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之後，管漢暉、林智賢（2011）兩位學者認為過去中國五年計畫的制度，已經轉變成作為國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戰略性規劃。兩位學者從以下幾個重點來說明。

首先，中國政策文本中「五年計畫」的字眼，在十一五轉變成「五年規劃」的字眼；同時計畫中定量指標減少、戰略性、長遠性指標增加；另外規劃更加突出宏觀性、戰略性、預測性、指導性，「『計畫』讓位於『規劃』突顯了政府從原先對經濟的直接微觀干預中退出，並逐步回歸宏觀戰略制定者與引導者的角色」（管漢暉、林智賢，2011）。

於是我認為中國舊有的國家計畫制度，已經在與市場機制持續辯證的過程中，顯現出一種干預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動力系統，使得中國一黨專政產生職能上的轉變，從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下的計畫「管制」，轉換成社會經濟發展的

政策「導引」。

自中國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引入市場機制，並在九〇年代逐漸形成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之後，相應拉抬社會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便逐漸在歷史中成型。自一九九三年「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成型、至一九九七年「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成型，再到二〇〇二年「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初步建立，使得舊有、一元式的中國計畫體制發生質變，而五年計劃制度也在歷史過程中發生轉化，進而成為「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一部份。這使得「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不會局限於既有社會經濟發展狀態下，而產生具有指向未來的戰略發展動力。

胡錦濤（2007）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完善國家規劃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畫、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準」，由此可見五年規劃所形成的系統，其實與核心「宏觀調控管理系統」展現出一種關聯性。但是我們有必要指出五年規劃系統是如何藉由其動態的建立政策文本的程序步驟，來成就一個動力系統的意義，同時還必須指出基於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所具有的動力系統間的內在關聯。

北京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2010：12-13），身為參與中國十二五規劃的一員，他明確指出中國的五年計劃體制已經「從經濟指令計劃轉型為發展戰略規劃，由經濟計劃轉向全面發展規劃，由微觀干預轉向宏觀調控，由經濟指標為主轉向公共服務指標為主」等多面向的變化；他同時強調：

「五年規劃是國家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這些說明進一步強調五年規劃體制與「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關聯性。不過五年規劃此一制度如何能稱之為一個持續的動力發展系統呢？我們基本上可以從中國政府對國家規劃編制的程序來看出端倪。

透過胡鞍鋼（2010：15-22）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的政策文本形成過程來看，²³可以發現該五年規劃的編制程序耗時長達兩年半的時間。我們或許可以從如此浩繁的十二五規劃形成過程作為一個範例，以瞭解中國宏觀戰略政策的計畫編制程序。

如果要探討中國五年規劃能成就我所謂的一種動力發展系統，那麼就應該專注五年規劃編制過程所具有的意義。透過胡鞍鋼此一參與者的見解，讓我們曉得五年規劃過程的本身，就是一種公正政策程式化的建立，而且這個程式化本身仍歷經一再的創新與修改。

該學者說明五年規劃能讓各方表達意見產生「發散、收斂；再發散、再收斂」的過程；同時能讓各方參與者的不同角度進行「參與、共識；再參與、再共識」的過程；進而使得《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的政策文本產生「討論、修改；再討論、再修改」的過程（胡鞍鋼，2010：13）。我認為這樣的五年規劃編制程序其實提供一個平台，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在一黨專政前提下，產生對於政策理論與實踐的認識過程。這無疑彰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下的一種特殊的認識論切入，形成獨特的學習制度平台，進而影響理論與實踐政策的不斷推動。

胡鞍鋼、鄢一龍（2010：37-38）兩位學者的進一步說明，更能突顯五年規劃此一系統編制程序其實仍受到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導引。他們首先強調歷次五年計劃（規劃）的制定與實施，都是一種「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多次循環往復，也就是由五年計劃的戰略政策來指導實踐，卻又根據實踐來不斷調整政策認識的過程。這基本體現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理論與實踐不斷循環的特點，如此方能面對現實條件的限制所造成的錯誤。

同時兩位學者強調十二五規劃具有「前瞻性研究」與「歷史維度」。他們認為十二五規劃基本上具有三十年尺度、六十年尺度、以及長時段歷史尺度分析，方能對中國國情加以瞭解，進而有前瞻性戰略的制定。這基本上也體現中國辯證

²³ 以下簡稱《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

唯物論範式極為重視歷史經驗過程如何為我所用的認識論邏輯，同時延續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就是以主體性思維來引導對於中國長時段結構的撞擊。

關鍵在於胡鞍鋼（2010：13）指出，從五年計劃轉變到五年規劃的制度發展過程，基本上成為中國共產黨基本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實施的最佳案例，亦即五年規劃編制程序呈現為一種「民主、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過程。

我認為該位學者將五年規劃編制程序與中共組織原則進行關係性說明的看法，使得我們能發現五年規劃編制程序背後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基礎。首先，民主集中制是中國一黨專政的基本組織原則，正如胡鞍鋼所言，是屬於毛澤東的政治創新，其思想泉源來自於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所撰寫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如前文所述，我們如果將毛澤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行動者原型，那麼關鍵就在於毛澤東所給與我們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遺產。我們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可以發現毛澤東如何使用辯證唯物論範式作為論述的基礎。

毛澤東（1957）首先彰顯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中，關於主體思維能動性與客觀社會條件限制的交互作用；他提及：「在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這表示，所謂的自由與民主必須根據微觀主體所處的客觀社會條件限制底下，進行主體思維能動性的發展，卻不能依附於西方意義底下的自由主義教條。其次，毛澤東在該文的論述，也進一步彰顯必須關注社會運動的內在矛盾的認識論旨趣。該文指出：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麼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

這說明所謂的自由與民主發展，基本上是複數，並非只有單一的西方發展模式，關鍵是要認清中國內部的國情，特別是以「社會運動內在矛盾」這樣的思維邏輯去釐清中國在自由與民主發展上的特殊性。

再來，毛澤東在該文始終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該文指出：

「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

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不可能完全依照馬克思的決定論部份進行歷史的發展，但是毛澤東指出一黨專政的集中指導，始終是面向社會主義世界觀的，亦即現有的資本主義社會仍有問題，必須以社會主義的本體論基礎去發展未來。毛澤東在該文也強調：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

這也進一步說明毛澤東的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最後，毛澤東更在該文進一步提出國家計畫與辯證思維邏輯的內在關聯：

「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

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我認為胡鞍鋼將五年規劃制度與民主集中制度進行兩者間的靜態關聯，卻沒有突顯一種基於辯證唯物論範式所具有的內在關聯性。依照胡鞍鋼的看法，會以為五年規劃是從民主集中制所產生的一種制度延伸。但其實應該從方法論層次的內在關聯來看，就可以發現民主集中制此一靜態組織原則並不能全然保證五年規劃制度能夠形成導引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而是民主集中制與五年規劃所共有的內在聯繫，亦即在一種方法論導引下，能不斷促發五年計劃制度在改革開放時能面對轉型的社會經濟結構、並促發動力系統的更新與建立，以進一步促成拉抬社會的可能。這樣的說法，會使得五年規劃的動態編制程序，更有意義。

進一步，可以依照胡鞍鋼（2010：15-22）說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的編制程序，來看出五年規劃制度如何在編制程序的過程中，成就其為一個動力系統，並且彰顯背後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導引。

〈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編制的初步發展，是由中共中央政府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對十一五規劃進行中期評估，這包括各部委組織對該本部門十一五專項規劃實施情況所進行的評估，以及地方各級（主要省級）政府對該本級政府的十一五規劃實施情況評估，更包括委託專業第三方以各自的視角進行獨立分析的評估報告。然後深入基層透過各種研究形式進行實地訪查，再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經委員會做專題匯報，最終才起草〈十一五規劃實施情況中期評估報告〉，

並向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報告，同時附上三家獨立評估報告摘要。

透過胡鞍鋼的說明可知，委託第三方進行專業評估是在十二五規劃才有的創新，這表示中國五年規劃的程式化編制過程，仍隨著時代更替而不斷進行更新，這突顯該系統的動態發展特徵。同時光只是第一步驟，就可以看出中央與地方政府作為一個發展動力主體所具有的連結關係；此外也可以看出五年規劃的認識論基礎，就是透過五年規劃程序所形成的學習機制，在面對歷史經驗過程如何為我所用的思維邏輯下，先進行對十一五規劃的反省，以作為進一步改革政策的動力。

接著就是在中期評估基礎上，進行前期研究。這個前期研究很顯然的具有社會動員的效果。胡鞍鋼（2010：16）說明：

「二〇〇八年底至二〇〇九年初，國家發改委提出了包含 8 個領域 39 個題目的十二五規劃前期重大問題，向全社會進行公開招標，其中有 60 個單位的選題入選，加上直接委託研究，發改委系統內部研究，選題大約有數百個之多，參與的專家達數千人、研究人員達上萬人，形成的研究報告文字在幾百萬字。上述研究成果是直接為起草〈十二五規劃綱要〉服務，這相當於「自下而上」驅動的政策制定模型。這是世界最大規模的公共政策『集體研究』、『密集研究』和『競爭研究』，國家『花錢』購買『公共決策知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司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提出〈“十二五”規劃前期重大問題研究公告〉時，也確實明確指出前期研究的工作是爲了：「提高規劃編制的透明度、民主參與度，廣泛凝聚社會各界的智慧」。那麼，從規劃綱要的前期研究來看，正彰顯出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引導動態發展法則，即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整體研究發展動力以進行系統性發展，並且證成《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此一政策文本的理論與戰略力道。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六日在中國發展改革委召開新聞記者會時，當時規劃司司長李守信（2008）便提到，十二五規劃的前期研究，是面對與解決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突出宏觀性、政策性方面問題，以尋找破解這些問題的路徑、方向，並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舉措。這些前期研究的實踐結果，反應在《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文本第二篇之後的所有內容之中，並形成在未來具體實踐的政策理論依據。於是形成在文本編制程序上的理論與實踐辯證過程，以及日後形成的政策文本與具體政策實踐的辯證過程，促成發展動力系統的形成。

至於《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第一篇主要是總論部份，包含中國現階段的發展環境、以及政策指導思想、還有政策實踐的主要目標、以及如何進行政策導向。這表示中國共產黨必須針對多方意見的提供之後，開始進行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核心思想概念的建立與鋪陳；當中最核心的部份，就是強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轉型」，這也與下述胡鞍鋼所提的規劃編制程序的第三步驟有關。

根據前期研究成果，國家發改委開始起草規劃綱要基本思路的意見稿，在徵求各方面（指各地區、各部門及專家）意見後，向黨中央、國務院匯報。於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始詳細討論基本思路，達成政治共識，以進行政治動員。那麼，規劃編制程序基本上就包含五年一次的政策思想與理論的論述整理，而且是密切關聯於共產黨中央精英階級的少數掌握權力者，只是這些政策思想論述的源頭還是來自於社會。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確定核心思路後，開始主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草案）〉的提出，這其中包含由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發改委以及各部門人員參與，並組成專題調研組分赴各地調研。其次主要領導人也會帶頭調查研究，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和其他委員分赴各地進行專題調研，由中央領導人與地方負責人進行直接溝通。之後在正式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由國務院總理代表中央政治局作〈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建議的說明〉，全會審議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並正式對外公布。至此，中共黨中央基本上出現收攏動作，並形成〈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的文本初稿，然後在全國改革發展工作會議上與各地方、部門、行業協會溝通，再次直接聽取意見，並進行不同規劃之間的銜接和協調。

待五年規劃草案形成後，國家發改委組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的專家進行討論、諮詢和論證。二〇〇五年十月，中共國務院明文規定，要實行編制規劃的專家論證制度（胡鞍鋼，2010：20），這基本上還是顯現中國共產黨對於規劃編制程序的動態發展態度。當然，除專家論證，還要廣泛爭取意見，因此規劃編制程序有包含公眾參與制度，強調規劃編制部門應當公布規劃草案或舉行聽證會，以聽取公眾意見。國務院也會召開規劃座談會，直接聽取各方意見。等到上述基礎都已完成，又再次回歸到中央政治局審議以形成草案，並正式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我們可以發現產、官、學三者的互動都被囊括在《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編制程序之中，甚至包括一般公眾，並且形成一再反覆論述的辯證過程。最後，在全國人大審議過程中，由全國人民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進行分組討論、提出重要修改意見，在此基礎上由大會審議並正式批准《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進入實施階段。

透過編制程序過程的描述，於是彰顯五年規劃作為一個動力系統所具有的意義，並同時指出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下動力系統之間的內在關聯性。胡鞍鋼、鄒一龍（2010：39）兩位學者指出對五年規劃的編制方法、思路和目標進行重大的變革，一般需要十到二十年的時間。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以及「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成型，連帶的對舊有中國計畫體制產生共變過程，使得五年規劃成為一個關鍵的、帶動社會轉型發展的系統，不僅去除過去那種完全包含宏觀與微觀計劃經濟的錯誤，並且更加擴展宏觀戰略性的意義，以及產生引導國家面向中長期發展的效果，並確定政策文本的有效性，畢竟即便是一黨專政，但規劃的提出

卻是社會參與下的產物。

只是，公共決策的制定，並非只是紙上研究的產物，也不僅僅是透過論述就能達到更完善的發展。我們在探討五年規劃的編制程序過程中，比較偏重政策文本建立的系統化程序描述，但公共決策的制定需要的是實踐的反饋，以使得公共決策具有更強大的導引力量。因此，若要更完整說明中國國家發展計畫系統如何能進行拉抬社會的可能，就必須把實踐層面的部份補齊，方能徹底描繪此一系統的作用力。

(二)、試驗動力機制

管漢暉、林智賢（2011）兩位學者點出很多內地學者都可能認同的說法，就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變遷發展，仍是一個關鍵因素促進整個中國改革開放能持續下去，他們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一個起自底層農村所開始的改革。但正如兩位學者的進一步說明，中國政府作為經濟生活中影響力最大的經濟主體，始終沒有完全退出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國政府畢竟會在一種「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之中，一再地總結經驗，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產生一種強化導引的積極作用。

的確，一種自下而上的實踐具有莫大的重要性，但依照本文所關懷的方向，我不禁仍是要詢問，中國中央政府如何能引導這種起自地方、地區的實踐、並能一再地、積極地產生出實踐的運動？

同濟大學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朱德米（2004：68）指出，在中國起自八〇年代的改革過程中，一些新因素導入中國的改革發展，從事後看來可說是至關重要。他認為最明顯的就是對外開放，特別是經濟特區的設立，開始給中國現代化的探索提供新方向。或許我們就從經濟特區的歷史發展著手，以設法找尋出地區實踐與中央導引之間的關係，並針對此一關鍵問題提出詮釋：究竟中國的計劃經濟體

制改革與特區的實踐發展有著怎樣的共變關係，又是否能成就一個拉抬中國社會的系統？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施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該條例第一條說明：「為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隨後，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這些城市與廣東省的經濟特區於是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朱德米，2004：94）。經濟特區的誕生，就是在中國劃定一個地域範圍，其對外經濟活動較其它地區而言，採取更加開放的特殊性政策。但是，經濟特區的解讀或許不僅只於此。

中國經濟特區的建立很顯然地促成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的成型，並使中國進入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浪潮之中。學者朱德米（2004：68）指出，當中國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額增長時，才表示中國正在邁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且也由於中國需要利用國外技術，才有可能做出設立經濟特區的決策。朱德米（2004：70）進一步強調：

「設立經濟特區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模式。經濟特區是對一種新制度的探索，來源於中央上層領導人的觀念更新和地方領導人解決實際問題努力的結合。這種創新模式成為中國改革時代採用最多的方式」。

我認為可以延伸說明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央與地方政府顯然扮演兩個重要的發展動力，而在本文提出的「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成型後，基於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所具有的持續性辯證發展關係，其實更加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主要動力體的作用力，同時促使理論（中央）與實踐（地方）的持續性循

環。在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底下，一種理論與實踐不斷辯證、以面對現實條件限制所進行的除錯循環的運動節奏中，經濟特區的建立，基本上等於是提供一塊試驗的時空區域，一個試驗的容器，以使得中國的兩個基礎發展動力能夠進行因應各種環境變遷所產生的制度創新。特區模式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發展，可能不僅僅是一種模式而已，它更可能是拉抬中國社會系統機制的一部份。當然，這需要進一步的論證。

在經濟特區初步發展階段，中央理論與地方實踐的循環早已產生。當時位居中共國務院主管對外開放工作的官員、被譽為「改革開放的工程師」的谷牧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等單位舉辦的形勢報告會上，發表題為〈關於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的報告。透過朱德米（2004：96-105）對於該報告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該官員所提的報告具有特殊意義。

首先，該報告提出中國當時面臨的具體情況，亦即面臨資金不足、技術落後和管理缺乏的問題；並強調應認識與釐清經濟特區運行過程中出現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對於在特區實踐上問題的認識與釐清，並不表示與既有理論的認識無關。谷牧先生必須進一步論述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依據，說明經濟特區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以及解釋吸收外資與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性質的關係。

這表示，地方經濟特區的建立作為一個觸媒，已經引發中央對於理論進行重新詮釋的過程，甚至必須開始去除不必要的意識形態干擾。這樣針對經濟特區的發展所產生的理論層次論爭，在八〇年代的中國持續進行，直到一九八六年開始，經濟特區發展方向的爭論基本上才結束，經濟特區朝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戰略也才基本確定。

也正因為經濟特區是建基在理論與實踐循環的辯證發展上，因而使經濟特區的宿命始終必須矗立於實踐的前沿，以更積極的指向未來，而與非特區的區域產生區別。一九八二年六月二日，中共國務院為加強對經濟特區的監管，確定建設「深圳特區管理線」，到一九八四年八月開始試行管理。至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

「深圳經濟特區管理線」才正式啓用。朱德米（2004：105）認為，這是政府政策調整的一個手段，其中設置管理線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在一定範圍內控制經濟特區的「試驗效應」對全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

於是這個政策表示，在管理線內就可以進行各種政策試驗，同時因為侷限在一定範圍內，所以不會對整個社會造成沖擊。亦即，改革風險和試錯成本都控制在一定區域內（無形，2010：32）。那麼我認為該項政策無疑是把經濟特區建立成一個「試驗的容器」，經濟特區其實成爲中國一黨專政方法論導引下的特殊試驗道具。

朱德米認為這種經濟特區的建立，是因爲中國必須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因而必須推進更徹底的改革，所以自然必須有著實驗的區域以促成實踐的發展。他把這樣的經濟特區發展脈絡說成是：

「經濟發展遵循著政治的邏輯」（朱德米，2004：107）。

然而朱德米所說的「政治邏輯」概念其實非常含糊籠統，而且也沒有說清楚真實的意思；更何況要探究歷史動態邏輯的意義，我認為還是必須在方法論層次進行瞭解。如果把經濟特區的建立及其歷史發展脈絡，以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角度來看待，那麼就可以發現其內在關聯。經濟特區的發展所採用的動態認識邏輯，就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的反覆循環過程，一種於外在客觀條件限制下，進行試驗性的反覆除錯過程。如果以此角度來看，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以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也就是在方法論層次進行對於特區發展的歷史詮釋，將從「特區」到「綜合試驗區」的歷史嬗變過程得到明顯證成。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國務院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

「我們要繼續鞏固和發展已經形成的對外開放格局，充分發揮現有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開放區的作用，同時在這個基礎上對廣東、福建和海南島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建立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區，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積累經驗」（朱德米，2004：115）。

那麼從該報告中，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要把經濟特區建成「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區」，這就是要求地方經濟特區能夠提供更多在實踐層次的經驗，以促使中央理論與地方實踐循環的辯證邏輯能動態持續下去。

至一九九二年後，隨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的逐步成型，使得對外開放進入更為激進發展的狀態，在這樣的經濟增長結構背景下，朱德米（2004：122）認為經濟特區試驗與創新的價值意義開始擴散。像中共國務院正式批准海南洋浦開發區；而上海在原先浦東新區的政策基礎上，又給了更多項目的審批權和配套資金的籌措權；長江沿岸地區也加入到開放行列；中共國務院於是批准設立更多類型的開發區。

那麼我認為，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中國改革發展歷史進程中，在陸續出現本文探討的「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以及「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等能夠拉抬中國傳統社會的動力系統的同時，「試驗區」此一動態發展機制，必須將其納入動態系統探討的範圍，以一同關注。

明顯的事實是，新世紀初的十年，試驗區的據點在中國不斷誕生：二〇〇五年六月上海浦東新區形成、二〇〇六年五月天津濱海新區形成、二〇〇七年六月重慶和成都新區形成、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形成、二〇〇九年五月深圳市新區形成、二〇一〇年四月瀋陽經濟區形成、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山西省亦成爲綜合配套的改革試驗區。而且這些綜合試驗區已經不單只是面對「對外開放」的任務，基本是具有「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存在（無形，

2010：30)。這表示試驗區的制度已經蔓延、深入到中國內部，並成爲一個持續存在的動力發展機制。

如果從特區到試驗區這一歷史發展脈絡來看，那麼經濟特區從初期發展的意義上，就是依據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所形成的一項特殊動力機制，也就是說經濟特區發展方向並不是一個始終特殊的、有別於大部分中國區域的、脫離中央政府控制的一個「特」區。

朱德米（2004：129-130）指出，早期經濟特區所享有的優惠政策，在中國諸多試驗區出現之後，使得早期特區優惠政策在全國進行推廣與普及，使一開始的經濟特區不再是享有優惠政策的唯一地區。同時中央政府也持續的站在制高點統籌與引導試驗區的發展，並且視情況減弱、與趨同各個試驗區的優惠政策。

朱德米點出一個最關鍵的制度發展，就是一九九四年中共中央政府統一推行的財稅體制改革，就是本文所提出的「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建立之後，開始使早期的經濟特區和內地一樣，徵收稅率較高的增值稅，沖淡低稅率所得稅的優惠作用。我認爲這樣的說明基本上也點出「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與試驗區機制的關聯性。亦即特區、乃至試驗區的發展始終不是脫韁野馬，它們只是在中國一黨專政導引下所產生的一個試驗容器，特別是在「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建立後，中共中央成功地扭轉「弱幹強枝」的現象，讓試驗區機制成爲中國一黨專政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整合的一部份。

正如羅清和、李佩、羅銳三位學者（2010：210-211）強調的，一些經濟特區不「特」是已成的現實，這表示以前針對特區的優惠政策會逐漸普惠化，但是還在進行試驗的區域，有些政策甚至比早有的特區更「特」。亦即在進行試驗的區域，「試錯權」就是該區域特有的權力，一方面享受改革失敗的免責權，一方面鼓勵大膽創新，又一方面使特區或試驗區成爲社會經濟改革的首選地。

因此，只要面對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凡是需要試驗，往往就會選擇特區或試驗區作爲試點的優先參考。因此，我認爲經濟特區或試驗區的貢獻，就在於它

們的試驗性質，一種依附於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所具有的、根據外在現實條件以進行除錯的動力認識邏輯。

朱德米（2004：135）認為經濟特區的決策是一種觀念創新的產物，他同時強調這樣的觀念創新，是兩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種力量是反思「文革」，乃至整個建國以後社會主義實踐的錯誤；另一種力量是在與外部世界接觸的過程中，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潮流擴散。這兩種力量在特定的時刻裡，成為觀念變革的推動力」。

但我好奇的是，這兩種力量是如何能產生相互作用的效果，卻不會產生相互拉扯的效果呢？本文曾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一個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範本來進行討論，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於文革的反思，基本上突顯方法論導引的作用力。亦即，中國改革開放如果沒有首先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部在辯證唯物層次上的論理過程，是不可能有接續的經濟改革與開放的發展。其次，透過本文於上述對於試驗區機制的論證，也可以體現中共如何在方法論引導層次進行特區的對外開放。因此，朱德米所提的兩種力量的交合，只是呈現出兩種力量作用的現象，卻沒有去說明背後真正的內在聯繫是什麼，其實關鍵正是中國一黨專政的方法論導引所產生的結果。試驗區的建立，正是方法論導引下的產物。

但正如朱德米（2004：137）所強調的：「經濟特區的實踐成為新觀念傳播和擴散的載體」；亦即試驗區機制是一個宣傳新概念、新實踐的利器、手段。而這種利器、手段，使得新觀念能進入到中央政權體系之內。中共國務院設立直接管理的經濟特區辦公室，就是使得試驗區機制能為中央所用的一項標誌。朱德米（2004：137）指出國務院經濟特區辦公室擔負著經濟特區與國家各機關之間的協調工作；此外，另一個主要機構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亦承擔經濟特

區重大政策的決策工作。於是這些組織體系成爲新觀念實驗的主要承擔者。由於試驗區的發展能夠納入中央政府的工作統籌範圍之中，也象徵著試驗區機制能夠成爲中共一黨專政的整合動力系統的一個部份。

再來，朱德米（2004：139）也提出一個關鍵說法，那就是中國經濟特區的經濟成分「主要以國家（各部委）和其他各省投資的企業和外資企業爲主，民營經濟力量薄弱。這種所有制的格局也決定了經濟依附於政治、資本與權力高度結合的發展模式」。這種說法，正如本文所強調的，由於中國「公有制爲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發展成型，使得微觀企業能獲得對企業經營權力的同時，仍能讓中共中央、地方政府的權力滲透到微觀企業主體，使得中共一黨專政能以系統性的方式掌控微觀動力主體，進行社會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甚至引導微觀主體在試驗區進行大膽的實踐創新與變革。這也顯示中國一黨專政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內部各系統間的相互關聯性、作用性，也才能稱其爲一個整合的系統。

最後，由於試驗區機制的存在，基本上就是把試驗區在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改革上所進行的創新成功經驗，最終推向全國（羅清和、李佩、羅銳，2010：211），因此可以說「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正因爲有著試驗區的機制，使得這個動態系統本身會產生持續性的轉變，進而符合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導引動態發展法則，亦即動力系統本身也需要配合外在環境條件而進行變化。

（三）、計畫編制程序與試驗機制的結合

上述對「國家計畫編制程序」、「試驗動力機制」兩個部份的個別探討後，我現在將這兩個論述內容視爲一個整體來看待，並試圖說明：沒有中共中央在理論指導下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的政策文本，就不可能進行進一步總體、系統的國家發展實踐；沒有地區的實踐試驗機制，也不可能進一步促發中央對於總體計畫的

構思與成型。因此，兩者實乃成就一個整體，兩個機制構成一個整合的動力系統，我稱之為：「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

胡錦濤（2007）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點出一些重要的話語：

「要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認真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加大對自主創新投入，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更好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或許不免有斷章取義之嫌，但是可以透過此一官方文本的幾句話，作為一個前導敘述與詮釋，強調本章節所要說明的論點。

那就是自從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進行市場機制的運作後，關鍵並不是「市場機制」此一被某些經濟學家視為是「通用模式」的引進造就中國發展的奇蹟，而是中國政府如何建構出一個動力發展系統來導引市場機制的發展與中國內部的轉型。也就是本文所強調的以「宏觀調控管理系統」作為核心，所建立起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此一動力系統的運作是中國改革開放下的成就、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具體化證成。

而在這個核心動力系統之中，一個關鍵的系統，就是中央規劃與地區實踐的持續辯證過程所成就的「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它使得中央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規劃與地方的自主創新發展產生一個整合，以面對國家中長期的發展、以及辯證唯物論的歷史辯證過程。現在必須透過歷史鏡頭，舉出一些例子來看出中共國家規劃與地區創新實踐的關聯性。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國務院頒發〈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這一獨特試驗區的提出，是中國為了面對全國內陸型經濟開發，所擬定的一個戰略試驗區，其規劃範圍包括陝西省西安、銅川、寶雞、咸陽、渭南、楊凌、商洛部分縣和甘肅省天水所轄行政區域，面積總共 7.98 萬平方公里；直接輻射

區域包括陝西省陝南的漢中、安康，陝北的延安、榆林，甘肅省的平涼、慶陽和隴南地區（羅清和、李佩、羅銳，2010：216）。其實關中——天水經濟區，是中共《國家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中確定的西部大開發三大重點經濟區之一。

二〇〇七年三月一日，由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所公佈的《國家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中，便強調中央政府要引導重點區域進行加快的發展，其中就包括「成渝經濟區」、以及「關中——天水經濟區」。該政策文本並指出：關中——天水經濟區是「依託西安、咸陽、寶雞、天水等城市，重點發展高技術、裝備製造工業、航空航太工業、現代農業和特色旅遊產業，加快建設西（安）咸（陽）經濟一體化示範區」。也就是說，中共中央政府希望透過地方「關中——天水經濟區」的實踐與試驗，作為一個可能出現的示範，並以此示範促進整個西部大開發的戰略。

至於《國家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此一文本，又與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有關。該文本說明：「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編制《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

所以我們就必須再回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的內文，在十一五規劃綱要內文中第十九章的開頭便說明：「堅持實施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其次，在第十九章第一節又更為詳盡的說明如何引導中國西部的大開發。

那麼透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中共國家社會經濟規劃其實與地區試驗區有著實質上的關聯，並且顯現中央政策文本與地區實驗實踐的關聯性。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將中共的五年規劃以及實驗區的發展進行切割與分析，兩者其實是相互聯繫與支持的。當然也如前文所言，「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

以及「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其實扮演重要的角色，促成「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的進一步發展。

我們可以透過「成渝經濟區」作為另一個例子，來說明中共中央計畫與地方實驗實踐的歷史辯證過程，以及指出其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內在關聯。在《國家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政策文本中提到：「成渝經濟區——依託重慶和成都兩個特大城市，重點發展重大裝備製造、高技術、水電、特色農副產品生產加工、天然氣化工、特色旅遊產業，加快建設長江上游生態屏障。進一步發揮重慶直轄市的功能和作用」。

如果只是單純透過這句話，並無法看出中國實驗區發展的特殊性，甚至很可能會有人以為這樣的經濟區開發，實在與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經濟區的開發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也只是著重經濟發展面向而已。因此，我們必須挖掘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內在關聯。

「成渝經濟區」的經濟發展背後，還包括中共中央必須面對現階段社會經濟的總體結構矛盾所進行的實驗性發展策略。而且這樣的一個試驗容器的成立，也並不是完全由中共中央所下達的直接指令。首先，是由重慶市政府、四川省政府上報中央國務院，在二〇〇七年兩個地方政府單位提出兩個上報函，²⁴然後國務院才同意批准設立重慶市和成都市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顯現中央與地方在政策執行上的互動過程。

二〇〇七年六月七日，由中央國家發展改革委下發〈關於批准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以表達批准同意建立成渝試驗區的內文中，強調要透過兩個地區的創新與試驗，「儘快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以發揮示範和帶動作用。這表示中共中央在面對戶籍制度所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內在矛盾，還是必須透過試驗方式進行

²⁴ 〈重慶市人民政府關於申請將重慶設立為國家級統籌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函〉（渝府函〔2007〕23號）、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關於申請將成都市設立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函〉（川府函〔2007〕53號）。

改革與創新，於是賦與成都、重慶地區「試驗容器」的特殊地位。

正如羅清和、李佩、羅銳（2010：211）所強調的，中央政府選擇試驗地「是根據各地區的不同特點選擇適合試驗的地區，這使得改革先行試驗不再是傳統經濟特區的特權」。試驗區的發展也因此彰顯出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引導作用，中共中央在關注當時社會發展的主要內在矛盾之時，在行動主體的思維能動性與客觀社會條件限制的辯證過程中，是以試驗區當作一個起點，進行理論與實踐的不斷循環，並與中共中央的發展規劃產生整合性的動態發展。

在成渝試驗區成立之後，於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國務院頒發〈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所謂的「意見」，便是一種政策的引導，但在實踐上仍需要地方政府進行試驗與創新。

在該意見文本中的「指導思想」部份，中央政府指出該試驗區的成立，為的是要解決中國最棘手的「三農」問題。本文已於第四章強調，「三農」問題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持續性，基本上正是中國共產黨以方法論引導思想與長時段結構撞擊的一種表態。而在該文的「基本原則」部份，則指出中央政府認為地方政府應該針對「三農」問題的解決，努力做好「城鄉統籌」的實驗實踐。

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讓一部分人富有起來，但是中國長時段結構的問題並未完全得到解決，並且反應在轉型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現階段矛盾上頭——城鄉差距。

由於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的發展，使得中國東西部地區差異擴大、城鄉差距也跟著擴大，在相對上造成長時段的「三農」問題變得更為棘手。畢竟已經不是所有人都是窮困的，而是在十三億人口中，仍有八九億農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倘若無法改善，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就會出現問題。

蘇偉、楊帆、劉士文（2011：7-8）指出，從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七年之間，中共雖然重視三農問題，但中國全國商品零售總額中，鄉、以及鄉以下所占比重，仍然從大約 25%降到約 20%左右，也就是說鄉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只消費中國 1/5

的商品與勞務。那麼，重慶與成都能形成「城鄉統籌」的試驗區，便是因為該地區的發展能作為中共中央面對長時段、以及中程階段結構矛盾的一個參考。以重慶為例，該直轄市便是一個中國總體性社會經濟結構矛盾的縮小案例。

重慶是一個直轄市體制，幅員面積是 82,000 平方公里。其他中國的三個直轄市面積加起來還只是它的一半，中國東部沿海的江蘇和福建也就是十來萬平方公里，和重慶差不多，寧夏自治區也大約只有 6 萬平方公里，所以重慶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直轄市（蘇偉、楊帆、劉士文，2011：151）。重慶可以說是一個農民直轄市，3,200 萬人口之中，有戶籍的城鎮人口只有總人口的 1/3，此外重慶直轄市非常窮困，其 40 個區縣，有 20 個貧困縣，其中 17 個是中國國家級貧困縣，直轄時的絕對貧困人口有 360 萬（蘇偉、楊帆、劉士文，2011：151、156）。這使得重慶直轄市的城鄉差距很大：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大約是 3.3：1，重慶市則是 4：1；全世界平均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大概是稍微大過 2：1，發達國家則接近 1：1（蘇偉、楊帆、劉士文，2011：7-8）。

在前文提到，由於中國產生 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於是使得東部與中西部結構矛盾日增。人均 GDP 最高的上海相對於最低的貴州，差距高達 10 倍以上，是世界之最（蘇偉、楊帆、劉士文，2011：9）。這也是為什麼中共要在十一五規劃中強調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性。同樣的，重慶市也是反應全國地區性矛盾的一個縮小範例，因為重慶市自身也有地區矛盾，分為：一個較發達的「老重慶」地區、直轄後新進的三峽庫區（大巴山區）、武陵山區（五個縣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差距問題。重慶主城區是重工業區，和三峽庫區、武陵山區的發展差距比全國地區差距大得多（蘇偉、楊帆、劉士文，2011：9）。因此，中共中央之所以允許重慶成為城鄉統籌的試驗區，是因為在政策發展上、在理論與實踐辯證過程上的考量，我們必須將其視為一個整體發展來加以看待。

於是由中央基於全國的結構矛盾與相應試驗區的類比，結合五年規劃的考量，開始進行理論、政策層次的引導作為之後，實際的試驗與創新實踐則仍是由

地方政府加以執行。根據中共中央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批准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以及〈國務院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兩個政策文本，重慶市政府遂結合地方實際客觀條件的狀況，開始發揮其主體能動性，在二〇〇九年制定一份綱領性文件：〈重慶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渝府發〔2009〕68號）。於該文件中，重慶市政府進行探索並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十二項新機制，以進行地區的試驗與發展。同時，該份文件隨後獲得中共國務院的批復。

那麼，可以從重慶試驗區的例子發現，中共中央的社會經濟規劃實際上與地方的試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且一再地展現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認識運作邏輯，形成中央理論與地方實踐的不斷辯證過程，以面對社會結構運動的持續性內在矛盾。

因此，「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實際上包含兩個部份。其一，是中央與地方在理論層次的論理與辯證過程，以進行中央社會經濟規劃的編制程序，最後定下每隔五年的發展規劃。其二，是中央與地方在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過程，以使得五年規劃與地區試驗能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同時也可以這麼說，「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其實正彰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世界觀與認識觀，並且透過該範式產生與其他系統的內在聯繫。

五、以中國證券市場歷史發展為例

經由前文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時期的社會事實陳述，可以發現一個由四種組成部份且依附於一黨專政下的動態系統。此一動態系統之核心思維邏輯，就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透過此一方法論基礎，一黨專政開始著手建立起合理化的行動取向，以促發中共中央與地方政府辯證動力的持續進行、促發微觀主體動力的持續動態發展、促發短中長時期的試驗與規劃循環機制、並成就一黨專政

宏觀調控的可能。

故而，在面對中國所做出的系統定義，是依據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作為其背後的行動思維邏輯，而體現的實際動力系統化現象，分別為：「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宏觀調控管理系統」、「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這四個系統我統稱為「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於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在方法論基礎上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系統化操作的可能，形成一種將方法論重新包裝後的制度創新與連結機制。

無可諱言，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仍是以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作為基石，那麼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不得不面對資本主義的核心動力，那就是西方金融制度與技術的模仿、學習與創新。只是我們一旦從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脈絡觀之，可以發現金融發展背後仍然受到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導引，使研究者可透過中國證券市場的形成，統合看出「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及其系統化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所具有的強勢力道。

因此，我將以中國證券市場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脈絡，作為一個綜合論述的例子，以試著說明「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是如何成就一個中國特色的證券市場。同時也更能強調，一個金融工具與技術學習的背後，其方法論的認識與實踐，將扮演一定程度的關鍵性角色。同時也可以看出這四個關鍵動力系統對於促發制度創新所具有的影響力，而使得中國特色全然彰顯。

其實研究中國證券市場的大陸內地研究者將會不約而同的確認，有一隻「閒不住的手」左右中國的證券市場。陸一（2008：14）探究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證券市場的發展歷史之後，認為中共中央在取得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發展主動權與行政主導權的同時，也讓中央政府走入市場，成為證券市場中既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的特殊利益主體。

中共中央走入證券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在維護一黨專政的合法性與有效性。中國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後進行股份制改革以及各類債券、股票發行，

已經「將越來越多老百姓的錢圈進各類企業、國庫和市場，於是面對證券市場的所有政府行爲，都意味著直接面對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陸一，2008：58）。故而中國一黨專政在面對現代化轉型發展時，必須更爲主動的介入證券市場的制度建立與運作過程，以求得經濟穩定，進而換得政治穩定。這也說明我們無法截然地將政治與經濟劃分開來進行論述。

當中共中央決定投入證券市場之中成爲主要的遊戲玩家，這使得中央政府在二〇〇一年以後開始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因爲，「要讓市場聽政府的話，就必須有聽話和受控的機構投資者隊伍」（陸一，2008：58）。那麼從陸一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探究之中可以發現，中國一黨專政之所以投入證券市場之中成爲重要的遊戲玩家，最主要的是因爲中國共產黨是以關注整體社會問題作爲一個切入點，將市場作爲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藉由市場手段來促進社會轉型的同時，也介入市場之中，透過政治選擇來穩定市場經濟的發展。

這樣的思維邏輯，如同本文一直強調的，並不能用凱因斯主義來進行詮釋，因爲其所依據的思維邏輯與方法論基礎，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即著重證券市場的發展如何能在歷史經驗過程中爲共黨所用，並在理論與實踐不斷循環過程中，面對現實條件限制所造成的錯誤，同時衡量思維能動性與客觀社會條件限制的交相作用，以關注社會運動的內在矛盾。

那麼，即便是在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仍將注意到「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所發揮出的作用力。亦即，中國證券市場作爲一個功能部門，其背後的推動力是來自四個以「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爲基礎的系統所產生的結果。以下我將根據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歷史脈絡來進行論證說明。

一九九一年一月，由於在股票市場劇烈波動需要平抑股價，深圳市證券市場領導小組決定建立深圳市證券市場調節基金，並規定管理辦法。這是中國證券市場第一次設立政府干預基金，政府開始主動買賣股票、調整市場指數、干預市場（陸一，2008：35、36）。只是這樣的干預形式還是屬於地方層次。

到一九九二年八月，深圳市有關部門計畫向社會公眾發行面值 5 億元人民幣的新股票，採用認購抽籤表的方式認購。消息傳開，各地股民紛紛趕到深圳想要認購新股。至八月十日傍晚，部分買不到抽籤表的股民開始聚集、圍觀，然後沿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遊行，堵塞深南中路，發生混亂，使中共武警出動維持秩序，史稱「深圳八一〇事件」。

由於證券市場發展促成社會矛盾激化，使得在該事件之後的兩個月，中共中央開始著手接管市場主導權。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中共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成立，該辦事機構是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簡稱 CSRC）。一九九八年證券委與證監會合併，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爲中國證券市場統一的中央政府監管機構（陸一，2008：50）。

陸一（2008：50）指出，在中國證監會成立前一個月，以國有企業爲主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成立三大極具政府行政背景的證券公司：華夏證券有限公司、南方證券有限公司、國泰證券有限公司，其注冊資金各十億元人民幣。此一獨特事件，便是日後中共大力超常規發展受控機構投資者的先聲，使中央主導權能夠擴大。於是中國證券市場初期成立的老基金、以及由地方政府主導成立的證券公司等機構，都逐步在中央政府取得證券市場發展的主導權後，開始用新基金、以及中央政府主導設立的大型證券公司等受控機構群體來替代，「以便政府的政治目標和調控命令得以高效率的貫徹」（陸一，2008：116）。這樣逐步邁向中央集權的發展路徑，使得中國證券市場成爲「宏觀調控管理系統」可以掌控的範圍，並成爲「宏觀調控管理系統」可運用的技術手段之一。

再來，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歷史過程，本身就是「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所造就的產物。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主席江澤民就證券市場究竟是否應該繼續執行試點的問題，與當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劉鴻儒進行談話。劉鴻儒特別對江澤民提出要求，強調改革來之不易，試驗點儘管可以不擴大，但不能撤銷，看能不能「闖出一條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市場的路，但是你要允許

我們試驗，不能給我們扣政治帽子」（陸一，2008：57）。

這樣一種由中央建構理論、讓地區開放實踐與試驗的發展方式，於是持續進行。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成立「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不久後正式名稱改爲「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陸一，2008：20、21）。我們可以發現中共中央的工作始終是理論建設的工作，但是有關證券交易所的籌備工作，在地方政府層面上並沒有完全停止，也就是說試驗交給地方。在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成立後，直到一九九三年以前，證券市場的具體運作制度制定和修改，都是在地方政府和交易所的層次展開。等到操作性強的地方運作制度不斷積累經驗，方能爲以後全國性法規的制定提供借鑒（陸一，2008：30、31）。

緊接著，在深圳、上海兩個證券交易所成立之後到一九九二年，中共中央才開始準備切入證券市場的運作。儘管一九九二年中國證監會成立，但實際上直到一九九七年七月滬深證交所才劃歸中國證監會直接管理，並從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九日開始，根據國務院關於證券監管機構體制改革方案的要求，中國證監會主席與江蘇、上海、安徽等地政府簽署「證券監管機構交接備忘錄」，標誌集中統一監管制度建設啓動。從此，中國證監會才真正對市場具有完全充分的實際管轄權（陸一，2008：96）。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中國證監會在全國各地的派出機構正式掛牌，於是中國證券市場集中統一監管體系也才正式形成，表示中國證券市場統一的垂直行政管理體系最終建成（陸一，2008：97）。

因此透過歷史脈絡，可發現中國證券市場在理論與實踐過程的反覆辯證。地方試驗、中央理論的交相辯證，促成中國證券市場的制度創新與發展。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中國兩個證券交易所和一個報價系統建立，這種制度安排，更多是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的主動發展，中央政府只是推動與認可者。中央政府的作用僅體現於批准證券市場的試點，劃定試點範圍和界限，具體的市場和制度創新，主要由市場利益主體，尤其是交易所和地方政府承擔（陸一，2008：64）。

而當時市場利益的微觀群體，就是以「公有制爲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

中的微觀主體群。也因此中央或地方政府能透過這些微觀主體群的運作，來變革、運作、發展證券市場。甚至如前文所提及，二〇〇一年後，中共中央開始有系統的操縱機構投資者，以方便中央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的運行遊戲之中。陸一（2008：66）指出：

「到一九九五年為止，中央政府只是被動地針對證券市場的具體問題予以干預。直到一九九六年，中央政府才正式把證券市場納入國家發展規劃，形成明確的發展戰略和方針，積極主動地全面介入證券市場，成為證券市場發展的主導力量，證券市場從此開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導、為完成『國企改革』政治目標、為滿足中央政府的利益需要的方向。」

基本上中共的國企改革過程，便是彰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國證券市場不僅因為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擴展而持續發展，同時也反過來促進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持續發展。當中央政府全面掌控證券市場主導權，開始用來解決國有企業困境這樣的政治任務，就極大地改變早先地方政府主導時期的市場籌資維艱狀況。中國證券市場處於早期形成階段時（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九年）總共籌資 19.33 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 3.23 億元人民幣；深圳、上海證交所成立以後（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六年）總共籌資 1,163.74 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 166.24 億元人民幣；而一九九七年中共中央政府接管證券市場主導權以後，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七年總共籌資 17,453.71 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 1,586.71 億元人民幣，是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六年的 9.55 倍（陸一，2008：189）。

最後，我們可以透過中國證券市場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建立過程，看出「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對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影響，同時也能發現中國證券市場如何擴充、強大了「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

中國證券交易印花稅，最初由證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開徵，始於一九九〇年。從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四年稱為「印花稅」，一九九五年後才開始稱為「證券交易印花稅」。印花稅在中國稅收法律定義中最基本的含義，是對經濟活動和經濟交往中書立的憑證加貼印花而徵收的稅種，因此印花稅是一種憑證稅，但在實際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過程上，是地方政府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創造，亦即套用印花稅的書據印花，而設立一個實際上完全不同於印花稅的新稅目，來抑制市場過熱行爲，達到調控目的。而且一開始中央政府只是默認地方政府收取該稅目。（陸一，2008：66、67、69）。

一九九四年，中國開始進行分稅制改革，國務院發布《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提出將證券市場上的印花稅改造成證券交易稅獨立徵收，並規定買賣雙方各徵千分之三，最高可上浮1%。然而當時證券交易稅因配套措施未完善所以沒有正式成立，反倒是證券交易印花稅卻從此依照分稅制改革，形成中央地方共享稅。因此證券交易印花稅原先是爲抑制股票交易過熱而設立，但它實際上就是證券交易稅（陸一，2008：70、71）。

我認爲從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發展過程，其實已經體現中央政府財政收入職能的擴大，也表現出中國中央政府如何透過運作來進行對於證券市場的調控。在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國務院關於調整證券交易印花稅中央與地方分享比例的通知》的官方文件便強調：

「為進一步規範證券交易市場，妥善處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係，增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國務院決定，自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將證券交易印花稅分享比例由現行的中央與地方各50%，調整為中央80%，地方20%。」（陸一，2008：70、73）

爲強化一黨專政宏觀調控，四個月後，中共國務院在一九九七年五月九日又

下發《關於調整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的通知》，將印花稅稅率從千分之三調整到千分之五，並要求將「調整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新增加的收入，全部作為中央財政收入。」

然後中國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又根據國務院的通知，下發《關於調整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有關預算管理問題的通知》，明確調整稅率後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收入的分享比例，亦即中央 88%，地方 12%。

至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國務院《關於調整證券交易印花稅中央與地方分享比例的通知》決定，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分享比例由現行的中央 88%、地方 12%，分三年調整到中央 97%、地方 3%」（陸一，2008：73）。

因此可以說，中國在「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建立之後到新世紀初的發展過程中，已經促使中共中央逐步完全掌控證券市場的發展，並將證券市場的利益為一黨專政所用，進而達成一黨專政宏觀調控的可能，證券市場成為一黨專政的資本來源。

那麼透過上述，可以發現依據「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所形成的四個系統，亦即統稱為「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其實正是一種方法論執行的具體化、系統化表現。它同樣根植於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發展脈絡，而使得中國證券市場具有特殊性。該系統讓馬列世界觀存在於證券市場發展之中，藉由一黨專政進行辯證唯物式的方法論導引，以使西方意義下的證券市場技術與制度為共黨所用，藉由中央理論與地方實踐的不斷循環，以面對中國客觀現實條件限制、以及社會內在矛盾，進而達成持續的動態發展過程。

於是，中共中央政府在引導者與領導者之間轉換，在手段與目的之間轉換。中國共產黨首先透過方法論的導引手段成為引導試驗與創新的引導者，並讓一黨專政的持續領導成為目的；而一黨專政的持續領導又變成中國追求現代化發展的手段，並使得中國現代化本身成為目的，而達到反覆辯證的動態過程。

陸、結論：凌駕理論與實踐的視野

本文是針對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進行重新詮釋，而且是著重意義理解的內部詮釋。主因是現今有關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諸多論述，並非從中國自身處境、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角度來進行切入，卻普遍多以西方立場、或既有理論框架為基礎，以至對現象本身產生錯誤理解。

劉明（2009）指出西方對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論述，最起碼有六種概觀。包括持續以冷戰思維進行論述的「中國崩潰論」，或是以當前國際政經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機遇論」、「中國責任論」，以及西方主流社會精英認為中國崛起是可以被管理的「管理中國論」，又或是建立一個「中美共同體」（Chimerica）新概念而形成的「同舟共濟論」。這些論述都是研究者站在自身所屬國家、地域，或是依自身所屬歷史、理論，來進行對他者（中國）之現代化發展現象的探究。該六種論述忽略中國本身的歷史脈絡、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社會主義傳統，以至於建立的理論預測，都將因為忽略內部詮釋的重要性，而造成認識上的偏頗。因此，為避免認識錯誤，所以進行內部詮釋是必要的。

然而研究者不僅要跳脫西方既有理論框架，同時也應注意既有社會主義理論所造成的約束，才能避免任何既定理論對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做出強行的解釋與套用。所以我們不能侷限在理論層次來面對中國的轉型議題，而是必須以凌駕理論與實踐的視野高度，亦即從方法論層次來進行內部詮釋。這樣的作法，不僅擺脫單一理論對現象詮釋所造成的誤解，還使得對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運動的方法探究成為可能，並從中發現特殊的動力邏輯原則。因此，我才會特別強調中國一黨專政架構下其方法論導引的重要性。這意謂在一黨專政架構下，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發展路線，有其獨特的內在導引邏輯，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為可能。

那麼任何基於外部理論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所進行的理解，都必須重新審視。

首先，對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就必須重新定義。「改革開放」並非是靜態強調中國正逐步走向資本主義、或產生某種資本主義新形式，也並非只強調它是擁抱市場機制的過程。「改革開放」所彰顯的，正是鄧小平強調「摸著石頭過河」所具有的意義：是對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方法的探究過程。而各種有助於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方法試探，卻又必須始終在一黨專政架構底下，以維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這使得中國共產黨必須在發展路線上使用一致的動力邏輯原則，亦即在方法論層次上，基於社會主義革命傳統的世界觀與認識論，進行對諸種方法的試探、實踐、反思、與整合。

既然「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一致方法論導引下對諸種方法的探究過程，就必須注意中國共產黨所使用的各種實用概念背後，都可能彰顯隸屬於共黨所擁有的動力邏輯原則，而不能以西方既有理論思維來進行理解。例如中國的「宏觀調控」，就不能以西方自由放任主義的思維來強調這是一種政府對市場的過份「干預」，而且也不單只是西方意義底下以利率調整所進行的總量調控。「宏觀調控」這個實用概念在中國有其獨特意義，它彰顯中國共產黨基於社會主義革命傳統的動力邏輯原則所產生的方法革新，它不只面對總量調控，更是面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所以如果不先確認中國共產黨的動力邏輯原則，就會對中國共產黨所使用的各種實用概念產生誤解。本文正是要強調意義詮釋與理解的重要性，以幫助我們認識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而不是特別強調中共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政策成就。

畢竟中共在方法論導引下所進行的方法探究過程，並不能全然保證在相關政策的執行上是百分百的無懈可擊。中共內部從方法論導引至實際政策的實踐過程，也的確可能產生乖離與扭曲。因此當中國共產黨不斷面對新的社會經濟矛盾，同時又要顧及方法論導引是否產生乖離與扭曲的情況下，在未來仍是必須面對不斷的挑戰。

還要說明的是，本文主要探討中共改革開放的路線是如何形成與發展，亦即

從動力邏輯原則的形成至系統發展成型進行完整的討論，但並未論及中共一黨專政的權力結構與運作。然而這不代表對權力機制的探討不重要，同時也應該重視權力過於集中所造成的貪污腐敗問題。不過對一黨專政權力機制與運作的探索並非本文要處理的範圍，因此在結論部份還是必須回歸本文初始所關注的課題。

一、改革開放的發展動力表現為系統化的交織與綜效

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時期，形成一套整合的社會經濟發展體系，我統稱為「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它是由四個相同層級系統組成，分別是：「宏觀調控管理系統」、「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

「宏觀調控管理系統」，是整個體系的核心，該系統不只侷限於總量調控，還包括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發展。它運用多重手段，同時面對總體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市場經濟的總量管理。「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形成中央與地方同時具有發展動力、且既有調節又具競爭的操作系統。中央因為財政稅收擴增而掌握資本，降低地方獨大，進而調節與鼓勵各地方發展差異，並促成地方在中央導引下的良性競爭，中央也藉此掌握市場經濟發展，使市場經濟成為社會主義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形成具支配性、具操縱性的產權系統運作，並將市場經濟進行社會化、將產權運作的工具合理化，使中國共產黨在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時，能運用所有制操作系統面對外部資本家競爭。同時它也促成企業之間的橫向聯繫，以擴張拉抬社會的發展動力。在一黨專政架構下，它展現最符合各個微觀企業主體利益的一套操作系統，使得各個企業既能保持自主權伸張以從事市場經濟，又為共黨所用以從事社會發展。「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形成理論與實踐不斷循環的學習平台，促成計畫體制與市場機制的分

層，使得理論政策去除瑣碎管控，並擴增導引特質來凌駕市場經濟發展，以導引中央理論與地方實踐相互循環的改革運動。

以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為例，可發現四個系統彼此形成合理化的交織與綜效，並進而影響新制度的建立。中國證券市場本身就是國家計畫與試驗所造就的產物。在計畫與試驗交互過程中，證券市場的微觀企業主體，是一群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共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劃分改革之後，使得政府不只是證券市場的制度建立者，也成為證券市場的操作者，政府的手透過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和所有制企業進入證券市場。中央政府因分稅改革，使得中央擴大從證券市場汲取財政收入的可能。於是中共一黨專政所擁有的資本與權力更加充盈，促使中央政府透過對證券市場的運作進行宏觀調控，證券市場成為宏觀調控可運用的技術手段之一。

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發展說明「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宏觀調控管理系統」、「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是如何在彼此相互交織、發揮綜效的系統化操作過程中，產生制度的建立與連結，並將創新的制度為系統所用，進而使得「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持續成為可能。

四個系統之所以能產生相互交織的系統化綜效表現，主要是因為它們具有共時性。它們幾乎都是從二十世紀九〇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十年之內，逐漸成型。一九九三年「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逐漸成型、一九九七年「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逐漸成型，再到二〇〇二年「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初步成型，並使得舊有國家計畫體制，在九〇年代初因為該三個系統的影響、以及經濟特區試驗性質的萌芽而發生質變，使得五年計劃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發生轉化，並納入試驗機制而成為「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進而成為「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一部份。於是四個系統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便一再地出現相互交織且展現綜效的整合結果。

由於「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讓中央成功扭轉「弱幹強枝」現象，使地方特區稱職的成爲試驗容器，而去除專斷特權部份；也因爲「公有制爲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讓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滲透到企業主體，方能導引與指揮微觀企業主體在試驗區進行大膽創新實踐，於是使得「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能規劃與實踐未來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變革。「宏觀調控管理系統」也連帶對舊有計畫體制促成一種共變過程，去除過去完全包含宏觀與微觀計劃經濟的全包式管制，卻更加擴展宏觀戰略性意義，以導引國家面向中長期發展的運作，促成與「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的連結。

「公有制爲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促使中央有更充足的資本來成就「宏觀調控管理系統」。而「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促使承包制的終止，才使得國家財政收入與國有企業發展積極性的內在矛盾解除，進而促成「公有制爲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的進一步發展，也才使中央政府與國有企業的「強枝弱幹」局面得以改變，促使中央資本充足，讓「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運作更爲強大。

「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同樣促使中央在擁有充裕資本後，促使「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發展成爲可能，並一再增強其運用能力。當中共中央在市場經濟發展下，無法以全能計劃掌控國家發展時，中央政府就必須在市場與計畫逐漸分層的情況下，一方面擴大規劃的宏觀性，另一方面在面對調節市場經濟的技術性時，一同考量發展資本如何而來的問題，否則總體性的宏觀調控根本不可能達成。

「宏觀調控管理系統」不只面對經濟波動的節奏現象，更要面對中國特殊的社會經濟轉型結構，以至於該系統成爲四個系統當中位居核心且具調節與管理的角色。比方有效需求不足會在中國出現，但主要是城鄉、區域差距的社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問題，於是「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就成爲「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輔助，由規劃與試驗引領中共面對結構性問題，並最終透過宏觀調控來

付諸總體性實踐。又如「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雖然促成拉抬中國社會的關鍵動力，但也相應造成經濟過熱的現象。特別是國有控股企業利用資源優勢形成過度投資時，便需要「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管制與調節。再來「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雖然也促成拉抬中國社會的關鍵動力，亦即地方政府發揮作用，成為企業投資旺盛的推動者，但地方政府卻也因公共建設的過度投資，而造成經濟過熱的現象，便需要「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管制與調節。

因此「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呈現一種整合的系統合理化過程，以促發中央與地方政府、微觀企業主體的動力，並將其包含於中長期試驗與規劃循環機制、以及當下的宏觀調控措施。這樣的系統合理化過程，將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動力，呈現為系統化的交織與綜效。

二、「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動力邏輯原則

「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所呈現的系統化交織與綜效，體現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巨大動力。這個系統背後的動力來源，是方法論導引的動力邏輯原則在支撐整個系統化的運作。

從「公共決策計畫編制與試驗系統」來看，五年規劃與實驗機制無法進行切割性的分析，因為兩者相互聯繫。首先是中央與地方在理論層次的論理與辯證過程，表現為社會經濟規劃的編制程序；其次是中央與地方在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過程，表現為規劃與試驗的相輔相成。這兩個步驟在系統內產生整合性動態過程，塑造面對中國社會經濟內在矛盾的結構轉型發展運動。其認識邏輯，就是必須同時衡量中共主體能動性與外在客觀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進行理論與實踐的反覆循環，並遵守動態發展原則，導引中共主體思維來面對中、長時段的社會經濟結構撞擊，以發展前瞻性戰略。

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動力系統」而論，它並非西方意義下的私有

化，卻仍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體現。在中國產權發展的運動過程中，它仍將公有制視為主體，卻借用西方市場經濟的歷史經驗為共黨所用。例如利用證券市場作為一種手段，以進行包含私有經濟的混合所有制發展。該系統彰顯政府與微觀企業產生內在矛盾而進行相互辯證的動態運作邏輯。至於「中央與地方分稅財政動力系統」的誕生本就源自於中央與地方的內在矛盾。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於沿海地方勢力擴大，遂造成中央與地方的緊張局面，於是中央不得不建立一個系統，以面對內在矛盾的解決。該系統亦彰顯中央與地方政府產生內在矛盾以進行相互辯證的動態運作邏輯。

「宏觀調控管理系統」的運作，則不只是一種基於匯率、利率的技術性操作，它除了總量調節外，還包括對總體社會經濟結構的改造與發展。因此其背後的動態運作邏輯，是在於掌握社會經濟結構中的主要內在矛盾，進行國家發展的動態辯證過程。同時另外三個系統對中國社會經濟所產生的內在矛盾，也需要「宏觀調控管理系統」進行系統內部的動態辯證過程，以調節系統內部的矛盾。

透過對這四個系統的說明，可以發現有幾個重要動力邏輯原則在導引系統的成型與整合，包括：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動態發展原則、理論與實踐循環原則、思維能動性與客觀社會條件限制的互動原則、以及關注社會經濟內在矛盾的原則。這幾項動力邏輯原則，促成「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成為可能。

三、系統合理化的兩個維度：歷史除魅與結構撞擊

促使「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形成的動力邏輯原則，之所以能展現諾大影響，在於該動力邏輯原則始終依附於中國特殊的時空條件之上。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小農為主的社會，是在社會經濟與思想上近乎呈現靜止狀態的社會。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與執政之後，始終必須面對小農社會因人口增長而帶來的生產不足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從事革命、或執政後的社會經濟

發展之時，必須保持與底層農民的聯繫，以維持政權合法性。

中共於革命時期的作為，包括首先賦予農民階級意識以推翻宗法制度、租佃制度，再到否定階級鬥爭的手段以面對生產力不足的問題，以及否定與批判傳統思想僵化的問題。這表示中國共產黨在面對解決小農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同時展現一種以黨的組織運作來撞擊長時段結構的過程，因為中國小農社會正是一個長期綿延的龐然巨物。

由於中國共產黨能夠主動撞擊小農社會生產力不足的問題，於是方能建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動力邏輯原則。畢竟長時段小農社會所具有的問題，並非如短暫的突發事件一般可以立即解決，它需要有能夠面對中國特殊性問題的方法論導引，才能產生具持續性的動力邏輯原則，以推動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層改變。以毛澤東思想所建立的動力邏輯原則，正是因為能面對小農社會的結構性因素，才有可能形成。這包括關注長時段社會經濟的動態發展與內在矛盾、並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進行詮釋。

由於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受到諸如東亞出口生產體系、資本主義全球化等外在條件的限制與影響，讓中國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期形成以吸收外資、並促使國內勞動力遷移的「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面對此一新起的轉型結構，起自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所逐漸形成的動力邏輯原則，依然在方法論導引的層次展開影響力。「FDI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結構」與二元社會結構的結合，導致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等新的內在矛盾誕生，促使中國共產黨在考量外在社會條件限制的情況下，開始進行理論與實踐的辯證循環，而產生出相對應於轉型結構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這表示「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動力邏輯原則，是中國共產黨持續在結構維度之中證成的，而不是單純複製西方理論、更不是單純進行社會主義理論的演繹而得來。

「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形成與運作，有賴於背後動力邏輯原則能保有持續性。動力邏輯原則的持續，是由於能在歷史進程對各種教條與偏見進行除

魅。針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文的探討，可知中國共產黨在面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歷史時，產生一個論理過程。這樣一個論理過程，是為了解決該政策文本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那就是思想路線確立的問題。從該政策文本的閱讀中，可以認定思想路線的確立，其實包含一種去除教條控制的決心，因此可將該政策文本視為是一個歷史除魅的好教材。而在教材的陳述中，表現出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看待與解讀歷史，以及如何從回顧歷史的反思中，展現思想解放，以達成除魅之實！

鄧小平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文所提出的相關意見，不光只是為自己做出平反，他其實解放了一個意識形態凍結的中國。如果沒有鄧小平在當時所進行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誕生。該文有意的立論，是企圖把「毛澤東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這是一個線索，讓我們試著將所謂的教條枷鎖與「毛澤東錯誤」加以聯繫，又將「毛澤東思想」與影響系統建立的動力邏輯原則加以聯繫。亦即，「毛澤東錯誤」是指涉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實踐錯誤，並因此加深當時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於是必須對此一實踐的錯誤進行反思，而重新修正中國共產黨對於「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認識，進而指向未來，觸發進一步的實踐。這樣的論理過程，不僅表示中國共產黨仍是面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以及重視社會動態發展的內在矛盾原則，更是立基於理論與實踐循環的動力邏輯原則。因此可以發現，鄧小平執政時期，該政策文本中所進行的思想解放論理過程，與之後「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型塑過程，二者都立基於相同的動力邏輯原則。

所以該政策文本的歷史除魅立論，正是作為一個媒介。它不僅將起自中國共產黨革命時期的動力邏輯原則，也就是起自「毛澤東思想」所闡釋的動力邏輯原則，與該政策文本相聯繫，也與後來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動力邏輯原則相聯繫。因為中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動力、中共政策文本的立論邏輯、以及系統建立的動力來源，都是基於相同的動力邏輯原則。這也表示「宏觀調控轉型發展

系統」的動力邏輯原則之所以能發揮強大的影響力，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在歷史維度中強化這些動力邏輯原則。因此，合理化「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所依賴的動力邏輯原則，是在「歷史除魅」與「結構撞擊」兩個維度之中獲得證成。

四、「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是由「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發展而來

「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動力邏輯原則，是在「歷史除魅」與「結構撞擊」兩個維度之中證成，並未脫離時空條件而流於相對主義之嫌，所以可以用「範式」加以聲稱。然而該系統的建立，實際上是在面對歷史結構時必須產生某種轉化與不連貫性，亦即中國共產黨此一行動主體，必須對歷史與結構有著持續性的辯證過程。否則沒有否定，就不可能有系統的建立。

從動力學探討的角度，當回顧中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傳統，特別是解讀毛澤東思想時，可以發現一個社會主義行動者的原型。這樣一個行動者原型，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時期從事發展行動的模範，以促成對歷史結構的轉化。把毛澤東視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行動者原型，就會朝向以他所認知的方法論為認識起點的探索過程，並從中發現「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背後的動力邏輯原則是如何被毛澤東給詮釋出來。

毛澤東的方法論基礎，展現群眾、理論、與實踐三要素，並用以面對中國文化歷史、社會主義的發展以及落後農業國脫貧的努力。於是在方法論高度上，毛澤東批判中國文化、而且不以信仰教條的方式來接受列寧思想，卻以後設角度觀看社會主義理論與意識形態功用，並越發重視中國小農社會中的農民角色對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於是在方法論導引上，毛澤東以方法論三要素來面對中國特殊時空環境，並在革命發展經驗中，逐漸詮釋出屬於中國範疇的方法論，我稱為「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一種方法論的創新。

毛澤東在方法論層次的思想理路，建立起「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基本原

則，諸如：必須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強調動態發展導引、重視歷史經驗如何為我所用、強調理論與實踐的循環、重視思維能動性與客觀社會條件限制的互動、以及對於歷史與結構中內在矛盾的關注。這些基本原則，正是中國共產黨於改革開放後，型塑「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的動力邏輯原則。亦即該系統的動力邏輯原則，就是「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它源自毛澤東思想，源自中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傳統。「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正是中共一黨專政架構下所具備的內在動力與視野，而「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則是依附於該內在動力、並於時空條件變化下所產生的外顯、具體化客體。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在於方法論導引的產生，它讓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行動者，能依據「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的導引，建立起「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以進行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即便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及東亞出口生產體系等外在條件絕對影響著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但中國共產黨此一關鍵行動者能夠掌握「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作為發展動力，其影響勢必更為深遠。因為沒有中國共產黨在方法論導引下所展現的主體能動性，是不可能與外在的條件限制進行互動的，也不可能促成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那麼任何去歷史化、去結構化的理論架構，都無法說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脈絡，這包括凱因斯主義。凱因斯主義是一種基於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兩黨政治下的理論產物，它確實是西方實踐所依據的重要理論架構之一，但將其擺在中國的時空環境作為詮釋的基礎，就是一種錯誤的認識方式。

五、方法論導引下的視野

「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是隱藏在實作系統背後的那隻看不見的手，是中國共產黨思維能動性的展現，而能與外在社會條件限制進行持續辯證的過程，並從中一再關注歷史運動的內在矛盾，以面對社會經濟的轉型。我認為這樣的詮釋是

一個新視野，凌駕於中共官方陳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靜態說法，觀照出不同的面向。亦即，關鍵並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外顯形式是如何有效與普遍的問題，反之，是詮釋出：「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是與行動者（中國共產黨）互為表裏、相互為用。中國共產黨的理想行動者原型，是由「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型塑而成，而「中國辯證唯物論範式」則是由中國共產黨所證成。

當人類有目的地改造世界，以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的「實踐」之時，「理論」可以作為「實踐」的輔助。因為「理論」是一種對歷史現象進行解釋、反思以預測未來的架構，人類便可以依據「理論」來輔助實踐，以避免走回頭路。「方法論」的層次較高，它不僅表述世界觀，還兼具探究認識與改造世界的方法。於是「方法論」能提供動力邏輯原則，以作為「理論」的基礎，用來建構、檢證「理論」，進而影響「實踐」。

如果站在「理論」高度來看待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將無法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行動者是如何產生動力以改造社會。因為我們可能仍然不清楚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過程背後，究竟是怎樣地邏輯原則促發改革的動力。所以，不管是以「馬克思主義」或「凱因斯主義」等框架來看待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都將造成研究者在視野上的局限性。在方法論的高度進行觀察，意謂研究者必須先跳出各種既有的「理論」框架。

同樣地，中國共產黨在從事社會經濟轉型時，也必須跳脫既有的「理論」框架，否則面對改革將沒有足夠寬闊的視野。從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革命歷程、以至改革開放的歷程，亦即從毛澤東至鄧小平領導的時期，都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並未全然遵守馬列主義的既有理論框架，該黨甚至一再地因為實踐而修正理論，這一再地彰顯方法論層次對於理論與實踐的導引。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時期之所以能成就社會經濟轉型，並且持續下去，關鍵不在於它建構、放棄、或引用了哪些理論，而是中共掌握與強化動力邏輯原則，以持續導引理論與實踐循環運動的不斷發展。

是故，方法論導引下的視野，能夠凌駕理論與實踐，形成中共的發展動力邏輯。那麼對於方法論導引的重視，亦即重視動力邏輯原則是否能在歷史與結構維度上進行不斷發展與創新，就是必要的。這表示中國可以不再局限於過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也不必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一再地擴容，卻可以面對歷史與結構去省思與創造屬於中國本身的世界觀與認識角度，進而影響理論與實踐。

站在方法論導引的視野下，我們將更能延伸關懷的深度，來看待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所產生的相互碰撞。關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究竟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中國在理論與實踐上，是否能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互為辯證、互為所用的導引過程，進而促發有利於人類社會的操作系統。畢竟，正因為方法論導引是凌駕於理論與實踐的，它於是有著更開闊的視野來導引人類世界的發展才是。

柒、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籍：

保羅·克魯曼 (Paul Robin Krugman)，盛逢時譯 (1999)。失靈的年代。台北：先覺出版社。

彼得·克拉克 (Peter Clarke)，黃煜文譯 (2010)。爲什麼是凱因斯？。台北：商周出版社。

田辰山 (Chenshan Tian)，蕭延中譯 (2008)。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杜贊奇 (Prasenjit Durara)，王福明譯 (1988/ 2008)。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W·布魯斯 (W·Brus)、K·拉斯基 (K·Laski)，銀溫泉譯 (1989 / 2010)。從馬克思到市場－社會主義對經濟體制的求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伊曼紐·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彭淮棟譯 (2001)。自由主義之後。台北：聯經出版社。

盧卡奇 (Georg Lukacs)，張翼星譯 (1991)。列寧。台北：遠流出版社。

布蘭特利·沃馬克 (Brantly Womack, 1982/ 2006), 霍偉岸、劉晨譯。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 (1917-193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69 /1993), 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

黃仁宇 (2001), 阿風、許文繼、倪玉平、徐衛東等譯。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台北：聯經出版社。

翁之鏞 (1952)。中國經濟問題探原。台北：正中書局。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ener, 2005), 張寧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斯圖爾特·R·施拉姆 (Stuart R.Schram, 2005), 田松年、楊德等譯。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林毅夫 (2008)。中國漸進改革的邏輯。張維迎主編，中國改革 30 年：10 位經濟學家的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毅夫 (2009)。解讀中國經濟，台北：時報出版社。

費爾南·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2000), 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時間 (卷三)。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2000），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形形色色的交換（卷二）。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2004），邱澎生等譯。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台北：巨流。

翁之鏞（1952）。中國經濟問題探原。台北：正中書局。

中共中央檔案館編（1992）。中共中央檔選集第 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王立勝（2009）。中國農村現代化社會基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謝遐齡（2005）。1930 年代中央蘇區的農村社區重建，復旦社會學論壇第 1 輯。上海：三聯書店。

陳明明（2002）。在革命與現代化之間，革命後社會的政治與現代化。上海：辭書出版社。

郭于華、孫立平（2005）。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當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靜（2008）。轉型經濟中的宏觀調控－基於實踐的探索與反思。上海：三聯書店。

陳志武（2010）。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台北：八旗文化。

高新（1999）。降伏「廣東幫」。香港：明鏡出版社。

王紹光、胡鞍鋼（1992）。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蕭功秦（2009）。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變革。北京：新星出版社。

劉懷廉（2004）。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新論。北京：中國經濟。

陳春來（2007）。〈中國加入 WTO 後外國直接投資的總體趨勢和特徵〉，收入宋立剛、Ross Garnaut（編），《中國市場化與經濟增長》，頁 164-18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蔡昉、都陽、趙長保（2007）。〈中國加入 WTO 後地區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收入宋立剛、Ross Garnaut（編），《中國市場化與經濟增長》，頁 113-12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Golley, Jane, Nicolaas Groenewold（2007）。〈國內市場一體化和地區增長溢出〉，收入宋立剛、Ross Garnaut（編），《中國市場化與經濟增長》，頁 146-16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Arrighi, Giovanni、Mark Selden、許寶強、孫誥烽（2006）。〈資本主義的歷史：東方和西方〉，收入 Arrighi, Giovanni, , Mark Selden〈編〉，《東亞的復興－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為視角》，頁 332-42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熊文釗（2005）。大國地方——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憲政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愛鵬（2009）。地方政府財政建設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萬里（1981）。清除“左”的影響，做農村改革的促進派（萬里在農業部黨組會上的講話），頁 114。萬里論著編輯組編，萬里論農村改革與發展。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柏晶偉（2007）。為農業大包乾報戶口的人——王郁昭。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吳曉波（2008）。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 1978—2008。北京：中信出版社。

鄒東濤，歐陽日輝（2008）。中國所有制改革 30 年（197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文魁（2010）。中國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興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 2005），何畏、易家詳譯。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利潤、資本、信用、利息和景氣循環的考察。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林斐（2008）。中國農民大分流。合肥：黃山書社。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78/ 2010），郭官義、李黎譯。理論與實

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陳明（2008）。作為範式的辯證法的歷史建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胡鞍鋼、鄔一龍（2010）。紅色中國綠色錢潮—十二五規劃的大翻轉。台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朱德米（2004）。經濟特區與中國政治發展。重慶：重慶出版社。

羅清和、李佩、羅銳（2010）。中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發展報告。主編：鐘堅，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報告（201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蘇偉、楊帆、劉士文（2011）。重慶模式。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高宣揚（1998）。當代社會理論（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愛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2002），梁棟譯，渠東校。社會學與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陸一（2008）。閒不住的手——中國股市基因演化史。北京：中信出版社。

洪謙德（1977）。思想及方法。台北：牧童出版社。

余源培等編著（2009）。哲學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馮契、徐孝通主編（2000）。外國哲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二、英文書籍：

Arrighi, Giovanni (2007).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Verso

Ferguson, Niall (2001).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New York: Basic Books.

Braudel, Fernand (1987/ 1993), translated by Richard Mayne.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USA, New York: Penguin Group.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G M Dickson (1967, 1993).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Great Britain, Ipswich Book Co.Ltd.

Georg Simmel (1990), edited by David Frisby, translated by 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by.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Bruce G Carruthers (1999).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U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三、中文雜誌：

廖舜右（2010）。三重失靈危機下的國際經貿體系。全球政治評論。第 30 期，頁 69-96，台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苑舉正（2007）。一個沒有固定方法的方法論：論「典範知識」的「相對主義式誤解」。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21 期，頁 47-88，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吳介民（2009）。「中國模式」或多重複雜的制度形構？中國研究問題專論。台灣社會學，第十八期，頁 1-3，臺北：台灣社會學編輯委員會。

趙建民、張執中（2004）。組織內捲與列寧式政黨的調適與變遷：中國共產黨個案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第 2 期，頁 299-341，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白曉玉（2009）。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歷程及思考。經濟研究導刊。2009 年第 12 期，頁 164- 165，黑龍江：黑龍江省報刊出版中心。

四、碩博士論文：

陳振富（1999）。對中、蘇共無產階級專政實踐之評析。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五、網際網路：

Dr Keynes's Chinese patient. The Economist.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08,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2601956>

Bamboo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Retrieved Mar 10, 2011, from the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10>

中國的期望與實力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座談會會議記錄。中國的期望與實力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座談會（2009年4月10日由台灣新社會智庫、兩岸政經研究學會主辦）。台灣新社會智庫網。2009年4月14日，取自：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285&Itemid=140

張維迎（北大經濟學教授，2011年2月16日）。張維迎：中國經濟轉型首先必須放棄凱恩斯理論。財新網。2011年2月16日，取自：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0216/3412027.shtml>

孫忠良(2010年6月21日)。談金融危機下中國模式“強政府”的政治優勢。河北：《衡水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2010年6月21日，取自中國選舉與治理網：<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9980>

邢少文（2010年8月27日）。中國正在走向權貴市場經濟？—專訪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南風窗網站。2010年8月27日，取自：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249/page/1>

李義平（2009年2月2日）。凱恩斯能給我們什麼啓示。人民網－《人民日報》。
2009年2月2日，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8731607.html>

曹長青（2009年3月26日）。美國失業率和飲鳩止渴。看雜誌網（第33期）。
2009年3月26日，取自：

<http://www.watchinese.com/%E7%9C%8B%E8%AB%96%E5%A3%87/2009/1163>

顧晴（2010年9月10日）。斯蒂格利茨：城市化將使中國成爲世界領袖。新浪
網。2010年9月10日，取自：

<http://news.dichan.sina.com.cn/bj/2010/09/10/211428.html>

曾仁傑（2009年5月18日）。中國大陸「保八」政策是否能達陣。台商網－全
球台商e焦點電子報，第127期。2009年5月18日，取自：

<http://twbusiness.nat.gov.tw/epaperArticleFixed.do?id=2326>

朴宗世（2009年7月15日）。美國財政赤字首破1萬億美元。朝鮮日報中文網。
2009年7月15日，取自：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9/07/15/20090715000011.html

黃宗智（2005年10月21日）。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轉引自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期刊，2005年第1期。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
心：社會學人類學中國網。2008年10月21日，取自：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5/10/437.html>

朱民。中國匯改核心應是改變機制。金融理財網。2010年10月17日，取自：
<http://finance.sina.com/bg/chinamkt/sinacn/20101017/2310156643.html>

2009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中國人民銀行。2010年4月2日，取自：
<http://www.pbc.gov.cn>

中國正式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華爾街日報網。2011年2月14日，
取自：<http://cn.wsj.com/big5/20110214/bch084329.asp?source=newsletter>

Bob Davis（2011年2月14日）。中國因何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華爾街日報。
2011年2月14日，取自：<http://cn.wsj.com/gb/20110214/bch103158.asp>

Brian Sullivan（2010年11月21日）。China's Incredible 5 Year Train Run Makes
America Look Third World。Fox news。2010年11月21日，取自：
<http://briansullivan.blogs.foxbusiness.com/2010/11/21/chinas-incredible-5-year-train-run-makes-america-look-third-world>

石仲泉（2008年10月27日）。農民問題仍是個天大的問題。文匯報。
2008年10月27日，取自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0/27/content_10258330.htm

高力克（2005年4月…日）。轉型中的現代性之爭。二十一世紀雜誌（網路版），
第八十八期。2005年4月號，取自：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3001.htm>

毛澤東（一九二七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新華網。2011年7月3日，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1/22/content_2247012.htm

傑克·格雷（Jack Gray，2006），曉沐譯。透視毛澤東（Mao in Perspective）。傑克·格雷（Jack Gray）、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高默波（2007），李昫校稿，“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專題，《現代哲學》，2007年第4期，頁43-62，廣州：現代哲學雜誌社。2009年11月18日，取自政治學論文網：<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marxism/maozhuxi/16338.html>

余品華（2009），毛澤東哲學思想與“鬥爭哲學”。《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第40—45頁，南昌：《江西社會科學》雜誌社。2010年4月10日，取自政治學論文網：<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marxism/maozhuxi/19707.html>

楊繼、楊承訓（2009），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十大貢獻，《思想理論教育導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期，第16-24頁。2010年6月8日，政治學論文網：<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marxism/maozhuxi/23434.html>

劉林元（2009），兩個30年的有機銜接——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閱江學刊》，2009年第2期，第5—11頁，南京：南京資訊工程大學期刊社。2010年6月8日，取自政治學論文網：<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marxism/maozhuxi/23430.html>

張偉良、林全民（2009），試論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保定：河北大學出版，2009年第5期，第28—33頁。2010年4月10日，取自政治學論文網：

<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marxism/maozhuxi/19720.html>

李銳。毛澤東的三本入門書 —— 《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第五部分：文化書社與自修大學。人民網。2006年9月6日，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68/4788093.html>

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通過）。新華網。2011年4月7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452.htm

金光耀（2011年3月27日）。“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解放日報。2011年3月27日，取自鳳凰網：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history/gundong/detail_2011_03/27/5390093_0.shtml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ener）。旁觀毛澤東時代。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網站。2008年5月31日，取自：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5559.htm>

尙慶飛（2009）。“國外毛澤東學”研究領域若干基本問題考察。《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9期，第116—12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馬克思主義研究》編輯部。2010年6月8日，取自政治學論文網：

<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marxism/maozhuxi/23425.html>

田世錠（2009）。美國學者論毛澤東政治思想的當代價值。《學術論壇》。2009年第3期，第1—4頁，南寧：廣西社會科學院。2010年4月10日，取自政治學

論文網：<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marxism/maozhuxi/19700.html>

蕭延中（2003）。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西方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趨向。《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 年第 6 期。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網站。2006 年 11 月 11 日，取自：<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2440.htm>

保羅·哈里（Paul Healy，2009），范春燕譯。國外學者關於毛澤東思想與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係的爭論（上），《國外理論動態》，2009 年第 5 期，第 29—37 頁，北京：中央編譯局，2010 年 4 月 10 日，取自政治學論文網：

<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marxism/maozhuxi/19702.html>

毛澤東（1957 年 10 月 9 日）。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2011 年 4 月 8 日，取自：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71009.htm>

陳明明（2000）。現代化進程中政黨的集權結構和領導體制的變遷。2000 年第 6 期，北京：戰略與管理期刊。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2009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31317>

張建君（2009 年 7 月 16 日）。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模式特徵探析。中國改革論壇網。2009 年 7 月 16 日，取自：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2&id=236056&page=9&move=pre>

白雲濤（2009年3月16日）。《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後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3月16日，取自：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8964776.html>

毛澤東（1937年）。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轉引自《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卷，2003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烏有之鄉網站。2007年4月22日，取自：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704/17847.html>

毛澤東（1937）。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人民網。2007年4月22日，取自：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529/80830.html>

毛澤東（1937）。矛盾論。人民網。2007年4月22日，取自：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529/80822.html>

高力克（2005年11月30日）。轉型中的現代性之爭。2005年11月號，二十一世紀雜誌網路版（第44期）。2005年11月30日，取自：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3001.htm>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新華網。2008年4月20日，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2543544.htm

鄧小平（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

題的決議》的意見。新華網。2008年4月20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content_2548121.htm

毛澤東（1927）。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人民網，2008年10月29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0190/70197/70350/4950575.html>

陳雲（1953）。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人民網。2009年4月27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83035/83317/83596/5738285.html>

國務院扶貧辦：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由2.5億減至2148萬。晉城科技訊息網。2009年12月07日，取自：

<http://www.jcsti.net.cn/Article/snxx2009/12/07/1625074238.html>

鄧聿文(2010年1月27日)。“一號文件”與三農問題。聯合早報網。2010年1月27日，取自：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3/cnpol100127.shtml>

鄭風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2010年1月14日）。一號文件——十二份一號檔有什麼變化規律？。鄭風田部落格。2010年1月14日，取自：

<http://blog.10jqka.com.cn/account/5458/65535458/posts/3297044.shtml>

鄧小平（1979年3月30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人民網。2009年4月20日，取自：<http://web.peopledaily.com.cn/deng/newfiles/b1290.html>

鄧小平（1979年11月26日）。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 年 4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cpcnews.cn/BIG5/69112/69113/69684/69695/4949700.html>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 年 4 月 20 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34136/2569304.html>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2009 年，3 月 27 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378/4429522.html>

江澤民（2002 年 11 月 8 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華網。2011 年 5 月 18 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新華網。2011 年 5 月 18 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7/content_2558000.htm

馬凱（2005 年 4 月 4 日）。〈從這次宏觀調控的實踐看我們黨駕馭全域領導發展的能力〉。《價格理論與實踐》，2005 年第 2 期。新華網。2011 年 5 月 18 日，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4/04/content_2782789.htm

陳二厚（2004 年 07 月 24 日）。江蘇鐵本及關聯企業偷稅 2.94 億元 16 嫌犯被捕。

新華網。2011 年 5 月 18 日取自：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0724/1954898678.shtml>

伍戈（2010）。三大需求對我國 GDP 增長的貢獻率問題簡析。2010 年第三期，中國統計。北京：中國統計雜誌社。2010 年 9 月 20 日，取自：

<http://cubeimg.zhongsou.com/2574/278504712665440-6147176842574.pdf>

劉力（2004 年 3 月 25 日）。貿易依存度的國際比較。學習時報網。2008 年 3 月 25 日，取自：<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sb/811516.htm>

經濟部國貿局雙邊貿易一組。中國大陸貿易依存度增加簡析。中華民國經濟部國貿局網站。2008 年 5 月 26 日，取自：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918&report_id=87266

李麗（2007 年 3 月 23 日）。理性看待中國外貿依存度。《中國經濟時報》網路版。2008 年 3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southcn.com/NFLR/llwz1/zjll2/200703230638.htm>

餘雲輝（2009 年 6 月 21 日）。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在農業和農村。鳳凰財經網。2009 年 6 月 21 日，取自中國人口訊息網：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10707

中國經濟強勁復蘇刺激日本出口大增。中國貿易促進網。2010 年 2 月 26 日，取自：<http://www.tdb.org.cn/index.do>

姜遠珍（2010年2月1日）。南韓進出口貿易對中國依賴度超過20%。中央社實時新聞。2010年2月1日，取自：

http://www.etaiwannews.com/etn/news_content.php?id=1169846&lang=tc_news&cate_img=259.jpg&cate_rss=news_ED

中國成韓外貿依存度最高國家。文匯網。2010年10月5日，取自：

http://news.wenweipo.com/2010/10/05/IN1010050029_p1.htm

2010兩岸經貿全球觀。飛揚軍事網。取自：

http://www.fyjs.cn/bbs/htm_data/254/1003/242928.html

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創一年來記錄。美國之音中文網。2010年2月14日，取自：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taiwan/TAIWAN-JAN-EXPORT-20100214-84351292.html>

戴瑞芬（2010年9月29日）。經部：台灣今年GDP近20年來首度超越中國。

中時電子報。2010年9月29日，取自：

<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0,5244,130502x132010092900731,00.html>

2009年中國各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經濟網數據中心。取自：

http://big5.ce.cn/gate/big5/database.ce.cn/district/tjgb/nf/2009/201004/01/t20100401_21219269.shtml

朱民（2010）。中國匯改核心應是改變機制。金融理財網。2010年10月17日，

取自：<http://finance.sina.com/bg/chinamkt/sinacn/20101017/2310156643.html>

2009 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中國人民銀行。2010 年 4 月 2 日，取自：
<http://www.pbc.gov.cn/>

2008 年中國各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經濟網數據中心。2010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big5.ce.cn/gate/big5/database.ce.cn/district/tjgb/nf/2009/201004/01/t20100401_21219269.shtml

陸暘（2010）。出口導向型 FDI 將生產環節的污染留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2010 年 5 月 4 日，取自：<http://www.cass.net.cn/file/20100504267299.html>

傅宏波（2005）。中國戶籍制度面臨重大變局 戶籍改革時不我待。新浪網。2010 年 10 月 18 日，取自：<http://news.sina.com.cn/c/2005-11-18/12478336408.shtml>

韓俊，崔傳義，秦中春（2009）。農民工問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人民日報／新華網。2009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5/11/content_11350277.htm

熊培云（2009）。秦暉：“低人權優勢”驚人競爭力。南風窗／騰訊網。2009 年 7 月 14 日，取自：<http://view.news.qq.com/a/20090714/000036.htm>

趙憶甯（2003）。我國分稅制決策背景歷史重播。《瞭望》雜誌，2003 年 37 期，頁 20-29。和訊新聞網。2008 年 8 月 4 日，取自：
<http://news.hexun.com/2008-08-04/107889818.html>

陳華昇(2009)。中共分稅制改革對中央與地方關係及地方財政經濟影響之分析。國家政策研究經濟會；國政研究報告(內政(研)098-002號)。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2010年4月20日，取自：<http://www.npf.org.tw/post/2/5694>

國務院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1993年12月15日)。新華網。2011年5月18日，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17/content_2709622.htm

劉仲藜(2008年12月24日)。分稅制改革抓住了歷史機遇。中國國家總稅務局網站。2011年5月19日，取自：
<http://202.108.90.173:1980/SunIT/202.108.90.130/n8136506/n8136593/n8137681/n8733545/n8741020/8743207.html>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93年11月14日通過)。新浪網。2011年5月19日，取自：<http://news.sina.com.cn/c/2002-10-22/1358777716.html>

江澤民(1997年9月12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1年5月19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89.htm

江澤民(2002年11月18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1

年 5 月 19 日，取自：<http://www.xinhuanet.com/newscenter/dyxjx/sldbg.htm>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2003 年 10 月 14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新華網。2011 年 5 月 19 日，取自：<http://news.sina.com.cn/c/2003-10-14/21231921305.shtml>

中國共產黨十五屆四中全會公報（1999 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舉辦中國共產黨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新華網。2011 年 5 月 19 日，取自：http://news.cqnews.net/cqnews_chat/200909/t20090915_3595108.htm

賈存斗（2008 年 12 月 15 日）。國企改革：漫長的博弈。新華網。2011 年 5 月 19 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2/15/content_10508183_2.htm

2011-02-28 00:59:44

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1979 年 7 月 13 日國務院頒布）。人民日報。中國文明網。2011 年 5 月 19 日，取自：

http://hxd.wenming.cn/sdc/content/2008-09/30/content_3000.htm

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1984 年 5 月 10 日國務院頒布）。新華網。2011 年 5 月 19 日，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7/content_2558234.htm

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1992 年 6 月 30 日國務院第一〇六次常

務會通過)。中國企業集成網。2011年9月18日，取自：

<http://www.jincao.com/fa/law24.27.htm>

葉檀（2008年08月20日）。55位廠長聯名致信省委書記：請給我們鬆綁。新京報。2011年5月26日，取自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8/20/content_9543357.htm

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1979年7月13日由中共國務院頒布）。人民日報。2011年5月26日，取自中國文明網：

http://hxd.wenming.cn/sdc/content/2008-09/30/content_3000.htm

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1984年5月10日由中共國務院頒布）。人民網。2011年5月26日，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7/content_2558234.htm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原載於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新華網。2008年5月9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5/09/content_8138077.htm

鄧小平（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中國近代史綱要課程網站。2010年4月27日，取自：

<http://zgjxds.pspm.whu.edu.cn/dispArticle.Asp?ID=1064>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通過)。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人民網。2011年4月27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1/4441902.html>

王鬱昭口述、胡雪琴採訪（2009年9月30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經濟週刊。2009年9月30日，取自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9/30/content_12121531.htm

陳曉萍（2008年4月14日）。《炎黃春秋》社長：營造一個更加寬鬆的輿論環境。中國新聞週刊。2011年4月28日，取自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7116856.html>

趙樹凱（2008年）。萬里與農村改革。中國發展基金研究會。2011年4月28日，取自：<http://www.cdrf.org.cn/>

1982年中央一號檔：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人民網。2008年10月8日，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0/08/content_10162735.htm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77年）。新華網。2011年4月27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5/content_2094081.htm

江澤民（1992年10月12日）。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中共中央主席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2011年5月26日，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48.htm

江澤民（1997年9月12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2011年5月26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89.htm

關於統計上劃分經濟成分的規定（中國國家統計局設管司於2001年10月10日發布）。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2011年5月26日，取自：

http://www.stats.gov.cn/tjbz/t20061018_402369830.htm

公有和非公有控股經濟的分類辦法（中國國家統計局設管司於2006年11月23日發布）。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2011年5月26日，取自：

http://www.stats.gov.cn/tjbz/t20061123_402369838.htm

1999年我國國家重點企業與世界500強對比分析。中國國家經貿委經濟資訊中心。中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2011年5月26日，取自：

<http://www.sasac.gov.cn/n1180/n20240/n20259/8703570.html>

吳曉波（2009年7月10日）。“做小買賣”進不了500強。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2011年5月26日，取自：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27491?page=1>

包永輝（2008年11月2日）。蘇南模式、溫州模式：走出模式之爭。新華報刊一半月談網。2011年5月26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1/02/content_10294571_1.htm

國務院辦公廳(2009年4月10日)。電子資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國政府網站。2009年4月15日，取自：

http://www.gov.cn/zwgk/2009-04/15/content_1282430.htm

曾晶鈺(2008年3月31日)。高速網路時代 三大主流 3G 技術對比分析。手機中國網。2009年4月30日，取自：<http://news.cnmo.com/1/13620.html>

中國移動推動 TD-SCDMA 的發展和加速物聯網應用。搜狐 IT。2010年3月4日，取自：<http://info.tele.hc360.com/2010/03/040819174935.shtml>

郭遠明、塗娟(2009年4月1日)。中國移動投資 200 億元在贛建設無線城市。新華網。2009年4月1日，取自：<http://www.tssjw.com/htm/3/27.htm>

胡錦濤(2007年10月15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新華社。2007年10月24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管漢暉 林智賢(2011年)。“五年計劃” 與中國經濟發展歷程。2011年4月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主辦，北京：《中國經濟》雜誌社。中國經濟網。2011年4月20日，取自：

<http://www.economyofchina.com/cms/html/zazhi/dangqi/2011nian4yuekan/tegao/2011/0408/1023.html>

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網。2011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5/content_2418530.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1 年 3 月 14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准）。新華社。2011 年 03 月 17 日，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6/c_121193916.htm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十二五”規劃前期重大問題研究公告（2008 年 11 月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司網站。2008 年 12 月 5 日，取自：<http://ghs.ndrc.gov.cn/125ghzdktyjgg/ktsqs/>

李守信（2008 年 11 月 6 日）。發展改革委布置“十二五”規劃前期重大問題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站。2008 年 12 月 5 日，取自：http://www.gov.cn/gzdt/2008-11/06/content_1141548.htm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1980 年 8 月 26 日通過）。中國網。2009 年 5 月 21 日，取自：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64453.htm

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於 2007 年 3 月 1 日公佈）。新浪網。2011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green.sina.com.cn/2010-12-02/113521571334.s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2006 年 3 月 16 日

公佈)。新華網。2011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1/16/content_4057926.htm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批准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 2007 年 6 月 7 日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1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07tongzhi/t20100511_346231.htm

國務院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9〕3 號），中國國務院 2009 年 1 月 26 日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11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www.gov.cn/zwgk/2009-02/05/content_1222355.htm

無形（2010）。經濟特區與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介紹。方輿地理人文季刊。2010 年第 4 期，總第 12 期（冬季號），頁 30-38。方輿·人文類網絡誌。2011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xzqh.zxq.net/mag/201004.pdf>

前副總理谷牧病逝 享年 96 歲。明報。新浪網。2009 年 11 月 6 日，取自：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overseamedia/mingpao/20091106/1325847375.html>

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2009 年 6 月 26 日印發）。重慶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渝府發〔2009〕68 號）。重慶市政府網。2011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WithLogo.aspx?gwz=%E6%B8%9D%E5%BA%9C%E5%8F%91&gwnh=2009&gwqh=68>

Zhang Monan (張茉楠, 2011年7月20日)。Tackling local government debt。China Forum, P8。China Daily。2011年7月20日, 取自: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7/20/content_12939517.htm

江迅(2011年5月8日)。朱鎔基打破沉默清華講話驚爆。25卷18期, 亞洲週刊。2011年5月8日, 取自: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522319462/18ag2.cfm

徐明天(2011年6月12日)。朱鎔基否定了中國經濟兩個最大成就。鳳凰博報。2011年6月12日, 取自: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blog.ifeng.com/article/11823371.html>

郭震遠(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2010年10月17日)。重大轉折與嚴峻挑戰——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影響。《中國評論》月刊十月號。取自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6/7/2/101467239.html?coluid=33&kindid=545&docid=101467239&mdate=1017003349>

朱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特別顧問): 中國匯改核心應是改變機制。金融理財網。2010年10月17日, 取自:

<http://finance.sina.com/bg/chinamkt/sinacn/20101017/2310156643.html>

李東旭(2010年10月18日)。揭秘: 鄧小平與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10月18日, 取自: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9/12973721.html>

郭震遠(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10月17日)。重大轉折與嚴峻挑戰——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影響。《中國評論》月刊十月號。取自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6/7/2/101467239.html?coluid=33&kindid=545&docid=101467239&mdate=1017003349>

李東旭(2010年10月18日)。揭秘：鄧小平與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10月18日，取自：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9/12973721.html>

劉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局副巡視員，2009)。西方輿論涉華六論：從"中國崩潰論"到"同舟共濟論"。《國際問題研究》，2009年第3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2009年6月23日，取自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gate/big5/civ.ce.cn/main/sxqd/200906/23/t20090623_19379575.shtml